

5061/5600.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CL
SEP 15 1958

中國語文

Zhōngguó Yǔwén

7

1958

总第73期

1958年7月号(总第73期)目录

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为实现文化革命而贡献出我們的

全部力量(社論)..... (301)

語言学課程整改笔談..... (303)

馮文炳 葛信益 梁东汉 林 燾 呂叔湘
馬学良 王 力 殷孟倫 袁家驊 朱 星

各高等院校語言学課程整改情况..... (315)

北京大学(吉常宏、石安石) 复旦大学(胡芸、阿湯) 华东师
范大学(陈秀珠) 哈尔滨师范学院(吳哲夫) 湖南师范学院
(高子荣) 南京师范学院(張芷) 山东师范学院(子朗) 沈
陽师范学院(关兴三)

文字改革大家談..... (322)

曹一新 黎錦熙 郑国澤 王世祥 高 嵩 馬国凡

談談对俄罗斯学生的汉语教学法.....苏联 扎多延柯 (325)

日本的方言学研究和方言地圖的准备工作.....劳 宁 (328)

論汉语中詞的界限問題(三).....苏联 伊 三 克 (330)

少数民族文字中汉语借詞問題.....王 輔 世 (335)

說“加以”.....陈 迪 明 (338)

“目的”和“为了”.....王 年 一 (339)

溫嶺話入声变調同語法的关系.....曹 广 衢 (340)

洛陽方言中的一些語法現象.....赵 月 朋 (342)

語文短評..... (344)

漫談“語文短評”中的几个問題.....凱 鳴 (346)

書刊評介

評《現代汉语外来詞研究》.....邵 荣 芬 (347)

对《現代汉语外来詞研究》的几点补充意見.....胡 双 宝 (348)

《少数民族語文論集》第一集出版.....昌 (327)

《語言研究》第三期出版.....沁 (349)

动 态

語言研究所青年积极推广汉语拼音字母.....庄 張 (314)

武汉語言学会成立.....葦 (329)

四川省全面推广汉语拼音字母和普通話.....劳 衛 (350)

第三批推行簡化字表..... (343)

社 論

在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 为實現文化革命而貢獻出我們的全部力量

在总路綫的鼓舞下，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热火朝天地在各个战綫上，为多快好省地把我国建設成为一个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学文化的偉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貢獻出每个人的全部力量。我們語文工作者的貢獻主要是在文化革命方面，特別是在于使劳动人民和新生一代更容易地掌握祖國的語言文字，并使祖國的語言文字更有效地为政治、經濟、文化、科学的不断发展服务。具体說来，主要工作包括扫除文盲、改革汉字、帮助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推广普通話、建立大众化的汉语語法体系、調查方言、整理普通話詞彙、編輯字典詞典、注釋和翻譯古典文学作品、編著学习外国語的工具書、改进翻譯工作等等。

为了多快好省地完成上列主要工作，我們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端正立場，改进工作方法，兴無灭資，树立無产階級思想的領導，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第一，我們要破除对古人、对外国、对旧傳統的迷信。古人和今人生存在不同条件下，古人和今人的思想意識是不同經濟基础和不同生存条件的反映。因此，古人所想、所說、所做不可能完全适合我們今天的需要。大家都知道，作为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語言文字是隨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因而古代的語言文字和現代的語言文字有显著的差別。过去在長时期內，我国知識分子有厚古薄今的偏向，往往認為現代的語言文字不如古代的語言文字，今文不如古文好，对古代的語言文字的研究特別有兴趣，而对現代的語言文字的研究就不重視。現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为了糾正这种偏向，我們要提倡厚今薄古，才能够使語言文字的研究更有效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迷信外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遺留下来的殘余思想。我們要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但是因为外国的实际情况跟我国的不同，我們就必須結合着我国的实际来学习外国的先进經驗，絕不能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語言文字的研究也不是例外。

迷信旧傳統是厚古薄今的具体表現之一，必須加以糾正。旧傳統是建立在旧的經濟基础和旧的社会制度之上的，因而就不可能跟新的經濟基础和新的社会制度完全适应。語言文字不断地發展着，使用旧的語言文字的规范来表达現代的思想、感情，必然会跟现实生活脫节和脫离人民大众。同时使用旧的語言文字的规范来衡量現代的語言文字，也是不适当的。

我們必須破除各种迷信，解除思想上的各种束縛，才能够使思想得到解放，才能够本着敢想、敢說、敢做的精神，适应着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在語言文字的研究中来个大躍进。

第二，我們要端正立場，也就是要解决語文工作为谁服务的問題。語文工作應該面向工农，面向新生一代，为工农和新生一代服务。上面已經說过，我們語言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使劳动人民和新生一代更容易地掌握祖國的語言文字，并使祖國的語言文字更有效地为政治、經濟、文化、科学的發展服务。为此，我們要有劳动人民的立場，群众观点，才能够胜利地完成上述的任务。

第三，我們要改进工作方法。那些脫离群众，关起門做研究工作，鑽牛角尖的、学院式的研究和厚古薄今的做法，必須徹底加以糾正。

第四，我們要兴無灭資，树立無产階級思想的領導，清除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思想是一切工作的灵魂。無庸諱言，語文工作長期受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影响，妨碍了工作的进展。具体的表現是研究工作往往从个人的名利和兴趣出發，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用的是主觀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特別是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思想方

法。为了兴无灭资，我们要加强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学习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应用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辯証法和唯物論去解决語文工作的問題。这就需要我們到群众中去，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研究分析他們的語文問題和需要，用辯証法和唯物論的观点、方法，实事求是地解决人民大众的語文問題。只有通过这样的实践，才能够达到兴无灭资、又紅又專。只有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大躍进，才能够在語文工作中来个大的躍进。

关于具体工作，我們在上面已經列举扫除文盲、改革汉字、帮助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推广普通話、建立大众化的汉语語法体系、調查方言、整理普通話詞彙、編輯字典辞典、注釋和翻譯古典文学作品、編著学习外国語的工具書、改进翻譯工作等等作为主要的工作。这些是我們初步的、不成熟的意見，仅供讀者的参考。我們希望語文工作者展开討論，共同研究，訂出計劃，分別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崗位上实施。

关于扫盲工作，現在已經成为一个广泛深入的、規模巨大的群众运动，并且已經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目前所做的主要是突击認字的工作，如何巩固提高还是一个大問題。关于这方面，主要是倚靠大量举办业余初等学校和大量編印通俗書报和讀物。根据江苏省的扫盲試点的經驗，用拼音字母給汉字注音能够多快好省地認字，又能巩固提高。山东和河北兩省正在进行着同样的試点工作。我們建議各省市，特别是北方話地区，也进行同样的試点工作，总结經驗，大力推广汉字注音的書刊文件。

扫盲是文化革命的一項極重要的工作，我們語文工作者應該積極地投入這項工作。在这方面，語文工作者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如編著教材、改进教学法、創制教具、总结經驗等等。

关于汉字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上，刘少奇同志的工作报告里已經明确地指出，“積極地进行汉字改革”是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又根据周恩来总理所做的关于文字改革的报告，简化汉字是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之一。为了适应人民大众的需要，我們要大量地简化汉字，除已經公布的简化字外，还要(1)尽量使用以行草書笔画为依据的偏旁类推的办法，使大批有关的字得到简化；(2)整理現在流行的简化字，加以肯定；(3)根据简化字的規律，創造简化字。

根据上述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也是当前文字改革任务之一。汉语拼音方案已經在本年初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批准，正在推行中。語文工作者应積極地推行这个拼音方案，如給汉字注音，作为推广普通話的正音工具，用来扫盲認字、巩固提高，用来研究和試驗拼音文字，用来編索引、排順序、編大綱等等。

关于帮助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民族語言工作者已經做出了显著的成績。目前的問題是根据总路綫的精神，作出更大的貢獻。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少数民族設計文字方案的共同基础，是繼續进行工作的便利条件。

推广普通話工作已經有了很大的进展。我們應該根据国务院 1956 年的指示，多快好省地繼續大力推广。語文工作者應該以身作則，学好講普通話，起帶头作用。

扫盲后，人民大众需要学习語法，以便掌握祖国文字的应用規律。因此，建立能反映大众語言实际情况的汉语語法体系，以便編著通俗化的語法書，是非常迫切的任务。我們希望各地語文工作者組織起来，分別进行研究編写工作。

調查方言工作已經有了很好的开始，我們希望各有关省把初步調查的結果加以总结，并且在現有的基础上，訂出作进一步調查的計劃。

目前推广普通話工作着重在語音方面。究竟哪些詞属于普通話的詞彙，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过去我們对這項工作不大注意。現在我們應該急起直追，積極地进行整理普通話詞彙工作。

編輯字典詞典工作正在进行着。我們希望有关机构尽快地完成任務。我們特別希望能够有一本合乎人民大众需要的詞典。

关于其它主要工作，如注釋和翻譯古典文学作品、編著学习外国語的工具書、改进翻譯工作等等，我們希望有关語文工作者也能够在这几方面来个大的躍进。

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建設的極重要的工作之一。我們語文工作者对文化革命有特別重大的責任。讓我們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为实现文化革命而貢獻出我們的全部力量！

語言學課程整收芻談

馮文炳*

東北人民大學

厚今薄古，理論聯系實際，這是我們在教學和科學研究上的指導原則。大學里的語言教學，恰恰同這個原則相反，是厚古薄今，理論脫離實際，這是我們今天必須要正視的！

首先我想談談，“今”對我們提出了什麼要求？我認為有以下几方面：1)在漢語拼音方案制定以後，在實踐上語法有重大的指導作用。舉一個例子，人民日報社論《把總路線的紅旗插遍全國》里面有個帶有附加語的名詞“解放了的、覺悟了的、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的六億多人口”，其中“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的”等於一個形容詞，把“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聯在一起，後面共一個“的”，故中間用“和”這一個連結詞來連結，那麼拼起音來這個“的”就不單屬於“組織起來”。這裡我們首先要認識漢語連結詞的功用，它同外國語的連結詞的功用絕不一樣，外國語的連結詞的功用在漢語里是沒有的，如說馬、牛、羊三件東西就說“馬牛羊”，不說“馬牛和羊”，而我們在講語法的時候不認清這個實質，現在碰到實際問題，“理論”就脫離實際了。2)青年讀古書，認為古書難懂。其實古書並不是神秘的，就文學遺產說，如果是好的東西，有被我們接受的价值，它一定不難懂，在於老師教給學生以語法和詞彙的知識，讓他們熟練地認識到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基本上是一致的。舉一個例，我曾經把下面的詩經的句子分作三行寫給學生看：

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告訴他們這三句四言詩是說種着榛、栗、椅、桐、梓、漆六樣樹，將來又于椅、桐、梓、漆四樣樹上取為琴、瑟之材。并讓他們注意漢語里同性質的許多東西（這裡是許多名詞）連結在一起不需要連結詞。學生听了很高興，而且有胆量去接觸詩經。3)在寫普通話時，要注意老百姓一般口頭上不用而文言中用的某些詞，依然是屬於規範化的漢語的範圍的，如“其”字。請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里面的這一句：“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农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這裡面的“其”字是非常有必要

的，如果把这个“其”字改為“他們”，那就不行了；那“了解他們熟悉他們”里面的“他們”就混亂了！現在因為前面用的是一个“其”字，所以“了解他們熟悉他們”里面的“他們”，很明确的是指“工农兵及其幹部”。可見“其”字在漢語里的作用，在普通話里要把它肯定下來。像這樣要肯定的文言里的字應該作具體的研究。我們在這裡所引的毛主席的話里就還有一個“及”字。另外“置之不理”的“之”字出在周總理的口里，也非常引起我的研究興趣，通過這些，可以使我們從而知道古今漢語的一貫性。4)五四以來歐化在漢語里的作用是很好，我們應該作一個總結，把这个成績肯定下來，對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極有必要。舉一個例子，我們現在習慣了這樣的話：“學習和宣傳總路線。”兩個動詞用一個連結詞連結，後面共一個賓語。這樣的話分明是歐化，說起來極好聽，極響亮。所以好聽，所以響亮，是因為歐化而合乎漢語的規律，合乎漢語為什麼要用連結詞的規律。這樣的話毛主席的文章里最多，是推陳出新的范例。我因為毛主席的這樣的句子，才想到孔夫子“信而好古”是說他信古而又好古，“信”和“好”用“而”來連結，後面共一個“古”字的賓語，我從前確實誤解了孔夫子這句話，因為不懂得語法。在漢語發展史里必須注意歐化這個問題，如加標點符號，如提行、分段的格式，等等，對中國文體起了極大的改變，起了極好的進步作用。當然，這已經說到書面語言的範圍，不是口頭語上面的事。以上說的四項，是我一時想到的，都是“今”對我們提出的實際問題。難道我們不應該“厚”嗎？同時也很分明，要解決這些實際問題，同“古”是割不斷的，其中都有理論。研究這些理論，從而又知道理論本來是解決實際的，離開解決問題就是資產階級的偽理論。中國的“古”，倒也是解決古的實際的，如前人搞音韻學、訓詁學就是為得他們讀經、子、史這類的書。把他們的一套搬到大學的教學里來，便成了不應該有的厚古薄今的現象。更奇怪的是我們公然有“工具書使用法”這種課程，太為今天的青年替古耽憂了！我們倒是應該為青年多做些今天必要的工具書。

其次我想談一談對具體課程的意見。我認為我們參照蘇聯教學計劃訂的語言課程是好的，只是“語言學引論”不如改為“語言引論”更切合實際些。它的內容，就我所想到的，有五方面的東西：1)語言不是上層建

* 作者姓名排列以漢語拼音字母表為序。

筑。2)語言發展与社会發展。3)文言与白話。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好好地講一講,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上面的理論我認为完全可以联系到中国这方面来。簡直可以說白話里只多了“你的”“我的”的“的”这个东西,(这个“的”怎么形成的,以及与这个“的”相关联的一些东西,音韵学、方言学正應該替我們指明出来。这样搞,我們就一点也不嫌这些課程枯燥,就不是厚古薄今!)在其余的方面,文言和白話几乎不能說有差別。我們只看今年的采風运动,該采出多少“古風”来!然而都是今天的劳动人民的偉大的歌謠。我說它們是“古風”,是从語言的規律說的,它們的一大部分是五言詩、七言詩的形式,而詞彙則是我們今天的,因为內容是我們今天的。这幫助我們說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說明語言是全民的,是古人和今人一起創造的,它当然又是發展的。过去文言与白話的提法,是抽象的提法,什么问题也沒有解决。4)文学与語言,這個問題我們也應該好好地講一講,过去我們就簡直沒有講。这里面要講的实际問題很多,比方对于駢文和古文,我們今天應該怎么看法?从語言的角度来看,二者都是合乎汉語的規律的,不这样看就不公平。从語言的角度来看反而看出六朝文的优点,好比庾信对他逃难的描写:“逢赴洛之陆机,見离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長嘆。”这里充分显得汉語的長处,它的主語通常不写出来,它的句与句之間不需要連結詞,它的動詞沒有时和語气的变化。今日的青年太不講究文学語言,就因为大学里沒有講过文学語言。老百姓倒是真真懂得文学語言,因为他们懂得語言,因为汉語是咱們自己的。我引合作化后当塗某一首民歌:“玻璃窗,热水瓶,烟窗灶,新大門。个个穿新衣,戶戶住新房,人人有飯吃,家家有余粮。”这里把几个名詞唱成一个句子,合乎汉語的規律,我們把它同元人的“枯藤、老树、昏鴉、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断腸人在天涯”对比,就可以看出古今是一样的生动。在魯迅的小說里也就有这样的句子:“菴和春天时节一样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中文系的“語言引論”課程里如果把这类的实际問題講得好,很可能引起学生學習这个專業的兴趣;我主張把“語言学引論”改为“語言引論”,这里也正看得出理由,就是从实际出發。5)“語言引論”的內容还应包括汉語规范化這個問題,但不应把这个問題的各方面都講到,那要留到“現代汉語”里去講。現在只向学生提出“普通話”是怎么回事,讓他們知道这是一件重大的事。写普通話是从魯迅写小說开始的,到今天人民日报的社論都是标准的普通話的好文章了。教学方法最好是举例子,例如举出《紅樓夢》的叙述句給学生看,学生便知道魯迅的叙述句才是规范化的汉語。以上是我認为應該开的

“語言引論”課程內容的五个方面。教者必須深入淺出,切合学生的要求,引起学生的兴趣,使他們欲罢不能地进一步學習其他語言課程,同时又知道語言与文学的血肉关系。其他語言課程便是“古代汉語”“現代汉語”、“汉語史”等。“汉語史”這門課程我認为分量無須过多,但必須把古今汉語的規律拿出来,它本身的規律,社会發展促进它發展的規律。“現代汉語”必須包括訓練写作。旧日讀書人有看、讀、写、作四件事,我們今日也要有三件事,就是看、讀,再加上一个“写作”。語言这个东西离不开“讀”,朗誦会之类也属于讀。

关于專門化的課程我不能談。我建議開設下例的选修課程:“文学語言史”,“历代作家語言与民間文学語言的比較”,“从語言角度比較周秦文、六朝文、唐宋古文、明清小品文”,“詩賦詞曲的語言”,“新詩的語言”,“毛主席著作的語言”,“魯迅的語言”,“五四以来小說和散文的語言”,“新民歌的語言”。

苗信奎

北京师范大学

我在北京师范大学教現代汉語。自双反运动以来,深深感到汉語課在教学方面存在許多严重的缺点。其中最突出的缺点是:

1)脱离实际。第一,脱离当前实际。比如过去在汉語教学中对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話和汉語规范化等重要問題很少注意,或者注意得不够。第二,脱离学生水平实际。学生接受的能力怎么样,學習的情况怎么样,思想活动又怎么样,教的人不大摸头。又由于知識的灌輸比較多,練習运用的机会少,就养成学生們眼高手低,不能独立解决实际問題。第三,脱离中学实际。高等师范学校中文系培养的是中等学校的語文教員,但是我們对中学語文教学的情况不很了解,甚至連我們教的語法体系也有許多地方与中学《汉語》課本不同。2)抱殘守缺。我們強調自己所教的語法体系,死抱住老一套,不肯吸取別人長处。对中学《汉語》課本也常常采取批評、否定的态度。这完全是腐朽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思想在作祟;給教学帶來無法估計的損失。有的同学在大字报上說:“为了維持学派呢,还是为了解决問題?”这話确实給我們敲起了警鐘,批評得非常对。

因此,我觉得語言課的教学改革,在教学思想方面必須 1)打破“一家之言”、“唯我独尊”的个人主义思想,建立集体主义的观念。教师應該認識到教学不同于自己写論文。写論文可以“百家爭鳴”,暢所欲言;而教学則是在一定的時間內,为了一定的目的,培养出合格的干部,因此教給青年的知識應該是成熟的(或比較成熟的),适用的。当然自己有不同看法也还是可以談的,但應該是一种商量、研究的度态,啓發后进的口吻。

絕對不應該給學者一種別人都錯，只有先生對的感覺。我們是師範大學，培養的是中學語文教師，對中學漢語課本的體系，就應該先講透徹，再在這個基礎上適當地說明有不同的看法。過去一些人思想里認為這樣一來，豈不是作了中學漢語課本的尾巴了嗎？實際上這就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獨搞一套的思想的反映，也就是忘掉培養的對象是為了干什么。2)打破語言科學獨立性、系統性的神秘觀點，建立語言課為文學服務，為提高寫作能力的思想。語言科學誰也不能否認它的獨立性、系統性。問題是過去我們太強調了它的獨立性、系統性，幾乎發展到為語言而語言的地步，說什麼學了語法並不能解決提高寫作能力的問題。試問學語言課不是為解決實際需要的話，這種課还有什么開設的價值呢？因此，語言課必須徹底肅清教的人腦子里的資產階級思想對語言科學的影響，貫徹黨的政策，注意實用，加強練習，即把教學建立在實踐基礎上。使學生能說會寫，眼高手也高，能解決實踐中所遇到的困難。3)打破現代漢語各部分聯系少或沒有聯系的局面，建立各部分密切配合的關係。現代漢語各部分實際上是比照蘇聯現代俄語教學大綱而定的。各部分先後次序也是照俄語教學大綱的，但是各部分之間的內部聯系究竟如何，是否可以揉在一起講，我們並沒有怎麼研究過。因此，各部分之間有的有重複，有的該配合在一起講而沒有這樣作，結果形成教者沒有進一步解釋語言各部分之間的關係，學者也感覺太容易、太瑣碎，而沒有興趣學，更沒有感到學了有用。那麼，現代漢語具體內容的安排、教法等問題，在教學改革的新形勢下，確實值得重新考慮一下。我的看法是這樣：

語音與正音法部分結合漢語拼音方案講，糾正方音，貫徹推廣普通話的方針政策。大班講授，分小班練習。會普通話的學生，應把他們組織起來，分別編入各小班內當小先生。

文字與正字法部分必須貫徹漢字改革的方針政策。一般學生對漢字改革以及正字法有許多糊塗觀念，甚至個別的還有抵觸情緒。教師必須針對各種思想情況作種種說服工作。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在課堂講授以後，適當地組織幾次鳴放、辯論、作解答等活動，徹底解決種種不正確的思想問題。因為師範生將來是要教育別人的，自己思想里不先弄清楚這些問題，就無法以身作則，作一個漢字改革的宣傳員，促進派。

詞匯、語法、修辭三部分問題最多，也最麻煩。我認為應該把語法修辭結合起來講。比如修辭方面主謂搭配、動賓搭配以及附加語與被附加語的搭配的問題，詞性運用正確與否的問題，句式的變化，詞語的對偶、排比等問題，都揉合在語法各個部分里講。等於說一方

面講語言規律、結構，同時就講語言的表達，理論與應用緊密結合起來。語法體系的問題，我前面談過，是大體依照中學漢語課本。體系定了，那麼教的先後次序怎樣呢？有人主張：先教句法，後教詞法，就是說以句法控制詞法。我個人認為還是應該照一般的講法：先詞法後句法，比較順適，系統清楚。過去詞法部分的講授，占用的時間太多了，教材太瑣碎了，必須大量精簡。

詞匯的講授，我認為也必須結合修辭講。詞匯的選擇、運用應該占詞匯學重要的部分。但是，如何選詞，如何用詞，詞義如何搭配等等，都涉及到修辭的問題了。這些都是一般人在寫作方面所最容易犯的毛病，必須着重講授，加多練習，才能對寫作有所提高。

梁東漢

北京大學

目前高等院校語言學課程的教學工作是嚴重地脫離實際的，這表現在兩方面：重理論，輕實踐；重體系，脫離

同學的接受水平。比如：講發音原理、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講得頭頭是道，卻不管同學有哪些音不會發，或者有哪些音區別不出來；講語法則大談自己的一套理論，不管這套理論有什麼用，一方面自己也知道這些理論不能解決語法教學的實際問題，主張“語法無用論”，但另一方面又堅持自己的系統，堅持“無用的語法有價值論”；講漢語史不聯系漢民族的历史，着重談古音，大談現代漢語某一個音的來源，不管同學懂不懂，更不管同學知道了這些“來源”之後有什麼用。這種嚴重脫離實際的現象顯然是“為學問而學問”的資產階級教學思想作祟的結果。在整改中，這種思想必須從根剷除掉。

另一個需要解決的就是“厚古薄今”的問題。目前語言學教學工作存在着顯著的厚古薄今的傾向，無論從現代漢語方面的課程和漢語史方面的課程的比重或者從課程內容的本身來看，都可以看出這種傾向已經達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這種局面必須徹底改變過來，必須從“厚古薄今”扭轉為“厚今薄古”，不但要改變“古”“今”的比重，而且還要緊緊抓住“古為今用”的精神徹底改變所有課程的面貌。

最後一個需要解決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問題。在雙反中，同志們都認識到自己所擔任的課程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並且已經認識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必要性，但怎樣把馬克思主義的紅旗插在自己的教學內容上去，不再像過去那樣貼貼標籤就完了，對這個問題，大家還不是挺有把握的。

在課程的安排、內容等方面也存在着許多缺點。

課程的安排牽涉到整個教學計劃問題，也牽涉到語言、文學分不分專業的問題，在這裡，我們不打算把每一門課程逐一討論，只是舉北京大學中文系語音學和語言學引論這兩門課程為例來說明安排有不合理的地方。

語音學在教學計劃里是一門基礎課，但在內容上又和語言學引論、現代漢語的語音部分有許多重複的地方，同學提了許多意見，但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我以為，教學計劃里安排這門課，重複是免不了的，如果加強語言學引論和現代漢語語音部分的教学，理論結合實際，這門課就可以從教學計劃里剔出來。當然，如果要培養搞語言的同學具有實際的記音能力，光靠這兩門課是不行的，不過，只要我們增開一門“語言調查”，這個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語言學引論是從蘇聯的教學計劃里搬過來的，這門功課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我們搬過來時有點教條主義。這門課在蘇聯的教學計劃里排在一年級，講的是語言學的基本知識和理論，這樣安排是對的，因為蘇聯的中學畢業生在語言方面已經有了一定的修養，比如說，他們在中學就學過基本的語法，所以在語言學引論里講些基本的語法理論，他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們則不同。我們的中學畢業生沒有具備系統的語法知識，但一上大學就碰到這些對他們說來是非常抽象的語法理論，這真是“本末倒置”！我和朱德熙先生討論過這個問題，意見一致：語言學引論不能排在一年級，必須排在他們學過現代漢語之後。

課程的安排必須結合專業的設置討論，根據共產主義教育的精神和培養目標作重新的考慮。

課程內容方面的缺點是理論脫離實際、厚古薄今、沒有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所產生的惡果。解決課程內容問題實際上就是“政治掛帥”的問題，亦即“插紅旗”的問題。“插紅旗”的問題解決了，課程內容問題也就不難逐漸獲得完滿的解決。

課程的安排和課程的內容與培養目標是密切不可分的，也就是說，專業的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的擬訂都是為達到培養目標而服務的。我認為，解決課程安排問題首先必須解決專業設置問題。

主張不分專業搞專門化的人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下面三種：1)不分專業才能夠“能文能武”，分配工作才容易“對口徑”。分了專業，學語言的畢業後就只能搞語言，學文學的只能搞文學；2)蘇聯不分專業，我們要學習蘇聯，不分專業沒有錯；3)世界上第一流的語言學家都是精通文學的，沒有廣博的語言和文學的基礎就不可能成為第一流的專家，分專業事實上就是不要這個基礎。這些理由，是值得研究的，其中“對口徑”問題特別值得注意。

主張搞專門化的人說，“分了專業，對口徑就難了”，他們擔心分了專業之後，學語言的畢業後不能分配文學方面的工作，學文學的也不能分配語言方面的工作。在我個人看來，“對口徑”有兩種辦法，一種是不分專業，搞語言和文學兩個專門化，培養同學在語言和文學兩方面都有相當的修養；另一種是認真提高基礎課的教學質量（嚴格地要求能夠解決實際問題），劃分語言和文學兩個專業。依我看，基礎課教學質量的高低是能否對得上口徑的關鍵性問題。如果我們的基礎課教學不能保證質量，不能培養同學具有獨立分析問題及獨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那麼，即使學語言的在學校里多念了些文學方面的課程，學文學的也多學了一些語言方面的課程，他們依然是對不上口徑的。問題不在於多學或少學一些功課，而在於我們的共同基礎課能否解決問題，即能否培養同學具備獨立的工作能力。說得具體些，那就是，一個學語言專業（如果分專業的話）的同學如果學了“文學學引論”之後就具有獨立分析作品的能力，學了“中國文學史”之後就具備豐富的有關文學史方面的知識，而且能夠應用這些知識解決實際問題，我想，他畢業後不但可以做一個語言研究工作，而且可以做中學教員（教“漢語”和“文學”課），做文學研究所的研究實習員。同樣，語言方面的基礎課如果能解決問題，文學專業畢業的同學不但可以當一個文學研究工作，而且可以做中學教員（也會教“漢語”），做語言研究工作。相反，如果“文學學引論”和“中國文學史”等文學方面的基礎課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我想，即使再學幾門文學課，也談不到“能文能武”，同樣道理，語言方面的基礎課如果不能解決問題，同學即使多念幾門語言課，他們也不可能“文武全材”。總之，問題在於我們的共同基礎課不能保證質量，能不能提高質量，能不能解決問題，如果能，“對口徑”就不大成問題了。

也有人以學習蘇聯為理由來反對分專業。我看這“理由”不見得能站得住。學習蘇聯是我們的堅定的信念，但我們也反對生搬硬套。蘇聯的中學畢業生，無論在語言和文學修養方面都比我們的中學畢業生高得多，他們到了大學之後，因為基礎好，即使不分專業，課程門數多，他們也可以應付得過來；我們的畢業生，語言和文學的修養都不如人，不但外國語基礎不好，而且連現代漢語和閱讀古書的能力都很差，生搬硬套地“學習”只能造成同學負擔過重的惡果（這並不是妄自菲薄，實際情況是這樣）。“蘇聯不分，我們也不分”，這不是“學習”，而是“生吞活剝”。

也有人說，世界上第一流的語言學專家都有博大精深的基础，不但精通語言，而且精通文學，分專業就缺少这个基础。我們不否認世界上第一流的語言學家

都有广博的基础这个事实,但是我們也要指出,这些所謂第一流的專家也不是一出学校大門就成为第一流專家的;他們的“博大精深”的基础也不是在大学短短四五年內建立起来的。李始美同志是防治白蟻的世界上第一流的專家,但是他也并不是先把“动物学”“植物学”“化学”等先打个“博大精深”的基础然后才来研究防治白蟻。如果按照这些人的主張去做,李始美同志今天絕不可能取得这样偉大的成就。很明显,这是培养人材的兩条不同的道路:资产阶级的培养先有“博大精深”的基础的少数人的道路和工人阶级的多快好省的的道路。我們要培养的是成批的既懂語言又懂文学的既是通才又是專家的普通劳动者,而不是少数的有“博大精深”基础的所謂“第一流的專家”。

不分專業有不分專業的好处:文学、語言兩方面的發展比較平衡,比較容易“对口徑”(不至于有这种現象:語言專業畢業的学生分配文学方面的工作);分專業也有分專業的好处:比較易于專深,負担比較輕,功課比較容易安排。分不分,这是整改需要解決的問題,我在这里只是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供关心這個問題的同志們参考。

林 奎

北京大学

过去几年高等院校中文系語言学課程的改革成績是必須肯定的。由解放前的文字、音韵、訓詁老一套到今天的語言学引論、現代漢語、古代漢語、漢語方言学、漢語史,應該說是經歷了一次根本方向性的改革。教學計劃中語言学課程時數加多了,語言学地位显著提高了,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

語言学課程虽然有了根本的改变,但是同学學習語言学課程的情况可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变,大多数同学还是听見語言学課程就头痛,还是怕分配到語言專門化。并不是語言学課程天生的“倒胃口”,也不是課程的安排还有什么方向性的錯誤;根本原因在于各門課程的內容都严重地脫离实际。課程的安排虽然有了根本的改变,可是講課教師的思想还没有根本的改变,結果是新瓶裝旧酒,問題还是得不到徹底的解決。

我認为今天語言学教師也是迷信太多:迷信古人,迷信洋人,迷信权威,迷信自己。大家自然都知道應該批判地接受文化遺產和資產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个大道理,可是在具体工作中,提起戴、段、二王,有的人还不免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想法;提起高本汉、赵元任,有的人也不免起一种自愧弗如的念头。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如何拿得出勇气来認真地批判他們,即或批判一兩句,也不免蒼白無力,軟弱非常。批判不倒这些人,

在語言学界就树立不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紅旗。我們應該培养同学有超越这些人的气魄,难道掌握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語言学家会赶不上資本主义甚至封建主义的語言学家!

要赶上他們,就不能再走他們的老路,那条路是走不通的。我們自己就是从那条路上碰回来的,絕對不能教育同学們再走那条路。我們應該告訴同学們走結合实际的路,但是,可惜过去我們的眼睛只是向后看。看不起結合实际的工作,在課堂上自然也講不出結合实际的东西。于是,只能把語言当做死板板的东西,在那里做純客觀的分析。培养同学具有分析語言的能力自然是應該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忽略了同学运用語言的能力,分析語言的目的應該是为了更好地运用語言。今天的情况是,同学縱使能从課堂上学会如何去分析現代漢語,如何去了解漢語历史發展的情况(实际上大多数同学並沒有学会),但是並沒有能提高他們运用語言的能力,原来写不通文章的人文章仍然写不通,原来不会說普通話的人仍然說不好普通話,原来讀不懂古文的人仍然看不懂古書。也难怪同学們提出这样的問題:我們学了这么多語言課究竟有什么用?

联系实际首先要由課程內容和教学方法入手。語言学过去是很少联系实际的,因此,今天許多具有巨大意义的工作如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話,編詞典等等,我們常常感到不知道應該如何把这些工作貫徹到教學中去。过去我們熟悉的东西有一部分要閑起来了,有許多我們不熟悉的工作等待我們去做。讓語言学課程內容真正能够密切联系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实际和同学运用語言能力的实际,这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是,只要政治挂了帅,插上了紅旗,我們就能拿出最大的勇气把这件事做好。自然,为了联系实际,課程的安排也必須有所改变。例如,必須增加培养同学写作能力的基础課程,讓写不通文章的同学能写通文章,已經写通文章的同学能写得更正确、更鮮明、更生动。必須开出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設密切結合的專門化課程,如“文字改革”“詞典編纂法”“方言地理学”“作家作品語言研究”等等。

最后,想談一談語言和文学是否應該分專業的問題。應該不應該分專業是由社会主义文化建設需要決定的。如果成立語言專業,就必須和国家对語言学專門人材的需要对上口徑;也就是說,社会主义文化建設是需要我們培养出大批能“文”能“語”的人材,还是需要我們培养出大批專攻語言的人材?將來我們培养出的人材是到高等学校或科学研究機構的多,还是到基層工作的多?分專業問題已經討論了好几年了,始終沒有結果,这次必須把這問題徹底解決。在我个人看来,国家目前急需的是大批能“文”能“語”的人材,是大批

到基層工作的人材。專攻語言的人材自然也需要，但一定要比前一種人材的需要量小得多，這種人材可以從語言專門化的學生中去挑選，沒有必要單為他們成立一個專業。因此，至少在最近幾年，似乎沒有必要成立語言專業，在語文專業之下分設語言和文學兩個專門化可能是目前較好的辦法。

呂叔湘

語言研究所

關於語言課程的設置，各個學校不盡相同，同一門課程在不同的教師手上教學的效果也不會一樣。我在這個問題上所能說的話是根據我的範圍有限的觀察和個人接觸，有很大的局限性，未必適合所有的情况，這是必須首先聲明的。

總的一句話，現在的語言課程的教學是脫離實際的：脫離學生入學時候的實際，也脫離學生畢業以後的實際。

1952年課程改革以後，新的教學計劃強調系統性和理論性，這個精神是好的。但是這樣的教學計劃必須以學生具備一定的基礎為前提，否則就難於達到預期的效果。我們的中學畢業生，大多數不但缺少關於語音和語法的一般知識，並且實際運用語言的能力也較差，如果不針對這個情况进行教學，只是按照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趕任務，自然要引起嚴重的不消化症。

其次，多數教師的教學都偏重灌輸知識，忽視培養技能，教出來的學生就不免華而不實。學了語音學可是不能審辨語音，學了語法可是分析不了句子，辨別不了正確和錯誤，學了修辭可是分別不出好文章和壞文章，學了古代漢語可是拿起木版書來斷句無把握，這種情形決不是個別的。畢業之後走上工作崗位，不僅需要有一定的知識，也需要有一定的技能：當教員要校正口音，批改作文，當編輯要在稿件上加工，做研究工作也不是搬弄一些條條所能了事。於是有的後悔當初沒弄清楚用功的方向，難免還要埋怨老師不給指點（這種埋怨不能說毫無理由），有的就大鬧情緒，一個勁兒的要回母校當助教（這就非常奇怪，難道當上助教就能“只說不練”？）。

有人要說：現在光是講授已經感覺時間不夠，學生已經負擔過重，再要求技能和知識兼顧，練習和講授並重，哪來的時間呢？時間是有的，關鍵在於怎樣使用這些時間。現在的問題不是講的不够，而是講的太多。如果能夠把課堂講解嚴格限制在基本概念和關鍵問題上，也就是限制在依靠自學比較困難的部分上（這應該是自明之理：如果是學生自己念得懂的，何勞教師在課堂上代讀一遍？），上課的時間可以減少，減少了還可以容納一部分練習；再在課外布置一些必要的閱讀和練

習，一星期四十八小時的學習時間是大有可為的。“寧可少些，但要好些”，在這裡完全適用。要就不學，學就學透，不但要在理解上能毫無滯義，還要在實踐上能運用自如。不消化的食物對於身體沒有用處，似懂非懂的知識對於腦筋也沒有用處。

底下我想提出一個對於中國語文系語言專門化畢業生的最低要求：

- 1) 能說普通話，能使用漢語拼音方案；
- 2) 能寫清通的白話文；
- 3) 能閱讀一般的（不是特別難的）文言文，斷句不誤；
- 4) 能閱讀一種外國語的語言學書刊（內容不太專門的）；
- 5) 具有語音學基礎知識和一般的審音能力；
- 6) 具有漢語語法基礎知識，能分析一般的句子，能辨別語法上的正確和錯誤；
- 7) 具有語言學基礎知識；
- 8) 具有漢語文學基礎知識，能大致辨別各個時代和各種文體的語言方面的特點。

後四項的“基礎知識”指真正最基本的東西，決不要求如何全面，如何豐富。這樣幾項要求，上面說了，是“最低”的。（如果條件好，行有余力，當然還可以在這個基礎上再提高一步。）按照這個最低要求制定出來的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也許不太富麗堂皇，可是我相信，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走上任何合理分配的工作崗位都會受到歡迎，並且他自己也能够在工作中不斷提高。

總之，在高等學校學習的時期是打基礎的時期。根要扎得深，芽要有活力，以後成長起來是很快的。如果扎根不深，即使看上去好像已經枝葉扶疏，實際上不容易再往上長。換一個比方，我們可以或者把學校當作一個批發商店，讓學生來批購貨色，或者把學校當作一個實習工廠，讓學生來學著干活（在學習操作的同時也要學習一些基礎理論知識，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學習操作），這兩種看法會產生不同的教學方針，也會得出不同的教學效果。商業政策呢還是工業政策？這是必須首先解決的教學指導思想問題。

至於語言和文學要不要分成兩個專業，我認為是個次要問題。語言工作和文學工作都有一個最低要求。如果兩方面的要求有大部分相同，加在一起也是四年或者五年的時間所能辦到，那麼合成一個專業，適當地運用專門化或者選科制，也未始不可。如果兩方面所提最低要求異多而同少，或者有一方面提出較多的要求，那就恐怕難於擠在一個專業之內了。

因為自己不在學校任課，談的也許很不中肯，聊供參考。

馬 子 良

中央民族學院

前些天我聽到一位朋友說，某大學中文系進行教學改革時，關於語言學的課程，學生反映說，一位語言學家講

了五年的語言學概論，只是空洞地解決了四個問題：1)語言不是上層建築，2)語言沒有階級性，3)語言是社會現象，4)語言學的任務是研究語言的發展規律。這四個有關語言學上的重要問題，正確地給學生講授，是必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教學生應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具體解決實際的語言問題。所以這個問題的提出，對於我們語言科學工作者，尤其是對於語言學教學工作者，有重大意義。我們有必要檢查一下過去語言學課程的內容和教學法，及時總結經驗。好的經驗，值得各院校互相推廣；我們要吸取教訓，幫助語言學課程的整改。這對今後培養符合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需要的語言科學工作者是有重大意義的。《中國語文》這次組織關於高等院校語言學課程整改意見的筆談，我認為是很及時和必要的，所以我擁護這一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的討論。以下是我從幾年來有關語言學教學上存在的問題中提出來的幾點意見：

一 語言學理論脫離實際 不可否認，解放後，語言科學工作者在黨的領導下，學習了蘇聯語言學的先進理論，也為我國建設事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做出了不少的成績，如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漢語规范化，幫助少數民族創立文字等工作，以及培養了大批的語言工作者，翻譯和編著了一些有關語言科學的著作。這門在舊時代看作冷門的科學，也一天天地熱起來了；但這些成績還遠遠落後於國家的需要。現在全國正在出現一個文化高潮，廣大的勞動人民熱烈地學習文化，各地正在大力地推廣普通話，少數民族除了學習自己的文字外還要學習漢語文。但是，語文工作者到現在還沒有編寫出適合廣大人民需要的詞典和語法，適合少數民族學習漢語文的教本。在這些工作方面，老專家們有的不屑寫普及小冊子，有的趕着撰著達到或超過國際水平的專著；剛從大學畢業的青年語言工作者，由於在學校只學了一些語言學的空洞理論或教條，而對這些實際工作，心余力絀。我們檢查一下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跟語言科學工作者的脫離實際傾向分不開的。我們先從“語言學概論”這一門入門課程來談。就已經出版的幾本譯著中，蘇聯的幾本著作當然不可能結合中國的語言實際，而我國語言學家所編著的也多半是不切實際地搬套蘇聯的著作，配合點中國例子，甚至依樣畫葫蘆，輾轉抄襲，大同小異。儘管我國語言學近來有很大的新發展，可是蘇聯的教本中沒

有的，或國內已出版的幾本書中沒有的，它也就跟着沒有。因此更談不到如何讓學生應用語言學理論去解決實際問題了。如1957年出版的一本《語言學概論》中，作者在講語言和文字一節里，談語言則追溯到遠古的“北京人”，談文字則起源於古老的埃及、巴比倫，對於具有現實意義的漢字改革和推廣普通話、漢語规范化等，只提到“今後要求書面語的规范化，以加速推廣普通話”這樣一句話。對於我國少數民族的語言文字問題，則在語言分類中轉錄前人原文。如僮族早在1955年就創造了文字，而這本1957年出版的《語言學概論》還沿用舊說：“沒有文字的如廣西僮族……”。對於1956年黨和政府幫助我國十二個少數民族創立和改革十八種文字的事實，作者則只字未提。該書在序言中還強調說是“結合我國實際”。我們可以設想，學生學習這種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語言學，只能得到上面所反映的幾句干巴巴的教條而已。他體會不到語言的現實意義，更難了解這門科學在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重大意義！

二 重理論輕實踐的語言學課 過去語言學的課程，只限於課堂上聽些脫離實際的理論和書本上的知識，忽視了勞動生產教育。語言學研究的對象是廣大眾眾的語言，但是它不與群眾相結合。語音學方面也是離開群眾的語言，只在課堂里作調查方言的實習，學點音標符號。學生在校學了許多理論，一出校門碰到具體語言，就無法應用所學的理論去分析研究。比如，學了中外古今的方言學理論，對於擺在面前活生生的語言就不知如何去劃分方言土語。學了一大堆音標符號，遇到記錄一個活語言就束手無策，或記錄的材料失去真實性。1954年蘇聯語言學顧問謝爾久琴柯教授來我國，他曾詫異地說，為什麼語言工作者都呆在北京而不到群眾中去研究呢？他告訴我們在蘇聯的語言工作者不論專家或學生，每年都要到群眾中去實地調查研究。在他的鼓勵下，不管漢語、少數民族語言的語文工作者才大批地深入到群眾中去，因此在這短短的二三年間，語言工作做得更多更好。但是學生的語言課還是沒走出課堂！

三 脫離政治的傾向 有人認為語言沒有階級性，研究語言的人可以超階級不問政治，可以躲在書齋中去研究。語言雖然沒有階級性，但使用語言的人是有階級性的。如帝國主義國家的御用語言學者，為了他們的主子便於統治和奴役殖民地被壓迫的民族，曾致力於殖民地上的民族語言的研究。英美語義學派，把那些對資本主義的腐朽基礎不利的詞和概念的意思加以曲解，借此緩和工人階級的鬥爭。在解放前，帝國主義的先遣部隊——外國傳教士在我國各民族地區進行特務工作，幾乎沒有一個不是先從研究民族語言着

手，作为毒化宣傳的工具的。在整風初期，右派分子如章伯鈞、陈夢家之流不是也对我们党的語言文字政策进行惡毒的攻击么？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和我国的語言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为了迅速地提高各族人民的文化水平而致力于語言調查研究，解决各族的文字問題，使得各民族能够很快地走进社会主义社会。这些生动事例的对比，还不叫人深思猛省么？我国語言工作者，在过去几年中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政治學習，思想改造，已經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能应用馬克思主义的立場、观点、方法去研究語言或进行教学的人还是不多的。表现在語言实际工作中的，如今年三月間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少数民族語文科学討論会上在肯定二年来民族語文工作成績以后所指出的那样，在工作中还严重地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三脱”現象。語文工作者強調語言的分、异、純，从語言本身孤立地去論証一个民族的分合問題，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因而影响了民族的团結。由于在語言教学中沒有貫徹馬列主义的政治思想，学生脱离实际地記誦一些語言学教条。更严重的是还有不少的語言專業的学生存在着反动資產階級語言学的观点，把語言分为高級的和野蛮的等級，进而造成民族歧視。如某大學語言專業畢業的几个大学生，分配到民族地区去調查研究少数民族語言，他們強調所學的专业語言是用在国际外交場合的，不屑研究这些“落后民族”的語言。他們在去民族地区的途中，因嫌少数民族髒，不願同桌吃飯，因此还未到达目的地，就开了小差。像这种不利于各族人民团結的事例还是很多的，这也就說明了我們的語言教学还没有清除資產階級語言学的毒素和严重的脱离政治的不良傾向！

四 厚古薄今和重洋輕中 語言研究和教学也和其它科学一样地存在着厚古薄今、重洋輕中的傾向，我們打开一部語言学的著作或講义，內容古的多于今的，尤其是有关现实需要的知識則更少。外国的也多于中国的。表现在教学方面也是如此，如講語言的發展变化，可以从三皇五帝談到清代的小学訓詁，而对現代活生生的語言事实往往是一語帶过，更不用說古的如何为今的服务了。对學習苏联的語言学理論，不是結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实际問題，而是生搬硬套，甚至照抄原文，以之著書，以之教学，很少介紹我国的語言情况。如有的学生畢業后，在实际調查我国的語言时，不管我国各族的历史發展和政治情况，机械地把外国的教条扣在我們的头上，因此不恰当地把方言划开或合并，影响了民族間的团結。講比較語言学的人，离开了希腊語、拉丁語就無法举例比較，而摆在面前的我国各民族丰富語言事实，似乎無足道也。所以在很多語言学著作或講义中，只看到輾轉抄襲的世界語言大系，

而我国各族語言的事实，則語焉不詳；給学生一种錯觉，去相信資產階級語言学者一向把中国語言看作不進化的語言，認為沒有比較研究价值的荒謬言論。甚至有人抱怨祖国語言不如外国語言的“粘合屈折”，使他們無用武之地。另外在語言学界对权威学者的迷信心理也是很严重的，如有的青年从实际語言中發現了新的音素或新的規律，若在某專家的著作中找不到这个音素或这条規律，就不敢增減改动。有一位青年写了一篇語法的文章要我看，其中有一个語法例句的主語是“張三”，我給他換了一个名称，他就提出某專家的語法書上用的是“張三”。所以培养出来的青年語言工作者只局限在已有的旧框框中而不能自拔。

从以上所提的几点，可以看出是什么东西束縛着我們語言工作者不能躍進。我認為語言科学工作，不論是研究或教学，首先必須政治挂帅，正如毛主席教导我們的，“沒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沒有灵魂”。过去語言工作者的三脱現象中严重的是脱离政治。在語言教学中我們必須貫徹联系实际，联系生产，联系群众的方針，必須編写結合我国語言实际情况的語言学論述和教材，語言学教学必須給学生一定的時間走出課堂到群众中去，在联系实际中學習語言学知識。更主要的是在群众中劳动鍛煉，才可以提高政治觉悟，从而更有效地为無產階級的社会主义的語言工作服务。中央民族学院語文系的学生，在四年中一定有半年至一年的時間在民族地区跟群众共同劳动，对思想改造，可以收到積極的效果，有的入学时不願做民族語文工作，但經過劳动實習，一般地都建立起为少数民族服务的信心。這項經驗值得我們培养青年語言工作者的參考。

目前全国人民在党的总路綫的指导下，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一日千里，語言学工作者必須徹底扫清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朽思想，拔白旗，插紅旗。破除迷信，厚今薄古，打破旧的思想，坚决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結合的方針，在党的密切领导下，鼓足干劲，奋勇前进！

王 力

北京大学

在大躍進高潮中，我們很容易想到多写几部書，多开几門新功課，以滿足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需要。这当然是很

好的，但是，我个人認為中文系語言学課程的改革，主要的問題是基础課的內容的改革問題。

在过去，我們的基础課如“語言学引論”、“現代漢語”、“漢語史”等的主要缺点是严重脱离实际。今后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做到从三方面联系实际。第一是联系階級斗争的实际，要把馬克思列宁主义滲透到課程中去。过去貼标签的方式远远不能滿足这个要求；今后学生們的政治思想水平逐年提高，我們这种偶然引

經据典的办法而不是融会貫通的办法，实际上不是渗透，而只是裝点門面，我們的学生們是不会同意我們这样做的。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就必须經常进行学术批判。

第二是联系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实际，要把当前的实际問題如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話、汉语规范化、改变文風等，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在这些問題上，首当其冲的是“現代汉语”。学生反映說：“学了語音不会講普通話，学了語法写文章不通”（《中国語文》1958年4月号165頁），这就是脱离实际的証据。我認为今后“現代汉语”这一課程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要求：第一要求学生能掌握普通話的語音系統，非北京籍的学生能基本上掌握普通話的正确發音。（所謂“基本上”就是不勉强学生完全正确地發出自己方言中所不具备的音素，但是要求他們尽可能改变自己的語音系統来适应普通話的語音系統，例如吳方言区域的人应避免濁音和入声。）在掌握普通話的同时，应使学生能純熟地应用汉语拼音方案。第二要求学生不仅能写通順的文章，而且能进一步注意語言的正确性、鮮明性和生动性。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我建議在“現代汉语”中增加两个内容：修辞学和作品分析。語法部分应尽量精簡（对于外国人和外語系、外語学院等，現代汉语另編以語法为主的教材）。我甚至主張打破陈規，不为“体系”所束缚。为了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可以講到邏輯思維，可以講到主題結構，可以講到文章的思想性。我个人以为写作實習可以作为“現代汉语”的一个組成部分，有些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我想分为两个課程也未尝不可，但是二者之間要有适当的分工。总之，今后“現代汉语”要做到不是为分析而分析，而是要达到語言修养的目的。

“汉语史”应该适应中国具体情况，把历史語法和文学語言史揉在一起。应该着重在講述文学語言史。为了貫徹厚今薄古的精神，“現代汉语”和“汉语史”的比重应该是6:4。即以汉语史本身而論，也应该着重近代，例如近代語音的發展，近代語法的發展，鴉片战争以后文学語言的發展等。

“語言学引論”也必须联系实际。举例來說，在講語言和文字的关系及其区别的时候，可以着重討論語言和文字不能混为一談，今天的文字改革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誤会的那样影响到語言的变化，同时也可以介紹苏联关于文字改革的先进經驗。

以前有人建議在基础課方面開設“文字、声韵、訓詁”这一門課程，那是厚古薄今的表現，現在不必再加以考虑了。

从去年起，北京大学取消了“古代汉语”。最近有些同志建議恢复这一課程，目的是培养閱讀古書的能力。

我認为培养学生閱讀古書的能力还是必要的，但是过去学生反映：“教一篇懂一篇，不教的不懂”，所以还得想个有效的办法。我想也許可以采用實習的办法，課堂上只講一些关于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識，着重在学生自己去閱讀古書，教师帮助他們解决閱讀上的困难。

第三是联系学生接受水平的实际。在这一点上，“汉语史”的缺点最为突出。繁瑣的汉语音韵学体系煩扰每一个学生的腦筋。应该肯定地說：这些知識可以放在專門化課程里講授，其中有些东西甚至只有研究生才应该知道。作为基础課的“汉语史”，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来叙述語音的發展。我所写的《汉语史稿》就是脱离学生接受水平的实际的。

其次是“語言学引論”的外國語知識的問題（包括举例和外國語的历史）。既然是“引論”，应该可以尽量少談到外國語。外國語講得太多了，也是脱离学生的接受水平的。这是指中文系所开的“語言学引論”而言；至于俄語系和西語系的“語言学引論”，又当別論。

脱离实际的教学，就是反馬克思主义的和非馬克思主义的教学。我們在口头上誰也不反对理論联系实际，但是一談到具体課程的教学内容，就往往觉得并不需要徹底改革，以为解放九年以來已經改得差不多了。我們很容易这样想：我們現在的缺点只是沒有把我們的理論（指本門科学的理論知識）結合到實踐中去，很少想到我們的“理論”本身就是不切合上述的三方面的实际的东西。我个人認为：如果不徹底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改革会落空的。

要徹底改革教学内容，就要扫除一种思想障碍。自从院系調整以來，特別是1954年以來，大家辛辛苦苦为建設教材而奋斗。現在教材編成了，或者已經編好了一大半，如果要另起爐灶，豈不是前功尽弃了嗎？我想我們应该有共产主义的革命的精神，發現教学上的严重缺点就应该有勇气承認，有勇气改正。

学校和工厂不同。工厂的躍进主要是生产的躍进，而学校的躍进还有一个教学内容的問題。我以为在教学改革工作中，首先要考虑的是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兩条道路的問題，其次才是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費兩種方法的問題。

联系了实际会不会降低語言学的学术水平呢？

我們認为：能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業中解决实际問題的語言学就是达到国际水平的語言学。因此我們既不迷信古人，也不迷信外人，更不迷信書本。要有这样的宏願：我們所培养的后一代一定能創造性地發展語言科学。他們一方面能解决文化建設中的实际問題，另一方面也能概括成为語言学理論，来丰富普通語言学。

殷孟倫

山东大学

在总路綫光輝照耀下的今天，我認為在大学中国語文系汉語言文学專業有分設文学、語言兩個專門化的必要。

大量培植語言工作干部是当务之急。过去从事汉語科学研究的不多，自然是过去对汉語有所輕視，因而对汉語的本質認識不够明确，一說到汉語，大家是比较生疏和無知的。其实我們的党早就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可是有些同志还是認識模糊，不懂得在建設社会主义时期研究語言的重要性。語言是社会的交际工具，是每个人在集体劳动中时时刻刻使用着的。我們既然要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难道不应当深入研究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隨時隨地起着交际作用的語言么？我們今天要早日实现汉語规范化，要在这方面培植工作干部，为大躍进的建設提供新的条件。这一培植責任，大部分应当由大学来負担，不必推委，而且要及时执行。因为扩大了語言工作的队伍，才有力量深入細致地开展汉語的科学研究，进行汉語所担負的一切工作。这一队伍的成員，照現在說，應該大量从綜合性大学里培植出来。

其次，要促进社会主义大躍进，在大学里大力开展汉語的科学研究，非常必要。要使广大劳动人民都能够很好地掌握汉語，运用汉語，正有賴于深入細致地进行汉語的科学研究。比如解放以来，語法修辞研究的成績不算錯，这对社会主义建設就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今天一切都要大躍进，作为交际工具和斗争武器的汉語，对社会主义的建設一定更可起着無可計量的推动作用，因而对汉語的研究就更宜特別注意。这不仅是語言研究所的責任，各綜合性大学也是責無旁貸的，不能放弃这一研究陣地，而把責任委之于語言研究所。过去在汉語教学和研究当中，存在不少問題。今后有了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明确目标，研究的重点應該配合国家政策来进行。教学也是一样。比如推广普通話、文字改革、汉語拼音、方言調查、汉語語法、詞彙、語义等問題的研究，詞典編纂、新聞用語、作家語言研究，等等，都应及时开展，提早解決問題。总的目标，就是为了早日实现汉語规范化，为了促进劳动人民的文化进军。

一些重視文学的同志以为研究汉語，寻求它的內部規律，这和研究文学無關；不懂汉語規律的人，照样可以把文章写得好，也可以进行文学研究。这种說法完全是偏見。当然我們不能說仅仅懂得汉語規律，就一定把文章写得好，也就能够进行文学研究，但懂总比不懂的好。如果搞文学而又真能懂一点汉語的規

律，这对写文章和研究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語言文学关系密切，一个懂語言的人来搞文学同一个不懂語言的人来搞文学，这是不能相提并論的。有些人自以为不懂文学而文章也写通了，这只是遵用旧規，依样葫蘆，並沒有做到自觉自信。所謂真正的好，就是做得出也就說得明。要不然，很难說真好。至于研究文学那更是困难重重了。因此要科学地了解文学，掌握文学技巧，就不能不重視語言方面的研究。大学里大力开展汉語的科学研究，不單是为了祖国語言科学的發展和培植工作干部这一目的，只就搞文学說，無論語言学的作用直接或間接，都是一个不容輕忽的客观事实。不重視語言研究，好多問題就不能順利解决。比如改进文風，即其一例。

上面所談，只是一时所想到的，不一定很正确，但我認為这是时代的使命，不容忽視，因此把这些不成熟的意見提出来，請同志們討論批評。

袁家驊

北京大学

1952年院系調整

以来，綜合大学中文系汉語文專業在汉語和一般語言学方面的課程，以北大为例，約分为兩

类：关于汉語方面的有現代汉語、汉語方言学、古代汉語、汉語史（包括語音史、語法史和文学語言史）；关于一般語言学方面的有語言学引論、語音学、普通語言学、語言学史等。双反运动期間，經過群众大字报的揭發，这八門功課的內容存在着重复、重外輕中、理論脱离实际（即重理論輕实践）等严重缺点。这一系列課程具有比較完整的体系，这一点是無可非議的，問題在于教学内容能不能切合实际。总的目标，每門課的目的要求，尽管都有明文規定，可是从教学效果上檢查，几乎可以說是华而不实，或者說所收获的多半是些“半空兒”。教学内容不能切合实际的原因是很复杂的，这里提出兩個来談談：对现阶段語言科学的發展水平估計不清楚，对汉語文專業学生必須具备的基础知識和技术訓練認識不明确，后者表現在对培养“規格”的分歧見解上。有些人認為培养規格應該注重基础的广博，畢業后才能适应中学、大学和科学院三方面的需要。另有些人認為培养規格應該強調有所專精，畢業后分派在大学或科学院才能担任一些具体工作，当中学語文教师也可以自修补課，边教边学。北大中文系汉語文專業从三年級起分为語言学專門化和文学專門化，可以算是对上述兩種不同的主張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我覺得基本上是正确的。我覺得問題的癥結不在課程表面的安排，因为基础广博和有所專精，看来

虽有矛盾,但不是不能統一的,教学計劃已經体现了这个矛盾的統一。問題的癥結是,上述一系列課程的教学內容,能不能保証給予学生必須具备的基础知識和技术訓練。

教学內容不能切合实际,牽涉到三个方面:学生的接受能力,教师自身的修养和現阶段的科学水平。头三年学生要花大量的時間學習外国語,对語言学和文学方面的功課势必忙于应付,主要依靠課堂上的傳授,有时不得不采取得过且过的态度。教师們这些年来學習馬列主义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多半还没有能够建立無产阶级的宇宙觀和人生观,还不能純熟地运用馬列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处理已有的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这就免不了要犯教条主义,在空洞的概念上兜圈子。至于現阶段的科学水平,在破旧立新、兴無灭資的功力上还很不够,以致往往形式主义地追求所謂科学体系,反而忽略了具体的教学內容。例如我們現在習慣了应用一套外来的或新創的術語,如“形态曲折”、“民族語言”、“文学語言”、“历史語法”等等,可是怎样結合汉語的具体材料,使我們的講授內容充实而且生动,使学生能够接受一些有用的知識,这都值得从教学效果上加以深刻檢查。

理論脱离实际,即重“理論”而輕实践,这个严重的錯誤傾向必然不能保証学生获得必需的基础知識和技术訓練。例如汉語史和古代汉語沒有能够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閱讀古代典籍,汉語方言学沒有能够着重培养学生調查研究方言,現代汉語并不企圖帮助学生提高說和写的 ability。語言学引論,語音学和普通語言学举例过于偏重欧洲語言,不能多多联系汉語和国内少数民族語言。語言学史包罗古今中外,缺乏重点。結果呢,学生学完这些功課之后,似乎懂得許多高深的學問,可是真正能够掌握的知識却很少。

語言学課程的教学內容中尽管存在着这些严重的缺点,但并不否認这些年来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由于大家的努力,也有成功的一面,只是今天用“多快好省”的标准来衡量,这成功的一面是远远不能滿足客观要求的。至于教学方法,尤其急需打破陈規,大力改进。比方說,現代汉語和汉語方言学可以互相配合,利用“生产實習”,在方言比較复杂的地区(如長江以南沿海各省)开辟試驗田,进行方言調查,就地整理,找出方音和标准音的詳細对应規律,隨即設計和編写一套教材,应用拼音字母在广大农村推广普通話,在扫盲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为拼音文字的創立鋪平道路。参加生产實習的教师和同学应该和农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語文工作者首先应该學習劳动人民的語言,才能更好地为劳动人民服务,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貢獻更多的力量。

关于專門化或專業的設置,我也有一点意見。誰也不反对語言学为文学服务的一面。例如音韵、訓詁、文字的考証,属于語言学工作范围,但也是分析古典文学作品所需要的。这些年来,語言学沒有很好地为文学服务,这說明語言学教学和研究上存在着缺点。又如文風問題,是語言学和文学共同关心的研究对象,更需要双方的密切合作。但是服务得好不好,同專業的分合沒有必然的关系。我觉得我国語言科学的基础是薄弱的,所以一向傾向于贊成語言学或汉語学应该成立專業,这对于語言科学的发展也許更为有利。語言科学在我国社会主义文教建設事業中必須充分發揮应有的积极作用。專業也好,專門化也好,我們應該充分在思想上取得一致的認識,把它放在正确的地位,認真地加以培植。分設語言学和文学兩個專業或專門化的同时,也必須強調二者間的相互依賴关系。作为一門独立科学,語言学有賴于文学,也有賴于历史学(包括考古学)。語言学和文学好像是双生子,形影难分,可是同历史学也都有兄弟姊妹般的亲密关系。語言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無所不在的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語言学应该为文学服务,为史学服务,为其他社会科学服务,也为自然科学服务,問題是我們能不能为这門幼弱的科学創造种种有利的条件,使他全面开花。在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我們从事語言学教学工作的都有充分的决心和信心,拔掉白旗,高举紅旗,向远大美好的前景奋勇前进!

朱 星

天津河北师范学院

这次思想改造运动进入揭發批判教学研究工作中的資產阶级思想的阶段后,学生揭發出很多問題。中文系更严重。

語言学課程的主要問題是理論脱离实际,这比厚古薄今还严重。“現代汉語”講得很瑣碎,既不联系中学汉語語法教学和語文教学的实际,也不联系学生写作的实际,更不联系本省各方言区如何學習普通話的实际。“古汉語”也嫌繁瑣,仍旧不能联系中学教学的实际。“語言学概論”更是泛泛之論,引了些外国語言的例子,学生也感到帮助不大,而且不容易接受;其中有些說法还可以从新考虑,不可再迷信。“写作實習”也是語言課程;去年各校紛紛取消,天津河北师院却从实际出發,不但沒有隨着取消,反而加强了这門功課的教学。一年来摸索出一些經驗,以后还須加强思想工作。还有“語言教学法”一門功課,根据今后中学語文課情况,可以和文学教学法合并为中学語文教学法。为了避免重复,“語言学概論”也可以与現代汉語合并。这是师院的教学計劃。至于綜合大学的,我以为今后也要从新考虑。如南开大学等已归河北省,

根据实际需要,其培养目标当以中学語文教师为主,所以教学計划应当力求与师院接近,不可太繁多。为了同时培养研究人員及編輯秘書等,可补充些选科。

文学和語言分开为两个專業,我个人的意見是不同意的。当然北京大学等極少数学校可試做。原因是中学語言与文学既混合着教,培养师資时自然不能分开。二者合則俱彰,分則互伤。教文学而不懂語言学,搞語言学而不懂文学,都是一条腿走路。單从主語、謂語、排句,成語…等去研究毛主席的語言,哪能說明毛主席語言的偉大呢?如果搞語言学的人不願或不会研究毛主席的語言,他还成什么語言学家呢?他怎能滿足今天人民的殷切期望呢?过去把語言科学当

作冷門,今天必須把它搞成熱門,使學生都喜欢学。过去搞語言学的自詡是冷門,以为奇貨可居,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怪。今后必須給語言学开辟廣闊的道路,解决实际问题,使千百万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劳动人民都参加到这一工作中来。

隨着語言学課的改进,要做一連串的工作。希望中国語文社很好地組織一下。如批判在研究汉語中所受的高本汉的资产阶级思想,从新學習和討論斯大林的《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一書(此問題可先在少数人的小組中討論),建立毛澤东同志的語言学理論,解决中学語言文学合并教学中的問題并总结經驗等等。

語言研究所青年積極推广汉語拼音字母

大躍进的形势鼓舞着每个人,为了加速建設社会主义,每个人都發揮了高度的热情,積極地、自觉地投身在新中国偉大的社会主义建設事業里,毫無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青年同志主办的汉語拼音字母講習班的开办就充分說明了这一点。

1958年5月下旬,語言研究所的青年在科学院团代会上提出了“要在科学院北京区範圍内推广汉語拼音字母”的倡議以后,立即得到了各單位团組織、工会和科学院团委的支持。从6月中旬起,拼音字母講習班就陸續開課了。

截至六月底止,已經办了三届,計九个班,已正式上課和已报名的將近一千人。参加學習的,主要是青年科学工作者,其中也有老科学家、工人和家屬。特別使人感动的是,有不少學員在白天緊張的工作了八小时,晚上有別的活动的情況下,还尽量爭取参加早班(6:30—7:20)的學習,一直坚持到底。有一位七十二岁的肖老太太,不仅學習認真,成績很好,而且每次上課都来得很早。

語言所参加推广拼音字母工作的青年同志,白天有日常工作,有的晚上还要赶“七一”的献礼,可是他們有的是热情和决心,他們說:宁肯少休息也要为社会主义事業多献出一分力量。他們虽然沒有教学經驗,但是,肯虛心學習,大胆改革。比如,第一届是采取大班形式上課,三百多人在一起听課,又沒有按文化程度分班。上六次課,每次兩小时,前一小时講課文,后一小时分組輔導。这样一来,講課时很难照顧學員的學習情况,而且輔導工作既費人力,效果又不好。因此,第二届就采取了小班上課,學員自行組織互助組的办法,上課次数改为八次,每次一小时。上課前,以是否学过外文为标准分別編班,教学进度按照接受能力安排。这样改变后,效果比第一届大大提高了。

語言所的青年同志們在社会主义总路綫的光輝照耀下,干劲十足,他們今后不仅在科学院範圍内把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推广拼音字母的工作繼續推进,而且还要深入到海淀区各單位去。据悉目前跟他們联系(有的已經開課)的有北京市化学試制厂、中医研究院和海淀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等單位。

(庄 張)

各高等院校語言學課程整改情況

編者註：整風運動以來，各高等院校的中國語文系的師生們對語言學課程積極地提出了許多改革的意見。有的教研室已經初步訂出改革措施，有的正在討論。本刊除了把有關語言學課程整改的個人意見組成筆談以外，為了使各院校中文系交流情況，互相啓發，便於進一步提出今后的教學計劃，特將截至發稿時所收到的各院校關於這個問題的整改情況綜合報導如下。

北京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的語言教學工作在雙反運動中，受到了很多張大字報和很多座談會的批評。經過教學改革階段的反復討論，大家認識到，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北大語言教學是有成績的，一些新的語言課程開出來了，一些教材編出來了，一些新的教學方式開始採用了；但是缺點也相當嚴重，主要是脫離實際——中國的實際，當前建設和鬥爭的實際，學生的實際。各門功課由於集體協作的精神不夠，和有的課程設置不當，發生重複和脫節現象。

針對這些缺點，現在已經制訂了課程改革的初步方案。“現代漢語”作了重大的革新。改革後的“現代漢語”總的目的是要提高學生的語言修養。要求學生學完這門課後具有這樣三種能力：運用語言的能力，分析語言的能力，鑒賞語言的能力。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改革後的“現代漢語”特重實習：在口頭上，注意學生的發音練習，漢語拼音方案的實際運用，並適當注意學生的語言表達能力；在書面上，要注意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並適當地培養學生在語言角度上對別人的文章有評價的能力。寫作實習是這門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要占全課程的學時的三分之一。

改革後的“現代漢語”每周是四小時，一共學兩年。它的內容包括下列六部分：語音、文字、詞彙、語法、修辭學、作品分析。其中前四部分雖是原來的“現代漢語”就有的，但在改革後的“現代漢語”中，它們的內容、要求和講授方法卻大不相同。修辭學部分，從文章的思想性、邏輯性和主題結構一直講到語言的技巧。作品分析部分，先講文體的分類，再選各種文章（論文、演講、小說、戲劇、詩歌）從語言角度上分析它們的明確性、鮮明性和生動性。民間文學和應用文也要講一些。

“語言學引論”修訂了教學大綱。為使學生了解語言學的基本概念和一般知識，大綱重視結合學生的實際水平，避免不必要的煩瑣的講授，並且注意和“現代漢語”的分工配合。“語言的社會本質”部分採用了印發資料自學，辯論，解答問題，做總結的教學方式。講授順序作了部分更動。

“漢語史”和“古代漢語”兩門課程，準備徹底加以改革。“漢語史”的改革將大力貫徹古為今用的精神，

並且克服過去嚴重脫離學生實際水平的缺點。開設“古代漢語”的重要目的是培養學生閱讀一般文言文的的能力。這門課要改變過去那種單講文言文選讀或文言語法的傾向。準備把語法和范文緊密結合起來，着重講解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二者語法、詞彙的不同點，並配合多種多樣的練習來提高學生閱讀文言文的能力。

專門化課程糾正了過去因人設課漫無計劃的缺點，首先要保證開好一些語言專門化學生必修的專門化課程。

改革後的“漢語方言學”基本上要擔負起原來“語音學”和“漢語方言學”兩門課的任務。學時減為一學期3，一學期2，但還要保證提高教學質量。明確規定這門課程的中心任務是“培養學生調查方言的工作能力”，並且“使學生具備關於漢語方言的一般知識”。生產實習是這門課的重要組成部分，放在上課的兩個學期之間的勞動鍛煉時間內抽一個半月進行。第一學期着重語音訓練，第二學期着重指導學生寫調查報告和介紹漢語方言。課堂教學，練習應多於講授。

“普通語言學”的教學採取講授和討論相結合的方式，並參考了蘇聯新教學大綱，結合中國實際，改革了教材內容。其中“普通語言學的历史”部分，除重點介紹歐美幾個重要學派之外，還要介紹蘇聯和中國語言學的情況。“語言學方法”部分增加“語言地理學”和“語言的結構研究”。中國當前的語文問題，這門課中也要作理論的探討。

在專門化的課程中還增設了“漢語語法問題”和“六十年来中國語言學的介紹和批判”兩課，另外又設立了“專題講授”的課程。其中“六十年来中國語言學的介紹和批判”原是漢語教研室的科學研究規劃中的一部分。他們為了在教研室清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影響，樹立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紅旗，才制訂了這個研究題目。這一方面可以使教研室的教師（尤其是老教師）結合研究開展學術思想批判，清除自己的資產階級的學術思想；另一方面還可以把我國六十年来語言科學的發展給以總結和評價，使年青同志知道哪一些東西是應該繼承的，哪一些東西是必須揚棄的。漢語教研室的教師準備人人動手，互相協作，把這個研究題目寫成專書，作為明年國慶節的獻禮。語言學教研室為了

提高教學質量和開設新課，已經訂好一些集體合作的研究項目。為了批判歐美各資產階級語言學學派，他們計劃先翻譯出這些學派的代表著作的主要部分。語言學教研室的全體研究生和助教決定苦戰兩個月，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語言學基礎”，編出一套資料和一部專著。現在，北大中文系漢語和語言學兩教研室正在繼續考慮各方面的意見，並且進一步研究各門課的具體內容。大家決心再接再厲，把教學改革進行到底。

(吉常宏 石安石)

復旦大學

中文系語言教研組的教師，近幾年來在教學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成績是應該肯定的。但是，最近在教學改革中，從同學所貼出的大字報、“萬言書”、師生座談會、教研組會議以及教師的自我檢查里面，也揭露出不少缺點。從所揭露的材料來看，教學態度、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問題。在教學態度上，管教不管學的现象比較普遍。在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上，最突出的缺點是理論和實際脫節，這是整改中的關鍵性問題。理論脫離實際具體表現在下列几方面：

1) 脫離當前的實際，厚古薄今：在教學過程中，對黨的語言政策宣傳得很不夠，往往脫離當前學術界重大事件和論爭。同學的大字報曾經這樣提過：“希望在‘語言學引論’課中隨時隨地貫徹黨的語言政策。譬如‘漢字改革問題’不僅在講授這個問題時要提到黨的語言政策，平時也要結合着講，而在‘漢語拼音方案’公布以後，授課老師並未向我們作必要的宣傳。”有些同學讀了好幾門語言課程，但對文字改革的可能性、必要性估計不足，對漢語規範化的重大意義也認識得很不夠。

在課程開設和畢業論文的選題方面，有厚古薄今的傾向，特別是專門化和選修課程，以古漢語為研究內容的比較多，有些學生受了影響，認為現代的沒什麼搞頭，只有搞古的才能夠顯示自己的學識淵博，於是在畢業論文選題上，寫古代的比較多。

有些課程在舉例子時，往往舉古代漢語。同學大字報說：“‘語言學引論’和‘修辭學’，舉例時古代的例子舉得多，現代的舉得少，難道現代文人運用語言遠不及古人嗎？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是近代運用語言的巨匠，無論什麼舊體詩詞他都有，為什麼不拿他的作品做例子呢？”

2) 脫離漢語的實際，重外輕中：語言學理論課程的內容中，貫徹馬列主義不夠，過多地闡述概念和術語，有教條主義的傾向，而且偏重在印歐系語言。在闡述各部門的規律時，詳舉俄、英、德、法的語言事實為例，總是“言必稱希臘”，對漢語的事實講得很不夠，斯大林怎麼說，就怎麼說，契科巴瓦怎麼講，就怎麼講，生

搬硬套。由於重外輕中的現象存在，所以在對資產階級語言學說的批判上，就顯得軟弱無力。

這種教條主義、重外輕中的傾向，使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的質量都無法提高。

3) 脫離同學接受能力的實際：有些課程的教學內容不是從同學的水平基礎出發，而是從教師的主觀願望和興趣出發，如“現代漢語語法”數詞和量詞一章講得特別詳細，因為授課教師對這個問題有研究；又如“音韻學”上古音部分講得多，也是因為授課教師在這方面有修養。這樣子講，同學不一定能接受，教學效果并不太好。

4) 脫離語言實踐的實際：在教學過程中，光強調要灌輸系統知識，但對這些知識的具體運用，卻交待得不够明確，如“現代漢語語法”的講授，重在體系的介紹，術語的闡明，忽略了語言的實踐。還有語音方面，也是缺乏實際練習，國際音標學了兩三次，到現在還有不認識符號，不會發音的。學了“現代漢語語音”，拼音字母還不會用。“漢語方言”課里有方言調查法，但我們的同學還不會做方言調查的實際工作。

此外，教師之間平時互不通氣，各搞各的，課程與課程之間內容重複的現象也相當嚴重，尤其是“語言學引論”中的語音部分和“現代漢語”的語音重複得很厲害，“現代漢語”本身也有重複的現象。

從上列這些問題來看，教研組存在的缺點的确很嚴重。必須先統一認識。為此，在整改中，教研組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先統一了認識，然後再進一步從思想上來檢查產生這些缺點的原因。教師們都認為教學上理論脫離實際，厚古薄今，重外輕中，都是由於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的作祟。

為了加強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的學習，使理論能更好地聯繫實際，中文系制訂了語言學理論的學習計劃，結合當前的文字改革問題、改進文風問題進行了討論；成立了一般語言學教研組，以加強理論課程的教學和科學研究工作；設立了教材編寫小組，以避免課程間內容的重複。為了更好地了解同學的學習情況，有的教師經常到同學宿舍去訪問，有的教師還在一個班級種“試驗田”，吸取意見，隨時改進教學。在課程方面，根據同學對各課程提出的意見，每一門課都進行了討論，提出整改意見，並擬出初步整改的方案。

前一階段只是進行了點滴的改良，特別是在課程整改方面，依舊是束縛在舊的框框里，沒有全部解脫出來，改得很不徹底。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以後，教研組的教師通過學習和宣傳總路綫，以及前一階段的整風學習和教學改革的討論，在黨的領導下，在同學大字報和“萬言書”的啓發下，更進一步認識到教學上缺點的嚴重性。如果不大整大改，大破大立，教學上的大躍進是

不可能的。教师都表示，一定要拔白旗，插红旗，鼓足干劲，多、快、好、省地来培养学生。根据这几天来讨论的结果，中文系决定成立语言学专业，因此教学计划、教学方式、方法都有彻底修改的必要。修改的原则是：

1) 理论课的讲授，必须结合汉语的语言事实，要把汉语的语言现象总结到语言学的理论中去，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偏向。

2) 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扭转厚古薄今、重外轻中的不良倾向。

3) 砍掉一切不必要的课程，设置技术课和其他必要的课程。减少学时，提高质量。适当安排选修课和基础课。一二年级的课程以掌握专业知识为主；三四年级的课程，着重在调查、研究、总结，以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为主。组织科学小组，领导同学进行科学研究。

4) 根据不同课程的要求，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方式。如某些课程可以突破45分钟的讲课形式，用大报告，小组讨论，然后总结的方式。

根据这几个原则，语言教研组的师生进行了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家提革新方案。经过多次讨论，综合各方案的意见，取长补短，制订了一个新的专业教学方案。这个方案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厚今薄古的精神，在课程设置和时间安排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跃进。表现在课程设置方面，一些不必要的课程，如“古书疑义、甲骨文”等砍掉了，新开设了“党的语言政策、文字改革研究、资产阶级语言学说批判、毛泽东语言研究、建国以来词彙发展研究”等等。在时间安排方面，大量地精简课程，紧缩时间，新方案中四年的总学时是2240学时，比原来高教部订的教学计划的总学时减少936学时。这些砍下来的时间，便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思想解放，不至被过多的课程来束缚住；也便于更好地进行调查、研究和总结工作。

下面附列这个新方案的草案，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指教。

选修课举例：词典编纂法，文学语言研究，历代作品选读，汉字研究，现代汉语专题研究，鲁迅语言研究，语文教学法及实习，一般语音学，语言学专题研究，语法理论，语言学史，语言学论文选。

专业课程表说明：

1) 政治课每学年暂定四学时。教学形式和实际学时听候学校统一规定。

2) 外国语暂定第一学年4学时，第二学年3学时。至于教学方式、方法以及实际学时由外文系决定后再作补充和修改。

3) 体育课暂不列入表内，今后是否开设，尚待研究。

4) 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的写作期限，目前很难确定，以后具体考虑。

1958年7月号

5) 各课程的课堂讨论、课堂实习的实际学时，暂不作规定，以后由各课程的任课教师，按实际情况酌量确定。

语言学专业教学方案(草案)

次 序	课 程	学 时	按学年及学期分配							
			第一 学年	第二 学年	第三 学年	第四 学年				
			一 学期 17 周	二 学期 18 周	三 学期 17 周	四 学期 18 周	五 学期 17 周	六 学期 18 周	七 学期 17 周	八 学期 18 周
1	政治课	560	4	4	4	4	4	4	4	4
2	外国语	245	4	4	3	3				
3	语言学概论	51	3							
4	文艺学概论	51		3						
5	逻辑	54	3							
6	工具书使用法	54		3						
7	写作实习	70	2	2						
8	现代汉语	156	3	3	3					
9	修辞学	54			3					
10	中国文学史	105			3	3				
11	党的语言政策	51		3						
12	文字改革研究	54			3					
13	汉语史	105					3	3		
14	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105					3	3		
15	资产阶级语言学说批判	54						3		
16	建国以来词彙发展研究	51					3			
17	一般语言学	51							3	
18	毛泽东语言研究	54								3
19	选修课	315		3	3	3	3	3	3	3
20	毕业论文									
总 时 数		2240	19	19	19	19	16	16	10	10

(胡芸、阿汤 执笔)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在课程整改的讨论过程中，对语言课程的设置有许多争论，目前有些分歧的意见尚未统一，语言课程的设置还未作最后的决定。

语言学教研组过去共设三门课：“语言学概论”(一年)，“现代汉语”(两年)，“古汉语”(三学期)。讨论中，对“古汉语”和“语言学概论”这两门课应如何开设的问题，争论较多。

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古汉语”讲授时数要减少，这一点大家是同意的。时间减少了，内容如何安排，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中学里不单独开设古汉语，在师范大学里，古汉语应该为古典文学服务，而学生学习古典文学的最大障碍在于不懂文言文法，因此，“古汉语”可以压缩为二学期，每周两小时(包括讲课与练习)，专门讲文言文法就行了。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学

虽然不开“古汉语”，但是作为一个中学的语文教师，古汉语的全面知识还是应该具备的，这对教古典文学不无好处。他们主张“古汉语”开三个学期，每周两小时，音韵、文字、训诂方面的知识也要讲一点，并着重讲文言文法。

“语言学概论”问题的争论在于：这门课放在哪一年级开设比较合适，要不要讲语言学各部门（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知识。有人认为，放在一年级，学生的语言知识还不够丰富，当教师讲到各部门的基本理论时，学生只学了现代汉语语音，刚刚开始学现代汉语词汇，而现代汉语语法根本没有学。因此讲到这个部分就往往感到困难，尤其是讲语法，学生们还未掌握现代汉语的语法规律时，这里已经开始接触到一般的语法理论了。这就使得同学吃力，教师为难，所以有人提出把“语言学概论”放在三年级开，等同学全面地学习了“现代汉语”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讲语言学各部门的基本理论，困难就不大了。但有人不同意，认为学生到了三年级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是不好的，“语言学概论”还是放在一年级，只讲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理论，把语言学各部门的基本知识抽掉，时间压缩为一学期，到了高年级再开设语言专题讲座，讲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理论，最后大家同意了这个办法。

对现代汉语没有什么争论，只是根据讲课内容对讲授时数作了一些调整。

根据客观的需要与同学的要求，教研组还准备单独开设修辞学。

经过讨论，现在初步拟定了如下的语言课的课程设置方案：

年 級 每 周 时 数 課 程 名 称	一		二		三		四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语言学概论	3							
现代汉语	3	2	2	3				
古汉语				2	2	2		
修辞学						3		
语言专题讲座(选修)								2

附注：每周时数是包括课堂讲授课堂练习在内的。

(陈秀珠)

哈尔滨师范学院

中文系在整改期间已经有了一些初步改革的想法和措施。

第一，在教学思想方面的问题表现为：1) 不负责任。许多教师不同程度地有教书不教人，管教不管导，对学生不愿意全面负责的思想。如有的教师上课不严

肃，只顾传授知识，不照顾自己言行给学生的影响，时常流露出夸耀自己、贬低别人的口吻；有的教师不认真批改作业，不愿意多作课外辅导，怕过多地占用自己时间。这种坏思想，经过学生揭发、教师的自我检查和互相帮助，已得到初步克服。2) 喜欢单干，不喜欢多搞集体活动。最明显的例子是，过去，教同样课程的两位教师，由于合作不够，有一次在堂上对某一问题的解释不一致，曾造成同年不同班的学生思想混乱，提出很多意见。也有的教师不切实执行集体讨论的决议，上课还是按照他自己的主张讲，使集体讨论流于形式。3) 有人提出：“和工农群众生产大跃进的情况来比，我们组语言教学工作还有暮气，存在着严重的保守思想。”这话很对。例如，哈尔滨师院为搞勤工俭学，创办了“三勤农场”，提出本学期暂时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原则下，精简一些授课时数。有的同志首先考虑的是怕不能完成教学任务，怕降低教学质量；而不是根据跃进精神考虑如何改进教学法，节省教学时间，提高教学效果。同时满足现状不求革新的想法也普遍存在，具体表现在不太关心语言学界的动态，语言教学的改革，只按步就班地上课，不想深入钻研问题，努力进行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

上面这两种错误思想，在交心运动中已受到批判，制订教研组“红专规划”时，将针对这些具体情况，提出具体措施。

第二，在教学内容方面的问题是：“语言学引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的教学内容还不够充实，讲义质量不高，各门课程之间的衔接配合不够。学生意见较多的是“语言学引论”，认为这门课程学了用处不大，有些地方和“现代汉语”重复。据说这个问题其他院校也存在。最近中文系和东北人民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已进行教学协作，将在协作会议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同时也将共同讨论“现代汉语”的教学大纲和讲义编写问题。“古汉语”课的教学内容，问题更多，还没提到协作会议的议程上来。

第三，在教学方法上暴露出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课程内容多，教学进度紧，再加上教师在思想上好谈理论，脱离实际，在教学方法上便产生了说得多、练得少的偏向。学生不能把学得的知識，变成技能和熟练技巧。另一个问题是教师不重视教法的改进，讲课不善于启发诱导学生独立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总好把知识嚼得很烂，用“注入式”的老办法吐给学生就完了。学生平时听课只是忙于记笔记，考试前只是忙于背教条。中文系教研组在改进教学方法上、交流教学经验方面做得很差。这次和东北人大、东北师大在教学协作中，也要讨论这个问题。(吴哲夫)

湖南师范学院

語文系教师和学生在校改期間对語言学課程提出了兩百多条意見。經過多次討論，大家一致認為过去在語言学方面的确存在不少問題。这里只談几个最主要的問題。

首先一个較突出的問題就是理論脱离实际。“現代漢語及實習”這門課程，照理說應該理論和實踐并重，但有少数教师却偏重于理論的講授而不重視實習。近兩年來虽然有所改进，但改进还是很不够的。比方填教學日曆時，往往忽視教學大綱的指導性而強調它的靈活性；感到時間不够支配時，就任意擠掉課堂練習的時間，以致使不少學生錯誤地認為這門課程是專門談理論的，而提出多講理論的要求。這樣一來，現代漢語這門課程就不能很好地培養學生的技能和熟練技巧。甚至有少数學生學習了現代漢語還是不能做到文從字順。辯論的結果，一致認為理論脱离实际还是一个思想問題。因为过去的語言教學，多半是憑教師的主觀願望出發，很少了解學生的接受水平和中學的實際需要。這點又以語言學概論表現更為突出。語言學概論講得玄而又玄，使學生感到高深莫測。

理論脱离实际表現在另一方面，就是科學研究脱离教學。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研究工作，應該緊密的結合教學，可是有個別的教师不是這樣。他們研究的目的是出書，進而求得名利双收。因此他們既不願意輔導，又不願意批改作業，成天閉門搞著作，就是編寫講義也是借此為名，實際上還是為了出書。

針對着以上的情况，現在採取了理論結合實際、教學結合學生水平和中學實際需要、研究結合教學的措施。具體做法：1) 加強練習。爭取語音部分做到講授與練習的時間為1:1，語法、修辭為2:1，其他部分為3:1。同時準備講詞匯、語法、修辭時，事先要學生做一兩篇短文，一方面借以了解學生的實際水平，另一方面可從學生的文章中找些正反例子來進行分析，以加深學生的印象。為了保證課堂練習的時間，決定精簡教材。原來“現代漢語”講義內容很多，如果全部講完，勢必占去很多課堂練習時間（實際上也是如此），今後決定把重複和不符合需要的部分一律不講。並且發動語言組全體力量重新編寫講義。目前初稿已經完成。2) 加強輔導。今後的輔導不僅要解決學生的疑難問題，同時要通過輔導來了解學生的學習情况、存在問題和接受水平，進而加強備課，以期克服主觀主義的教學方法。3) 加強對中學的聯繫。為了培養合乎規格的中學師資，決定深入了解中學的語文教學情况和存在問題，並且深入鑽研中學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同時例句盡量從中學文學課本中選擇，力求使學生學用一致。

其次就是語法系統問題。目前高等師範學校的語言教學大綱的體系跟中學的有些出入，跟綜合性大學

和小學的也不一致。這樣就給教學帶來了許多困難。要是給各級學校的語法系統都作一番比較和介紹，事實上又不可能；要是不加以說明，學生畢業後又要碰到許多問題無法解決。因為學的是一套，教的又是一套。如果要附帶指導小學教師的話，那又是另外一套。因此有不少學生感到無所適從。如果是專著，意見分歧倒無關緊要；但作為指導性的教學大綱，系統不一致實在沒有必要。因此建議教育部趕快把各級學校的教學大綱的語法系統統一起來，以便更符合於多、快、好、省的教育方針。同時建議教育部把高等師範學校的統一教材趕快托人編寫出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關於語言學課程的安排。現在正在討論這個問題，還沒有最後確定。根據厚今薄古、強中弱外的原則，語言組的教師主張專科不開“古漢語”和“語言學概論”（因增設歷史為輔科必減少專業課程），把有關知識（如語言的本質、文言虛詞等）放在現代漢語里講。本科的“古漢語”和“語言學概論”也將適當減少鐘點，或將“語言學概論”改為選修科目。對於現代漢語則應該加強（特別是課堂練習）。有的主張一二年級每周都要開四小時，有的主張第一、三學期四小時，第二、四學期三小時。專科的時數更應多些，因為專科只開一年。有些教師的看法就不是這樣。他們主張“古漢語”和“語言學概論”一律不開，甚至主張“現代漢語”也可以大大減少，特別是中學的漢語同文學合併以後，有個別教師錯誤地認為中學漢語課不單獨開了，師範學院的漢語課就可大大減少甚至不開。因此，希望教育部能積極採取措施，趕快在《人民教育》上發表文章，說明中學漢語同文學合併的意義，使每個教師都重視語言的教學。（高子榮）

南京师范学院

中文系教师和学生在校改期間通過大字報、小組會等形式對語言學教研組所開的課程提出很多重要意見。現綜述如下：

首先，大家認為，語言學教學脱离实际的傾向是很顯著的。許多學生對語言學課程不感興趣，並且認為它沒有用，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教學脱离实际的毛病應該說是主要原因。具體事例如下：1) “現代漢語”語音部分雖然講了一學期，很多學生仍不會講普通話，原因是課堂上理論講得多，口耳訓練，特別是常用字正音練習少。2) 詞匯、修辭兩部分很重要，但教學中講得很少，甚至干脆不講。同學很不滿意，有些大字報要求教師補講修辭。3) 語法練習方式單調，對指導學生運用語言方面做得仍不夠。4) 古漢語音韻、文字兩部分講得過多，語法、詞匯部分講得太少，跟實際需要正相反。

其次，語言學各任課教師互相聯繫不夠，缺少整體

觀念，因此出現下列不良現象：1)有些教師對某些重要的論點各講一套，使學生感到無所適從之苦，例如“現代漢語”教師根據目前公認的中學漢語教學體系講現代漢語某些詞類有形態變化，而“語言學概論”的教師則在課堂上發揮“現代漢語有形態沒有變化”的妙論（實際上仍是否認現代漢語有形態）。2)課程之間內容重複不一而足，造成時間上的巨大浪費。學生的一張大字報上說：詞和概念的關係的問題，心理學、邏輯學、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語法部分和詞匯部分都講過，但是沒有一位先生講得透。其他如語言學概論與現代漢語的大量重複，古漢語文字篇與現代漢語文字篇的某些重複，現代漢語課在語法部分講了構詞法，在詞匯部分再炒一次冷飯。教師說“講的角度不同，有些地方的重複是必要的”，振振有辭。但學生認為看不出角度有什麼不同，看不出重複的必要性來。

某些教師教學上的自由主義也是十分嚴重的。自己擅長的部分講得特別多，自己生疏的部分一帶而過，甚至干脆不講。象有位教師教中國語文專修科的古漢語（重點講解性質，每周2小時，原訂一學期教完），單是音韻部分講了十多周，並詳細介紹自己的古音構擬的見解，教師講得津津有味，學生聽得昏昏欲睡。這位教師對語法部分只講了六、七周，詞匯部分干脆不講。

“語言學概論”課和“古漢語”課的目的性還存在着爭論。“語言學概論”課的教師認為學生外文基礎差，教學中盡量不舉外文的例子，結果大講漢語材料，造成跟現代漢語課程的重複。學生建議“古漢語”課不要等到三年級才學，早一點學可以為學習古典文學掃除文字障礙。教師認為古漢語課應講解系統的知識，不是專為古典文學課服務的，也不可能古典文學課要求什麼就講什麼。各有一些道理。古漢語今後如何跟古典文學課密切聯繫，相互配合，值得研究。

雙反運動期間的大字報已分別整理。教師間相當普遍存在的厚古薄今、脫離實際、知識私有、迷信權威、自我吹噓等資產階級腐朽的思想，通過教研組自我檢查、相互批評，受到了有力的打擊。本學期的語言教學貫徹邊整邊改的精神，已有下列改進措施：

1)系二系三古漢語課本學期所講的音韻部分內容大加調整，增添關於詩詞曲等韻文的韻律的材料，以有助於同學對古典文學的學習。

2)系二現代漢語修辭部分本來打算不講，接受同學意見，這一學期安排講授時間。

3)科的古漢語課程延長半年學習時間，補講語法部分。

對於今後師範學院中文系語言學課程的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研組已決定突破常規，重新通盤考慮。今後教學改革已確定了下列原則：面向實際，研究中學

語言教學中的實際問題；加強語言課程之間的聯繫，語言課與文學課之間的聯繫，教研組與中學的聯繫；發揮集體力量針對新的要求編寫講義等等。（張 芷）

山東師範學院

中文系師生在雙反運動中揭發出了在語言學教學方面所存在的脫離實際、厚古薄今和厚外薄中的現象。拿“語言學概論”來說，這門課設置的目的，是為學習語言科學打基礎的；但事實上沒有一定的語言知識是難以學好語言學概論的。在“語言學概論”中列舉不少外語例子，但大學一年級的學生，有的只學過英語，有的只學過俄語，還有的根本就沒有學過外語（調職幹部、小學教師等），這樣學生就很難領會講授的內容。到考試時候，只好死背幾個外語例子。廣大師生還揭發出了“語言學概論”和“現代漢語”的嚴重重複現象，主要是語音和詞匯兩部分。據考察，這兩門課不但理論部分不少重複，有一個時期在舉例方面也有不少是一樣的。“現代漢語”方面厚古薄今傾向表現在：漢字構造（六書）及漢字形體演變部分占的比重過大。這樣文字改革等部分相對地就少了。“古漢語”方面存在的問題是，一方面所採用的體系太陳舊，有很多地方還是依據《馬氏文通》的說法，吸收近人研究成果不多；另一方面和“現代漢語”完全脫節，沒有利用現代漢語的知識，可以和現代漢語統一的沒有統一，可以和現代漢語比較的沒有比較。古漢語內容的取舍不是按照科學本身及學生實際需要來確定，而是以教師的愛好和所長為轉移。現在，“語言學概論”講一年，“現代漢語”講兩年，“古漢語”講兩年，三門共講五年，在時間上也是浪費。

總之，目前三門課同時設置，問題是不少的。要不就是內容重複，要不就是互不關聯。因此，教師中有人主張合併“語言學概論”、“現代漢語”、“古漢語”三門課為“漢語”一門課，講授時間為二年。精簡“語言學概論”的內容以代替“現代漢語”的緒論。原“現代漢語”、“古漢語”的文字、語音、詞匯、語法、修詞、標點等部分仍保留，把古今漢語結合在一起講授。這樣既避免重複，又可以比較古今漢語的規律，給學生的印象更深刻。師範學院是培養中學師資的，有的教師考慮到將來中學語文改革的情況，主張大大精簡現在語言課的內容。還有的教師提議開設方言與普通話一門課程，講述師範學院所在地的方言（包括省、專區或縣）和普通話的語音對應規律，這樣就直接起到語言科學為建設服務的作用。（子 朗）

沈陽師範學院

中文系在語言課程方面最突出的有以下几个問題：

（一）教材內容缺乏鮮明的方向性，缺乏緊密的有

机联系,或是相互矛盾、彼此重复。比如,“现代汉语”里的“正字法”和“标点符号”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几乎形成空白点,或是把它放在微不足道的地位。“现代汉语”的组成部分,词跟语音的联系不够,语法跟修辞也有些脱节,同一课程之中所用科学术语有的也未全一致。又如:“古汉语”和“现代汉语”应用着两种语法体系,“语言学概论”在某些问题上侵入“现代汉语”的内容,“现代汉语”也重复着“语言学概论”的某些问题。

(二)忽视教学方法,对学生缺乏语言实践能力的培养。比如,“现代汉语”本是讲授与实习并重的课程,可是往往讲授多于练习,或是把练习置于次要地位。由于教材不够精简,有时为了赶进度,竟不惜牺牲某些应有的单元练习,或是把单元练习积累成为综合练习。另一方面,教师拟题设问也往往陷于主观,很少能符合学生的要求。由于这些原因,学生普遍反映语言课枯燥乏味,不能把所学习的东西形成实践的武器。

(三)跟中学教学实际缺乏全面紧密的联系。比如,中学的语言文学分授或合授的实际情况,究竟存在一些什么性质的问题,对这些,摸不着底;对中学的语文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很少深入地全面钻研,跟中学教师更少接触交换意见。只是狭隘地认为:“现代汉语”讲义结合了中学《汉语》课本的体系,或是讲义中的某些例句选自中学《文学》课本,就算做结合了中学实际。

(四)忽视语言教育的政治意义。譬如对文字改革问题和汉语规范化问题,都没有鲜明地从政治意义上认识它的重要性。仅以简化汉字来说,好多教师也没有做到示范使用的地步,甚至板书还写些已经简化的繁体字。至于推广普通话和有关文风的汉语规范化问题等等,虽说也都把它们列入教材之中,只是当做一个知识项目去讲授而已。

综上所述各点,沈阳师院中文系在语言课程上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脱离学生实际,脱离中学实际,脱离文化革命的斗争实际。

最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思想大跃进和教学大改革的浪潮中,沈阳师院中文系针对上述一些主要问题,以坚决打破陈规、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采取大力改革语言教育的措施。

(一)关于教材方面。立即着手建立现代汉语、古汉语和语言学概论三种教学大纲。分期编写讲义。大纲的基本精神是:

1) 明确各语言课程的培养目标,加强教材的思想性、目的性,以体现高等师范院校语言课程的特点。“现代汉语”以充分描绘现代汉语的规律、新的风貌为中心,做到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着重语言实践。“古汉

语”以给古典文学服务和体现古今汉语之异同为中心,做到鲜明易懂,重点突出,脉络分明,着重古今比较分析。“语言学概论”以掌握普通语言学的一般基本原理为中心,并体现中国化的特色,做到说理深入浅出,阐明规律原理的同时,适当结合对唯心主义语言学说的批判。

2) 精简教材内容,突出重点,明确每一具体问题的目的要求。特别要删掉“现代汉语”中某些不必要的理论阐述部分。使“现代汉语”跟“语言学概论”有明确的分工和联系。在“现代汉语”里应充实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内容。

3) 统一“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在重点突出、脉络分明的原则下,体系体例务求其完整。密切结合古典作品的选材,引例不拘古老一格;应统筹兼顾,以打破厚先秦汉唐而薄中近古的偏向。

4) 充实汉语课的单元练习材料,在着重比较分析和正误辨识的重点要求下,应做到多式多样。使巩固知识与养成熟练技能并举,使单元练习与综合练习交错起来。

5) 注意语言规范化,同时也要注意语言新的发展趋势和风格色彩。注意典范的书面语,同时也要注意提炼活生生的民间口语。

6) 阐明一般的规律,也要掌握特殊的规律,使一般与特殊结合起来;弄清某些易于纠缠不清的复杂问题。联系中学语言教材,并使问题加深加广,以培养学生掌握中学教材的足够能力。

(二)关于教学法方面。除贯彻上述几个原则外,特别要着重实践以下几点:

1) 讲授着重对语言事实的分析、归纳总结。使原理定义在有力的语言事实中充分体现出来。针对问题的不同性质与难易之分,把归纳法和演绎法灵活运用。主要在于加强学生的学习思考能力,以扫除“注入式”讲解的偏向。

2) 讲授与练习实践课并重,巩固每一学习单元。练习实践的方式可以多式多样,除以比较分析、辨识正误为主外,还要结合试作结论、实习习作批改、蒐集用例等等不同方式。

3) 教者及时做好各种练习实践和不定期的临时考查,用以检查教学效果,并把它作为讲授时巩固某一环节的现实资料。

(三)关于语言课程安排方面,准备把“语言学概论”提前讲授,并缩短为一个学期(原为一学年),在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授完。这样可以使学生首先掌握语言学的基本理论知识,为学习其他语言课打下理论基础,并避免两门语言课齐头并进的负担。

(下转 341 页)

文字改革大家谈

关于汉语拼音方案声母 韵母的分析

根据“汉语拼音方案”，黎锦熙先生把汉语拼音字母排队制表，拟出“汉语拼音字母科学体系表”（见《中国语文》1958年4月号179—180页），希望“作为教学上一种革命形式的‘科学体系’。”这个创见很好，对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尤其是第三表，分四呼排列，更便于教学。我正在试用。前二表我无意见。第三表韵母的排列，对学过注音字母的学生学习有些不便。我根据原表的启示作了新的排列，我认为在教学上比较好。（见附表二）。

另外，第三表的带声韵母17个，复合韵母16个，共33个；我查复合韵母不够16个，只13个。因此总数不是33个，而是30个。

值此大跃进的时代，很快地把我的意见提出来。希望得到黎先生和其他同志们的指正。（曹一新）

曹一新同志把第三表“带声韵母和复合韵母”作了新的排列，以便利学过注音字母的学生学习。这个意思很好，可是这个新的排列，就跟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三“韵母表”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我略加修补，并把我的第二个“单韵母表”合并在一起，合称“韵母表”；而又把我的第一个“声母表”也恢复了“汉语拼

音方案”原来的字母次序，摆在这“韵母表”的前边。一共两个表，定名为“汉语拼音方案声母韵母分析表”，如下。

所谓“分析”，就是说，对于公布方案中的“声母”“韵母”两表做了一点“分析”的加工，学过注音字母的人用这表来“教”与“学”汉语拼音字母，对于公布的两表中所未详说的拼音规则，特别是“复合”“带声”两种韵母，较易从“分析”的说明中体会出来。

在表前添了两个“记号”的简单说明，在表后又添了五条“附注”，曹同志对于韵母数目的疑问，就在这附注中答复了。

这表仍是阐明公布方案的一种学科体系，在教学上对于学过注音字母的人是比我那“科学体系表”方便得多，另一方面也靠攏了科学体系。

（黎锦熙 1958 儿童节）

【两表記号说明】

[]，不用的声母和韵母；或一母变读。-，在声母前要加韵母；在韵母前要加声母（这种韵母不单独用）。

（一）声母表（共21）

b	p	m	f	[v]
d	t	n	h	l
g	k	[-ng(ŋ)]	x	
j	q		sh	r
zh	ch		s	
z	c			

（二）韵母表（共39）

单韵母	（开口呼）	（齐齿呼）	（合口呼）	（撮口呼）
	a	[i]	-u(wu)	-ü(yu)
	o	-i(yi)		
（共6）	e	-ia(ya)	-ua(wa)	
	ei	-ie(ye)	-uo(wo)	-üe(yue)
复合韵母	ai	-iao(yao)	-uai(wai)	
（共15）	ao	[-iou](you, -iu)	[-uei](wei, -ui)	
	ou	-ian(yan)	-uan(wan)	-üan(yuan)
	en	-in(yin)	[-uen](wen, -un)	-ün(yun)
带声韵母	ang	-iang(yang)	-uang(wang)	
（共18）	eng	-ing(ying)	[-ueng](weng)	
	-ong	-iong(yong)		
	er			

【附注】（1）和i、u结合并代替的“半母音”y、w，要照字母表名称念作iY、XY。（2）复合韵母本只有13个，因-iu、-ui也计入（下有双道为记），所以共有15个。（3）er（儿）附入带声韵母后。（4）其它说明仍请参照《汉语拼音字母的科学体系》的两个说明。（5）关于发音部位和方法的科学说明，以及复合、带声韵母中“变音”公式，与注音字母对照的，暂可参照《字母与注音论丛》38-41页。

學習漢語拼音方案的体会

鄭國澤

在自学或教学漢語拼音方案时，必須对方案的精神實質有正确的認識，才能學習得更好，傳授得更正确有效。現在把我教学漢語拼音方案的点滴体会，提出来和大家共同研究。

方案制定出字母表（和它們的名称）、声母表和韵母表三个表。在韵母表之后还有六点規定，其次是声調符号和隔音符号。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則对漢語拼音方案作一些必要的說明。內容看起来很复杂，不好掌握。其实，一个字母表規定字母的名称和排列次序，加上在韵母表后面的六点規定，就是整个方案最基本的东西。字母表所規定的字母名称，可以說是整个方案的灵魂，我們學習拼音方案，只要掌握了字母的名称和六点拼音規定（其中第五条規定可以不管，只讓字母的实际音值自己来解决自己的問題就行。例如看見 uei 讀 $\times\text{v}$ ，看見 ui 也讀 $\times\text{v}$ 就够了。在方案中这样規定是必要的，只是我們使用时不必去死記它們的关系，更不要以此教給初学者，以减少學習者的負担），再加上声調和隔音兩種符号的使用，問題就完全解决了。至于声母表和韵母表，不过是附帶列出，供教学者參考而已。也許有人要反对說，拼音时使用的是字母的音值，音值才是方案的主要的东西，換句話說，声母表和韵母表才是主要部分。

我認为除了弄清楚字母名称和音值的区别以外，还必须弄清楚兩者的相互关系，才能証明这个問題。

制定拼音方案时，最先考虑到的是确定每个字母的音值。然后給它們确定适当的名称。但是說来奇怪，制訂时是音值先名称而存在，可是一經制訂完畢，交給群众使用时，則又变成音值随着名称而产生了。那就是說，學習拼音字母时，只要懂得每个字母的名称，則它們的音值也就能够很自然地掌握了。或者稍为指点，問題也就解决了。所以說字母的名称是整个方案的灵魂。但是为什么又說作为音节構成的主要部分的韵母表可以不必理会呢？

我們學習拼音，大可不必依賴韵母表，不須到韵母表里头去找韵母。說实在的，韵母表的韵母那么多，有單韵母，有由兩個或三个所組成的复合韵母，还有声随韵母，叫人眼花繚乱，很不好記。而且还有注音字母拖着它的后腿，更使人搞不清楚。其实我們需要的韵母，大可以直接到字母表里去找。它們一共只有五个，或者再加上字母表里所沒有列出的 ê 和 ü，这七个字母就能够很圓滿地替我們服务了。

七个字母，怎能抵得住二十三个韵母的作用呢？只要把这七个韵母和所有的声母（包括双字声母）的每一个的音值正确地讀出来，有些地方略加变讀〔变讀的場合不多，一般只有三个，即：1) i 和 ü 之后的 e 要讀 ê，2) a 后的 o，要讀 u，3) 在 i 之后，n 之前的 a 要变讀成 ê，例如 tian 要讀成 tiên〕，就可以自左至右按照每个字母的次序讀出整个音节的音值来，这时也就完成了拼音的过程。我想，这样才算是正确体会拼音方案的科学性，才算是以最簡單的办法，花最少的时间和努力，达到最好的效果（即多快好省）。

也許还有人認为采用这种不大为一般人所掌握的連續拼讀法，才可以不必依靠韵母表，而一般習慣的拼音法正是先讀出韵母，然后再与声母相拼讀。其实，即使采用先讀韵母的办法，还是可以适用上面所說的連續讀办法，照样可以不必死記韵母表。

有些人在學習时，一开始就放弃字母表，先从声母表韵母表学起，这是一种錯誤的做法。也有些人还紧抱着韵母表不放，或从注音字母 ix 去死記 iou 的讀音，諸如此类。往下碰到 eng, ong 又和 L , xL 糾纏不清，iong 又給 UL 难倒。把一套很科学的完全可以看字讀音的拼音字母，給注音字母搞得乱七八糟。等一下碰到六条規定中的第五条时，又要記住 $\text{iou}=\text{iu}$, $\text{uei}=\text{ui}$, $\text{uen}=\text{un}$ ，真是越来越糊塗了。为什么不从拼音字母的字形去辨認它的讀音，而一定要用注音字母来帮忙呢？（其实不是帮忙，而是越帮越忙，簡直是搞乱了。）学过注音字母的人，在學習方案时，念念不忘注音字母，时常要把拼音字母拿去和注音字母对照。这样学习拼音方案，就要走弯路。要知道拼音字母比注音字母优越得多，沒有注音字母，拼音字母完全能够独立地完成拼音的任务。我想，方案上列出韵母表的用意，只是告訴我們所有構成漢語的一切音节的韵母，都在这个表中了，是給我們在學習时的參考的，决不是要我們拿着有注音字母对照的韵母表来學習拼音，更不是說拼音字母要造得和注音字母完全相通。

这就是我对漢語拼音方案的精神實質的点滴体会。方案的精神實質就是它的科学性，我們掌握了拼音字母的科学性，就可以既不受注音字母的影响，又可以學習得更快更好。

关于繼續簡化汉字和推广普通話的几点意見

王世祥

文字改革工作中的兩大任务的执行中，我認为目前还存在着相当的缺点，比如，在簡化汉字方面有：

1) 書店准备的簡化字本,时有时無,不敷供应。因而購者向隅,影响学习。

2) 除書报外,一般的印刷品和街头的張貼物,同一个字出現多样簡法。例如“導”字,有“导、寻、刂”三种簡法;“動”字也有“动、劫”兩样簡法;因此閱讀时煞費思索,書写时无所宗法。

3) 未經簡化的繁字尙多。如果長期繁簡杂用,将来繼續簡化后固然可以从新弃繁就簡;但广大的未成年人,势必要在这段期間多学一部分繁体字,多有一部分牽掣。

4) 很多工業产品的商标和广告,仍然沿用着繁体字。即以天津第十教育用品生产合作社制造的20公分的小米突尺为例,这种小尺純是为未成年的小学生制备,但商标却用“飛機”两个繁体字,以致一二年級的小学生不識。經過釋写为“飞机”以后,它們才豁然領会。这無异誘導小学生学了簡字又学繁字,多費一番腦力,并且对于倡用簡字上,起着很大的阻碍作用。

5) 机关、团体、工厂、企業、学校的名称牌匾,書籍、报章、杂志的名称,一般賬簿的摘要,公私函件的封皮,很多用的是繁体字,这对倡用簡字,也是起着相当的阻碍作用。

在推广普通話方面的缺点是:現在除了学校授課和有声宣傳已普遍采用了北京語音的普通話以外,人們在公私事务的接触上,还是各說各的方音土話。并且不少能說普通話的人,也不着重学习北京語音,弄得能以北京語音說普通話的人,不單起不到示范作用,反而逐漸随乡入乡地学方音,甚至改說当地土話。特别是有一般彼此相熟和喜戏謔的人,一遇有人学說北京語音的普通話,立时給以譏諷打击。以上兩种現象,都阻障了普通話的推广。

現在先就在簡化汉字方面,提出我認为可以采取的一些措施:

1) 主管部門,在原来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应进一步罗致热情促进者及有关促进的資料,多多簡化,快快簡化,定期完成統一的簡化字体,不必分批簡化,以免繁簡延續牽連,兼免每个字的簡体太多,無所宗法。

2) 大力倡导学习簡字、使用簡字: a) 根据統一的簡化字体,重新編印字典(包括所有的字典字彙在內),以便学习; b) 大量印制統一簡字本,由全国書店書攤充分供应; c) 所有文化館也可因地制宜地添設簡字牌坊或窗欄,以便引人注目,随时可以学习; d) 普遍深入宣傳,达到家喻戶曉。

3) 定期停止使用已經簡化的繁体字,实行一刀兩断,以免藕断絲連。(支票、滙票、合同、契約的数目字,純艺术性的欣賞品例外。)为了叫人們重視学习簡化字,并如期停止使用已經簡化的繁体字。机关、企業、

工厂、团体、学校、書籍、报章的名称与工業产品的名称和商标,統通改为簡体字,借起帶头作用。正式公告在停用繁体字以后,不論机关与机关之間,人民与机关之間,或是人民与人民之間,凡是有关表达思想、处理事务以及彼此信守的文件合同契約等,都尽量采用簡字。

至于推广普通話方面,各地应尽量动員能以北京語音說普通話的人們,經常担任輔導。最好大家自觉約定:凡是开会或联系公务,必須用北京語音的普通話;一經蔚为風气,自会貫徹到一切日常生活当中。

当然,这不等于說个人日常生活中不能使用家乡話,相反地,有些做群众工作的人,除了使用普通話以外,也有必要懂一些地方方言。

要認真学习“汉字簡化方案”

高 嵩

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簡化方案”,应当看作是当前汉字書写的规范。但是有些人不認真学习,随便新造出許多簡字,以致造成了書写上的許多混乱。例如:在农村有的农业社的記賬員給社員的劳动手册下工分时,把“糞”写成“坭”,把“灌溉”的“灌”写成“沃”;也有人把“猪瘟”的“瘟”写成“疫”。在城市还有把“鞋帽組”写成“难耗組”的(沈陽市和平区有一个批發商店挂这样的木牌)。也有把“縫紉”写成“纛紉”的。另外,还有把“凤”改成“凡”,把“蜂”簡成“虱”,把“感想”簡成“忒想”的。还有个别人把日本的簡体汉字用来了,如把“图”写成“囡”,这就更不应该了。为了去掉这些流弊,我認为任何人都應該認真地学习“汉字簡化方案”。

不能濫造簡体字

馬国凡

現在簡体字已被大众广泛地使用,代替了“正統”的繁体字,这是一种好現象。但是,有些人随便簡化,濫造新形声字,比如,太原市山西大戏院的戏票上印有“遵守秩序,請勿喧嘩”字样,“违”就是随意造来代表“遵”的簡化字。用“违”代替“遵”不仅沒有群众基础,同时也不科学。太原音“中”“尊”同韵,因之用“中”代替“尊”,造成新形声字“违”,可是,普通話“中”“尊”并不同韵,用方音作音符来創造新簡体字是不合适的。这种現象不是極个别的,甚至拼音也是用方音拼的,像四月分《中国电影》的封面的拼音是 ZHONG GUO DIAN YIN,把 YING(影)拼成 YIN,不是漏字就是按方音拼写的,这是很不好的。

談談对俄罗斯学生的汉语教学法

苏联 T. П. 扎多延柯 M. K. 魯勉齋

(本刊特約稿)

目前,苏联的汉语教学主要在高等学校里进行:国立莫斯科大学的东方語言学院,国立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国际关系学院,高級外交学院和其他某些院校。近来汉语教学也已經在某些中学里进行。

給外国学生特别是俄罗斯学生講授汉语总是非常困难的,其原因首先在于俄汉两种語言体系的不同。这些困难存在于語言的各个方面:語音,文字和語法。

在語音方面,声調是学生的基本絆脚石。正确地掌握汉语的發音,同样是一件極其复杂的事。

在語法方面,汉语与俄語有着显著的不同点;它几乎没有詞的屈折变化,因此,汉语的句法系統对俄罗斯学生来说是十分复杂和不寻常的。

关于汉字的困难,更是不用說了。“汉字 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мота”这个名称本身在我国是某种最困难、最不可理解和不可思議的东西的同义詞。

上述一切决定了汉语的教学法是非常独特和复杂的。因此这门科目(对外国学生的汉语教学法)至今依然几乎还没有得到研究。

在本文中,作者要向中国讀者介紹苏联汉语教学的情况,而主要是介紹苏联的一个东方学学院——国立莫斯科大学东方語言学院中的汉语教学情况。

国立莫斯科大学东方語言学院是一个年青的学院。它于1956年在国立莫斯科大学語文系和历史系的两个东方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从它成立的最初几天起,在汉语教研室(教研室主任是波茲德涅耶娃 Л. Д. Позднеева)的全体人員面前就提出了关于改进汉语教学的問題。当时我們不得不在这方面寻求新的途徑,因为旧的方法不是都能够收到令人滿意的效果。

不久以前,一般都認為汉字是学习汉语的基本困难,所以大学生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学习汉字上。在所有語言課上,大半是講讀和翻譯汉文,背熟汉字。無可置疑,偏重于学习汉字的这种傾向当然也收到了某些良好的效果。大学生获得了閱讀汉文的不太坏的基础,因而对于学生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关于汉字不可思議的神話。

但是学习語言的这种态度有很严重的缺点。通常

大家背熟的不是詞,而是个别汉字的意义,同时也沒有指明某一个字是代表独立的詞呢还是詞的部分(詞素)。据說認識个别汉字的意义就足以了解和猜出任何汉字組合的意义。但是学生从来不敢确信,如何使用这个或那个單音节。結果他在口語上就完全無能为力。

由于以往很少注意到汉字的正确讀法,这种無能为力的現象就更加严重了。学生不但沒有掌握汉语的正确發音,更談不到掌握以往根本不加研究的声調了。大家知道,在俄語里輔音的清濁界綫是区别意义的分水嶺。至于在汉语里意义的区别則要看有无送气。再举个例說,俄語里的硬輔音 n 和軟輔音 n' 是不相同的音位。而在汉语里这个要素不起区别意义的作用,在这里該鼻輔音的發音部位或前或后有很大的关系。俄罗斯学生对这些和其他許多区别通常沒有給予应有的注意。傳統的俄罗斯实用音标在这点上起了促成的作用,因为它同样也沒有确定这些区别。这一切严重地阻碍了口头交际,这是很自然的。結果,实际上汉语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汉字的学习。

假如把这些缺点只归咎于不良的教学法,归咎于对这些問題所采取的忽視态度,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缺乏教学經驗丰富的干部有关。

教学經驗丰富的干部目前我国还很不够。但是大家都已感到必須提高汉语教学的水平,我們也已着手进行工作的改革。在这方面給予我們很大帮助的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正在我們学院中工作的中国同志(刘全李,李格非和曾在莫斯科任教的邢公畹),以及被請到教研室里来工作的龙果娃(Е. Н. Драгунова)同志,她在給外国学生教学多种西方語言方面有着很丰富的經驗,現在她正在專門研究汉语的教学法。

我們已决定首先改进語音的教学。專門的語音教程(30課)業已編写完成,其目的不仅要使学生学会正确的汉语發音,而且要学会声調。全本教程已由在我国工作的中国同志把發音录在磁帶上。

一年級大学生在最初四周內几乎是單学一門語音

課(每周 16 小时), 其中用一小部分時間(每天至多 30 分鐘)學習漢字的各種筆劃。

全部語音教程是按分散難點的嚴格系統編寫成的, 即從簡單、比較容易到複雜、困難。既然漢語音節沒有某個聲調就不能發音, 所以從第一課起就開始學習聲調。為了讓學生把他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聲調即對俄羅斯人來說十分困難的語音現象上, 開頭的三課講授最簡單, 在發音方法上最接近於俄語的語音, 例如輔音 m, n, l, f, h, s, sh, 元音 a, u。從第四課起開始講授那些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俄語的語音, 但是在这里還是遵守分散難點的原則。在發音方法上對於俄羅斯學生最困難的語音, 例如 j, q, x, 各種兒化音節, 都放在教程的最後几課里。

錄音機對語音課起着很大的作用。它能使學生不止一次地聽到錄在磁帶上的練習, 並且跟在錄音後面重複這些練習。然而, 掌握語音不單純是模仿。全部作業要受教師的指導和檢查, 教師給講解各種語音的發音方法, 糾正和分析學生的錯誤(這裡也利用直觀教材)。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 學習聲調是從第一課開始的。在課堂上錄音機在這裡也起着主要的作用。除了一般的教學方式(听完錄音和跟着錄音重複地念)以外, 還可以利用一種有助於發展學生的聽覺能力、區分各種聲調和語音的切實有效的方法。學生按錄音機的指點進行有關聲調和語音的各種練習。下列幾種練習可以作為例子。在紙張上用字母寫上許多單音節詞, 並把它們發給學生。他們一面收聽錄音, 一面就得標出聲調。這種工作方式在稍後階段就可轉用到雙音節詞上。還有一些比較複雜的練習: 學生按錄音機的指點, 自己用字母拼寫單詞並標出聲調。還可以採用一些練習, 幫助學生辨別那些發音部位相同而發音方法不同的語音(例如: g-k; b-p; d-t; zh-ch, 等等), 或者相反, 發音方法相同而發音部位不同的語音, 例如 n-ng。先是學生得到省去輔音的單詞(例如: …ái, …áo, 等等), 他們一面聽錄音, 一面就得填上省去的輔音(pái, bāo, 等等)。這種練習的複雜形式就是當學生用輔音填充空白的同時還得標出聲調。

大家知道, 漢語的聲調像任何其他的旋律一樣, 可以用某種樂器表達出來。由於學生在家裡不可能請教教師或用錄音機來檢查自己, 因此我們向他們建議利用樂器: 鋼琴, 提琴, 吉他等。為了這一目的, 在語音教程里聲調也用樂譜來記錄。教程為那些不懂樂譜的人附有鋼琴鍵盤和吉他琴指板的專門插圖, 其中用小圈標記出與這些音符相應的地方。樂器不僅有利於熟練單音節詞的聲調, 而且也有利於熟練雙音節詞的聲調。實踐證明, 利用樂器的學生, 漢語的聲調掌握得較快。

然而, 語音的作業並不以學完這 30 課而告終。在學習基本課程和學院的整個授課時期內, 還要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語音學上。無論運用哪種教學方法——講讀拼音文章或漢字文章, 口頭翻譯, 會話等, 教師始終應該要求學生遵守一切語音規範, 首先是聲調的規範。

我們已指出, 漢字的教學我們是從頭几課開始的。當語音課還在進行的時候, 學生只熟悉漢字的各種筆劃, 學寫這些筆劃, 並對複雜的漢字進行(不用寫的)視力分析。從基本課程開始時(即授課的第四個星期)學生開始學寫比較複雜的漢字。

但是, 必須指出, 現在與已往幾年不同, 漢字不是我們記錄教材的唯一手段。為此目的我們已開始廣泛地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採用的拉丁字母表。目前正在用拼音字母拼寫課文和大量的習題。上半學年每一單元都安排在一周內授課(16—18 小時), 其中包括下列教材: 拼音課文, 課文的詞彙表, 各類習題, 語法解釋(用俄語解釋, 但用拉丁字母拼寫所有漢語例子), 附有詞彙表的漢字文章, 漢字習題。在上半學年中, 每課拼音材料的比重大於漢字材料。每星期上 4 天拼音的課文和習題課, 後兩天上漢字課。但是不能認為, 這樣的時間分配就是對漢字估計過低, 因為學生到底學到了完全足夠的常用字。生字的數目逐漸從第一課的 20 個增加到最後几課的 50 個。在下半學年中, 漢字的份量就比較重。一年內學生掌握 800 個活用漢字, 消極字彙掌握得稍許多些。

拼音材料和漢字材料的這種相互關係決定於下面幾種理由。拼音課文大大地減輕了掌握語法或詞彙的新材料的負擔, 這是因為學生在這時並不需要花力氣去記漢字。這樣一來就可以增加新材料的份量。可見, 語言的學習整個來說進行得比較緊張。此外, 在這樣分散難點的情況下, 掌握漢字就要容易得多, 因為以後只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記憶這些漢字符號本身, 所有其他的東西以前均已掌握了。學生對如何用漢字寫出他早已認識的單詞甚至發生了很大的興趣。

其次, 上述做法有助於掌握正確的發音, 因為用字母拼寫時學生能接受詞的語音形式, 而不表達語音的漢字就不能做到這點。在給外國學生講課時, 可以寫出漢字, 講明其意義而不告訴學生這個字的讀法。其後學生可以不管字的讀法而認出這個字來。當然, 這只是問題的原則提法。實際上在講授漢字時, 總是把它的讀法告訴學生的。但是它往往被學生忽視, 因為為了理解課文, 只要認識了字並記住它的意義就夠了。其結果在發音上錯誤百出, 這對發展口語顯然是一種極其有害的方式。字母拼寫正是迫使學生記住了詞的發音而不把它忘記, 因為詞義只與發音相聯系。同時

經驗証明，學生使用字母(不用汉字)拼写詞越久，这个詞他就記得越牢固，越精確。

基本課程从第四周即語音課程結束以前开始。該課程学一个学年。這門課給學生講現代汉语語法的基础。必須指出，在其他一些学校里，語法实用教程的授課時間比較長些——一年半到二年。我們講授的語法比較緊些(一年內)，为的是使學生尽早地閱讀原文。

对各种語法習題也很重視。每課平均約有20个習題。它們对掌握語法規則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促进了詞彙的積極运用。用字母来拼写全部教材这一事实在这方面也起着促进的作用。至于談到汉字課文，在这里只用已經學習过的語法和詞彙材料，这些課文本身的使命主要是授予學生一定数目的常用字。

闡明語法和詞彙材料时，附有直观教材，各种插图，公式，表格等等。

學生从基本課程的第一課起學習口語。而从下半年起进而上會話的專門課(每周4小时)，該課程由中国教师担任。这里同样也广泛地使用直观教材。

从第二学年起，高年級上課按由淺入深的原文进行。二年級只講授文艺性的課文，但其內容較淺。三年級起就講授比較复杂的文艺作品，并开始閱讀社会政治文章。

學生一般借助于辞典独立地學習这些課文，但二年級上半年例外，因为这时大部分課文后面都附有現成的詞彙表。誠然，第一年級只有少量独立的补充讀物，但大学生从这时起就养成了运用詞彙表的習慣。學生通常在家里預習課文，把大部分課文用書面翻譯出来。在課堂上只檢查譯文和講讀的正确性，进行难句的語法分析，解釋詞的用法。

除了一課接一課講授的課文以外，还有补充的讀物，上面我們已經說过，这种讀物是从一年級第二学期开始的。补充讀物的份量逐漸增多。为了使學生能够系統地閱讀，不要布置一个月或更長期限的功課，而布置一周的功課，周末以前他們必須在課外時間內閱

讀完畢。补充讀物閱讀情况的檢查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學生講述讀过的課文的內容；朗讀或翻譯教师选定的某些段落；回答有关讀过的課文中的問題。这里不要求積極地掌握汉字和所有的詞。

會話語言課在整个授課時期內都进行教授。這門課由中国教师講授。會話語言課建立在讀过的課文的基础上，并利用各种題材的材料。會話实践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就是所謂“双边翻譯”，这种方法过去和現在在其他学校里也被广泛采用。这些功課由兩位教师来領導。假定說其中一位只会講和听懂汉语，而另一位只会講和听懂俄語。他們相互进行交談，而學生輪流充当他們的翻譯員。

录音机的使用对發展口語和听觉能力具有很大的效用。为此目的中国教师預先在磁帶上录上各种情節丰富的短篇小說。學生應該听懂这些短篇小說并把它們重述出来。常常可以要學生用字母拼写听过的短篇小說并标出声調。

學生無論在學習的最初时期，或在高年級，都要进行俄譯汉的練習。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工作，但它对巩固所有講授过的語法和詞彙材料極有用处。从四年級起俄譯汉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作業，单独授課(每周2小时)。

除了語言的实践課以外，在学院中也講授各种普通和專門的理論教程，其中有講授現代汉语語法的普通理論教程：形态学——第二学年，句法学——第三学年。這門教程每周講授2小时，同时进行每周2小时的課堂討論。四年級講授現代汉语語音学專門理論教程，并进行汉语和俄語对比語法的專門性的課堂討論(每周各2小时)。

教學計劃也制定了其他一些專門教程，例如語言史，方言学，但由于缺乏这些学科的專家，暫時还不能開課。由于同一原因我們暫且也还不能講授古代汉语。目前，我們只能在中国文学的課堂討論上对古汉语进行实践的了解。(高祖舜譯)

《少数民族語文論集》第一集出版

本刊叢書《少数民族語文論集》(第一集)已經于上月份出版了。在这本論文集里輯集了僮語、傣語、苗語、藏語、維吾尔語、柯尔克孜語方面的研究論文共11篇。其中，袁家驊、張元生的《僮語詞法初步研究》一文曾在1957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的分組会上宣讀过。这篇論文的成就引起語言學界的注意，認為和汉语的詞法研究有互为啓發的作用。《古代維吾尔人的語言和文字》一文是中央民族学院突厥語教研組耿世民同志为新疆專修班所作的報告。

虽然，有的論文属于調查研究的初步成果；有的只限于个别族語的特殊現象；但是，目前我国的民族語文研究正在大力展开，这些論文都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而且，对于今后进一步的历史比較研究也是有意义的。

《少数民族語文論集》第二集最近也已經在排印中，不久就可以和讀者見面。(昌)

日本的方言学研究和方言地圖的准备工作*

勞 宁

日本的方言学研究工作，近几年开始特別活躍起来。除了全国性的研究机关——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的活动以外，地方性的方言研究会在1956年也出现了，并且出版了机关刊物，如《幡多方言》、《三重县方言》、《兵庫方言》。方言学的专著和論文也相繼出現。如近畿方言学会出版的《方言論文集》，《民俗学研究》杂志第15卷發表的《日本方言的方言-地理学研究》；前者是几个方言学者的論文，后者是藤原与一在日本的本州近畿西部以西和四国所做方言地理学調查的結果。这个用英文写的方言調查报告，可能还是战后日本所仅見，特别是报告中提到的方言之間的彼此影响部分，外国人对它發生很大的兴趣。

日本民俗学者对方言学的貢獻也不少。日本民俗学所在1957年出版了《綜合日本民俗語彙》5卷，还有福澤武一著的《信州方言風物志》，等等。此外，日本著名的方言学家柴田武于1956年被派往比利时、荷蘭、西德、瑞士等国，考察語言地理学的研究現况，归国后曾在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召集的各地田野工作者全国會議席上做过报告。

日本的电影界、戏剧界、广播界、音乐界也对方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材料。电影界在使用方言制作的电影中發掘出各地的方言特点。又如“文学座”剧院上演《肥前風土記》，純用地方方言。在普及东京标准語的情势下，日本这样盛行使用方言的演出，曾有人担心是否会影响所謂“国語”运动；可是方言学者却認為这并没有多少矛盾，認為發掘方言特点正是为了推行标准語。日本的广播界使用方言广播并制作各地方言录音的成績，近兩年也很显著。日本的放送文化研究所早在致力于全国方言的录音工作，1957年續有富山、石川、福井、岐阜各县的方言作出录音片，今明兩年还准备要做出90个点的方言录音。

日本与語言技术有关的各个部門，所以对方言工作这样活躍，是同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的工作分不开的。这个全国性的研究所当前的中心工作，就是日本全国方言普查和全国方言地圖的制作。

日本語言学界和語言教育界多年期待的方言地圖工作，虽已做好准备工作，可是它的經過是相当艰巨的。他們深知这一个方言地圖不但对探明日本語言史上有極大的貢獻，而且对語言教育的提高也有直接的影响。不过，由于經費困难，首先就使这一工作受到許多阻碍，其次是由于田野工作者都是业余进行調查，时

間上就不免推延。他們估計从1957年夏开始制作的全国方言地圖，需要七年左右才能完成。

在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方言室领导下担任方言調查的田野工作者，大部都是地方高等学校的教授，部分是中、小学教师，都是經過語言專業訓練，对業務有一定把握的，有些人是曾出版專門著作的。到1957年，地方的田野工作者成員已發展到47人。日本全国有46个县，除北海道是兩人外，其余每县一人。1949年到1950年，当时只有17人，根据研究所的委托，分別提出本地方言情况和使用标准語的情况报告；可是这些报告有很多紛歧，要进行比較就相当困难。1951年，該所派出成員到現地深入試点調查，并且發出征詢表格，要地方調查員提出方言語法报告。1952年，进行日語的敬語和尊称的調查，因为日本各地对这一方面向来是因社会階層、年齡、性別等而有紛歧的。**这次調查选定了329个方言点，每个調查員担任七个点，每个点选聘兩個發音合作人，一个是60岁左右的，一个是25岁左右的。这次調查結果見于1953年《国語研究所年報》。

1953年，又进行敬語和尊称的第二次調查。这次調查着重在个别方言点的深入了解，47个田野工作者分在10个村、32个小鎮、5个城市进行工作，每一点选聘20个合作人，10个男子，10个女子，都是20岁到29岁的，并且各是分屬不同社会階層的。1954年，在总结了前几年的工作經驗以后，特别是1949—1950年进行的一般調查不够細致，缺乏系統，于是重新規定每县一个調查合作人，以自由談話方式在語音方面注意輔音、元音和音节結構，在語法方面注意動詞活用型式和助詞用法，此外还有常用詞彙。这一次的調查报告已在国語研究所所長西尾实领导下进行整理，預計1958年內可以完成。

1955年，該所在已获得的工作基础上，召开了从1953年起每年一度的全国方言工作者會議以后，决定进行方言地圖的准备工作。由于各地方言特点不同，便向各地方調查工作者提出关于制作方言地圖的征詢，

* 本文取材于《ORBIS》，1957，NO. I；日本国立国語研究所年報，1955，1956兩册；《国語年鑑》1957年版。

** 可參看 W. A. Grootaers (賀登崧)：《Différences entre langage masculin et féminin》，《ORBIS》，1952，NO. I。

征詢內容項目有：1)收集資料方法究竟採取通信調查方式還是採取現地調查方式，或者兩者并用；2)調查要項包括詞彙意義變化最多的單詞和現代日常生活的常用詞，語音和語法的變化；3)全國統一的記音法；4)確定方言點的點數，選定方言點要慎重考察，必須足以代表方言分布情況，並在地圖上具體注出市村名；5)發音合作人的條件如何規定；6)其他一般技術上的問題。另外，還要求各地提出制作方言地圖的目錄和書面報告。

1956年是日本方言地圖准备工作緊張的一年。這一年在東京召開了田野工作者全國會議，討論前一年提出的征詢意見。出席的田野工作者並舉行以“日本的語言地理”為題的討論會，其中報告題目有：日本語言地理學，關於調查點的選定，關於調查用語選定方法，從語法調查語彙，怎樣選定調查項目。除了這種會議之外，更進行了兩次現地試點調查。第一次是在日本的四國等地方進行；第二次是在和歌山新宮市進行。這次是就第一次所調查的結果選出540條項目，以問答方式就詞彙語法上找出方言與共通語的區別。及至1957年初，國語研究所的方言研究室總結了田野工作者的現地調查成果，決定了調查方法和調查項目，並且完成了各項調查表格。

現在以日本國語研究所的方言研究室為調查中心(survey center)所進行的“日本方言地圖”工作，他們

認為可注意的是：首先是所使用方法純從語言學角度出發，着重在語言史的發掘。這一點是迥然不同於以前的日本方言工作，以前的調查大多是由民俗學者出於興趣而做的。其次是對發音合作人或調查對象的人選十分認真考察，並且對調查點和調查內容項目的選定也非常仔細。因為日本人民的識字率相當高，幾乎全國人民都是受過義務教育的，對標準語多少都懂得些，再由於廣播和報紙的普遍傳布，結果使得地方方言的可靠性大為減少。因此在選擇調查對象時就有些困難，最須注意的是人選的年齡，多數情況下都是挑選60歲以上的農村土著。西部日本年齡在70歲左右的人較多，東北部日本就比較年青的多。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就是以同一調查項目，由不同的調查員分別向不同的對象進行調查，所得結果會有很大出入；在進行核對比較時，就須注意調查對象的年齡因素。

計劃中的“日本方言地圖”是五萬分之一的，這是根據日本全國現有人口九千四百萬，選定兩千個點作比例的。全國方言分布將包括1,248幅地圖。以現有田野工作者的人力分配說，每個工作者每年以一個暑期休假時間可以調查6個點，負擔還不算太重。可是有的調查點由於人口和社會地理條件關係，可能需要兩三年才能完成，所以他們覺得調查的人力和經費都還有考慮增加的必要。

武汉語言學會成立

武汉地區的語言文字工作者，於六月八日在武汉大学舉行了“武汉語言學會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七十多人，湖北省教育廳柳野青廳長親自到會，並在會上講了話。

武汉語言學會是在以前成立過的“武汉語言研究會”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籌備工作在省委宣傳部直接領導下進行。學會為了適應當前大躍進形勢的需要，更緊密地團結了各方面語文工作者，為掃除文盲、文字改革、推廣普通話等一些重大的語文運動服務。會員的來源除了大專學校中研究語言、文字的人員以外，還向中學的語文教員，以及社會上熱心於當前語文運動的人士方面發展。這就打破了那種“學院式”的陳規，以為一定要長期專門研究語言學的人才能算是語言學會的會員。

這次成立大會除了選舉領導機構，成立以柳野青廳長為主任委員的“學會委員會”外，還通過了“武汉語言學會簡章”、“武汉語言學會1958—1962年工作綱要”及“武汉語言學會1958年工作計劃要點”等三個文件。

在成立大會上，除柳野青廳長根據總路綫精神作了學會今後努力方向的報告外，還有華中師範學院外語系主任薛誠之教授、武汉十七女中業余夜校教師徐杏村同志及武汉大学語言學教研組劉驥教授等就外語教學問題、推廣普通話問題和語言學研究問題作了講話。中央民族學院分院嚴學窘副院長因公外出，會上宣讀了他的書面報告《批判漢語學的封建意識和資產階級的思想與研究作風》。（董寄自武昌，1958,6,26）

論漢語中詞的界限問題(三)

苏联 伊 三 克

二 談兩類特別的詞

1. 联义詞

§ 14 在分析漢語詞彙的時候，一定會碰到許多特点非常显著的詞群。它們的特別之處就在于，按所有各種語法特征而言，它們是完全獨立的，在許多場合之下都分別表示非常具體的概念，但是在用法上，它們又是密切聯系着的，它們只能安排在一定的上下文之中，並且一般都具有可在語言中無限制地自由運用的同義詞。

關於這類詞群的存在，我們在蘇聯漢學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例如雅洪托夫在自己的研究中，就把含有這種特別詞的詞組算作慣用語。他寫道：“漢語中存在着大量具有慣用語的性質的動賓結構詞組…。這些詞組之所以為慣用語，是表現在它們的組成成分在現代漢語中都（或者其中至少有一個）不能當作獨立詞使用，它們只見於兩三個固定成語中，或者這整個詞組的意義不是直接由它組成成分的意義而產生的。”^①有些人還把這類詞群一部分歸於所謂“半獨立性的”詞的範疇，一部分則歸於形態學成分，他們是把這類詞群當作具有特別構形能力的複合詞的詞干。^②

中國語言學家彭楚南指出有一種只能同與它有聯系的詞連用的詞群（所謂“有此必有彼”）。他雖然正確地指出了這些詞具有自由運用的能力（亦即具有可以根據句子結構而換位的能力），並且可在這些詞中間添加很多詞，但是他卻把它們稱為“單音節”，稱為“字”，而不是稱為“詞”。^③

我們是用語言學界早就採用的術語把漢語中這種只能在一定的詞參加下實現自己意義（或者意義之一）的詞的範疇，稱為联义詞（слова со связан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 15 具有這種联义詞並非漢語的特点。在任何一種語言中，詞彙總是經常不斷得到新詞補充和喪失原來的舊詞的。但是不管新詞或舊詞，它們大部分都是联义詞。^④前者逐漸越來越多地滲入語言系統，在詞義擴大、形象化和轉義使用等過程中逐漸擴張它可能聯系的範圍，而轉化為一種自由意義的詞的範疇。后者就不是這樣，它的使用範圍逐漸狹小，意義的聯系也越來越覺得緊密。

維諾格拉多夫在談到詞的成語意義時這樣指出：

“詞的許多意義是封閉在嚴格一定的成語上下文中，只有根據歷史上形成的使用成語的條件才能用來交換思想。現代語言系統中許多詞是沒有稱謂意義的。它們只存在於為數不多的成語詞組中。”^⑤接着他又說：“但是詞的直接的稱謂意義也可能很狹小，在自己的實物意義能力上可能是很有限的。”^⑥

俄語 тарашить 這個詞，就是說明詞的意義關聯性一個很好的例子。Тарашить 的意思是“大大打開”。^⑦但是“大大打開”的東西可以是門、窗、箱子、懷抱和通路等等，而 тарашить 就只能指眼睛。在一句說話里面出現 тарашить 這個動詞，那一定得引起同它有關聯的名詞“眼睛”出現（有此必有彼）。換句話說，тарашить 這個詞是不能在與眼睛的聯系之外實現自己的意義的，也是不能用它的同義詞實現自己的意義的。Обстоять（進行）這個詞也具有這種意義關聯的特点，它只能用在與 дело（事情）聯系的場合下。只有談到年齡我們才能用 преклонный（衰老的）這個詞。Обуревать（激起）也只能同表示精神傾向、衝動和熱情等等的詞連用。

俄語中差不多完全喪失了稱謂意義的例子，就是 баклуши（譯注：原義鑊鉞）這個詞。成語 бить баклуши（游手好閑）表示的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對 баклуши 這個詞的詞源和它的物質意義現在也只有

① 見雅洪托夫《漢語動詞範疇》，副博士論文，列寧格勒，1954年，75頁以下。

② 見宋采夫《漢語中的詞和詞根問題》，副博士論文，莫斯科，1953年，27—39和288頁。

③ 見彭楚南《兩種詞兒和三個連寫標準》，載《中國語文》，1954年，4月號，7頁。

④ 當然，這一條並不適用於術語。

⑤ 見維諾格拉多夫《詞的詞彙意義的主要類型》，載蘇聯《語言學問題》雜誌，1953年，第5期，16頁。（譯文見《俄語教學與研究》，1958年，第三期）。關於可變化的或活動詞組同不變化的或固定詞組之間的區別問題，可參閱 Б. А. Ларин 所著的《熟語學綱要》（本書是以俄語和立陶宛語為材料寫成的），見《國立列寧格勒大學學術叢書》，1956年第198分冊，200—224頁。

⑥ 見維諾格拉多夫同上文，18頁。

⑦ 見烏沙閣夫主編《俄語詳解辭典》，第4卷，655頁。

語言學家才會感到興趣。不過這個詞今天仍然活在語言中，並且是當作某種非常現實的東西來理解的。由於бить(打)這個詞能夠自由變形(如 бил баклуши——他過去游手好閑，бьет баклуши——他現在游手好閑，будет бить баклуши——他將來游手好閑)，還由於詞在成語中可以自由換位(баклуши бил)，雖然баклуши這個詞已經是不變格的詞，但它的單詞性是毋庸置疑的。俄語缺乏相應的能產的構詞模式，因此就使бить баклуши這個詞組喪失了變為複合詞的可能性(試比較 колобродить——吵鬧)。

在英語中也有這樣類似的情況，例如rid(擺脫)這個詞，它保存了自己的單詞性(如 to get rid, got rid)，但是差不多喪失了稱謂意義，只能用在嚴格一定的成語上下文中。

由此可見，只能在嚴格限制的聯繫中實現自己的意義，只能根據歷史上形成的使用條件用在語言中，而現在僅僅繼續存在於為數不多的詞彙詞組中的這種詞(正是詞而不是形態成分)，在複雜的語言體系里是可能存在的。

這條結論對於我們來說，非常要緊，因為我們認為，它是了解現代漢語許多詞群性質的鑰匙。

§ 16 漢語詞彙的特點並不在於它有這種聯義詞，而是在於這種聯義詞為數很多，它們大都是單音節的，並且還有多音節的同義詞，這些同義詞在自己的聯繫方面是要自由得多的。

單音節詞的多義性和同音異義現象使得情況複雜化了，這給研究漢語詞的本質造成嚴重的困難，常常引人得出不正確的結論。

試以這樣的詞彙結構為例：

嘆|氣 生|氣 鬧|氣 喪|氣
沉|氣 出|氣 服|氣 受|氣

如果拋開這些結構在實際言語中的功能不談，可能就會認為這些都是詞。這些結構的詞義特點是可能使人作出那樣的結論的，因為它們全都是表示人的感情和情緒的種種現象。固定成分“氣”的存在或許會令人覺得，我們應當把“氣”看作是這類詞群的詞的構詞成分，而構成那種整體的兩個成分的意義結合起來得到的意義，則應看作是那些詞的內部形式。

我們認為，上面碰到的都不是詞而是詞組。這方面的理由我們在前面分析複合結構時已經談過了(見§6)。現在只需分析“氣”在這些詞組中的作用。

要把漢語的“氣”的意義用一個俄語詞翻譯過來，那是不可能的。它的意義相當複雜，而且範圍很大，更何況在它裡面還含有“氣”這個詞所表示的概念的種種新意義產生時的各種歷史痕跡。不過一當“氣”這個詞同別的詞發生了聯繫，那種複雜性便告消失：“氣”的

意義立刻具體化了。例如，當“氣”這個詞同“打”這個詞結合起來的時候，這就是說，當人們說出“打|氣”的時候，便獲得了“把空氣打進去”的意義(比方往汽車輪胎里打氣)。當“氣”同“喘”這個詞結合起來的時候，這就是說，當人們說出“喘|氣”的時候，便獲得了“幾乎轉不過來氣”的意義。這樣就顯出了“氣”的第一個意義：空氣——氣息。其次，這個意義又轉入另一個範圍。“服|氣”的“服”意思是“服從”，“服氣”就有“服從(自己的)精神”的意義也就是有“折服”的意義。既然“空氣——氣息”的意義轉入了人類精神的範圍，所以意義也能由此轉義而進一步發展：“氣”獲得了表示人的各種精神表現(情緒)的能力。因此在“喪|氣”這種說法中，“喪”是“丟失”的意思，這裡“氣”便獲得了“沉着”、“勇敢”的意義；而在“生|氣”這種說法中，“生”是“產生”的意思，這裡“氣”便獲得了“忿怒”的意義，總起來說，就相當於俄語的 разгневаться。像這樣的例子是不勝枚舉的。

現在我們來研究類似用聯義詞組成的(或者全是聯義詞組成的，或者至少其中有一個是聯義詞，例如“氣”)詞組。“打”這個詞在詞組“打|氣”之外當然沒有“灌進”的意思，在對譯辭典里給它這個意義就不正確，“灌進”這個意義是它同“氣”結合起來才有的，“氣”在這種情況下便獲得了嚴格一定的意義——“空氣”。因此在這個詞組中，兩個詞的意義都是有關聯的。在“生|氣”這個詞組中，情形就不一樣，“生”這個詞是自由的，而“氣”這個詞便具有“忿怒”的特別意義。因此在這裡，具有關聯意義的只有“氣”這一個詞。

能夠同“氣”結合在一起的很多，但那決不是這個詞“形態化”——變為一定詞義的詞群的構詞成分——的特徵，其所以很多，是因為“氣”這個詞有特別的詞義容量。若把“氣”的意義譯成別的語言，例如說譯成俄語，那在不同的場合下就得譯為根本不同的詞，例如“勇敢”(мужество)、“忿怒”(гнев)，單說這一點也就可以看得出來。正是由於“氣”的意義範圍很寬，這才使得很多詞都能同它組成詞組。不過所有這些詞組都是特種詞組，它的構成詞是有關聯意義的，至少“氣”的意義是有關聯意義的。

至於聯義詞的單詞性，還表現在它們在相當的言語環境下可以單獨使用而不需要第二個成分，不過這時剝奪了它的詞彙意義。這種明顯的例子我們從老舍的劇本《龍鬚溝》中就能找到。^①

劇中人之一這樣問道：“你|還|不|服|氣？”接着回答的却是：“我|服！我|服！”

用聯義詞組成的詞組在漢語中保存了大量的單音

① 見老舍《龍鬚溝》，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46頁。

节詞，虽然同它們并存的还有许多一般的多音节詞，这种多音节詞的意义是完全自由的，并且是同相应的單音节詞的某种关联意义相等的。例如“气”这个詞的关联意义之一是“勇敢”，同它并存的詞还有“勇气”，“勇气”的意义也是“勇敢”的意思，不过，这个意义是自由的。

“說”是一个自由意义詞，它能同許多各式各样的詞結合。这个詞就是不在一定的上下文中也能听得懂，因为它沒有同音异义詞。但是像“說出、斥責”这样的意义，就只能在一定的条件和联系下才能实现：客体受直接支配关系就是語法条件，客体是生物就是詞义条件（試比較“說|給|学生”和“說|学生”）。最后，“說”这个詞最有关联意义的就是“說妥、說媒”的意义，这个意义只能在同“媒”或“媒人”等詞結合时才能实现（試比較“我的|老婆|是|媒人|給|說的”——《龙鬚溝》52頁）。

“眼睛”这个詞①具有自由意义，这意义是在与邏輯上允許的一切詞的联系中实现的。但是与此同时，还殘存着它的同义詞“眼”，“眼”这个詞已經丧失了联系的自由性，只能在同一定范围的詞結合时实现自己的意义。例如我們可以說：“他|已經|睜不开|眼”（《龙鬚溝》66頁），“就|得|瞪着|眼|挨|餓”（《龙鬚溝》5頁），“看花了|眼”，“瞎了|眼”，“閉着|眼”，等等。不难看出，“眼”这个詞是同那些表示与眼睛或眼睛的功能有直接关系的概念的詞用在一起的：“睜”、“閉”②、“花”、“瞪”、“瞎”等等。在別的自由上下文中“眼”这个詞不同上述为数有限的几个詞联用是不可能的。在我們所列举的例子中，正如在任何別の場合下一样，“眼”这个詞可以用“眼睛”代替而不損其意义。③与此相反，在像“她的|眼睛|生得|很|漂亮”，“打伤了|眼睛”，“你|有|眼睛|沒有？”等等这样自由的上下文中，用“眼”来代替“眼睛”是不可以的。“眼”这个詞的关联意义由此显然可見。④

我們再举一个不無兴趣的例子。未必有人会輕易同意，說現代漢語中存在着“霹”这个單音节詞。在知識分子的語言中，我們常常可以从借自書面文學語言的成語“請-天-霹-靂”中看到它。就是現代漢字字典也不把“霹”这个字單列出来，而告訴讀者去查“霹靂”这个詞組，⑤这里把“霹靂”解釋为“急雷”。但是在老舍的著作中，我們也听到一个沒有文化的妇人說出这样祈禱上蒼的話：“有|雷，去|霹|那些|惡霸，有|雨，往|田|里|下”。从上下文来看，“霹”这个詞是單詞那是沒有什麼疑問的。显然可見“霹”这个詞具有关联意义，这个意义只是在与“雷”字的联系中才能实现的。这个例子表明，已經进入詞彙詞組中的古詞是何等頑固地固定在語言中。“霹|雷”或“劈|雷”这个詞組是在

許多辭典中都有的。

可以这样認為：漢語詞彙的特点是，具有关联意义的單音节詞很多，同時又有許多同音异义現象使得它的特点复杂化了，正是由于上述特点，这才使得当时杰出的俄国漢學家畢秋林作出結論說：“漢語中根本就沒有詞；我們管它叫做詞的東西只是語音，那是不跟前面說的話或別的語音联系就可以發音的，因此不表示一定的概念……”接着他又說：“如果要用一个同言語沒有联系的語音来表示一件什麼事物，就得把另一个語音加在它上面，同它構成一定的思想……”⑥

有趣的是，畢秋林虽然相当确切地指出了这种現象本身，但是却用了当时在漢学界占統治地位的观点——認為漢語是“沒有形式的”語言——來解釋这些現象。

根据上述，我們就不能同意赫迈萊夫斯基的看法。他提出詞要能在上下文的联系以外，脫离別的詞而叫人听得懂，作为确定漢語詞的單詞性的标准之一。⑦这条标准並沒有考虑到真正的語言现实。要不就承認中国人嘴里說的不仅有整个的詞，而且还有半个詞、意素（семантема）、詞根，要不就承認漢語中存在着只能在特定的語言条件下实现自己意义的詞。

§ 17 不但詞叫人听不懂不能作为否認其為單詞的根据，就是詞完全失去自己的称谓意义也不能作为否認其為單詞的根据。前面已經說过，在詞彙詞組中已經固定下来的單詞，是可能在語言中长期存在的，虽然它們的詞义已經部分或者全部失去了。不过这样的詞是为数不多的。它們全都算在联义詞的范畴以內，因为它们的生命本身是靠一定的詞彙联系延續下来的。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詞的界限，語法标准就成了唯一可靠的。尽管那种詞能在句中自由运用，能做句中

① “眼睛”这个复合詞源出于古漢語的兩個詞“眼”和“睛”。在現代漢語中，“睛”这个詞已經完全不用了。它所表示的概念現在在日常生活用語中是用“瞳人兒”这个詞来表示，在科學術語上則是用“睛球”这个詞来表示。

② 在說到眼睛的时候，漢語中具有專用詞来表示“打開”和“合上”的概念。

③ 例外的情况只有像“他|看了|我|一眼”之类的慣用語，这里“一眼”与其說是担負着意义不如說是担負着語法功能。如果要說“眼”这个詞具有实物意义的話，那末它所表示的意义就是“眼光”，而不是“眼睛”。

④ 必須着重指出，“意义的关联性”这个術語决不意味着詞义的某种損害。这里說的只是意义实现的特殊条件。

⑤ 見《國語辭典》，23頁。

⑥ Iakinf Bichurin:《漢文啓蒙》，1908年，1頁。

⑦ 赫迈萊夫斯基：《漢語的句法和形态問題》，載《中國語文》，1954年12月号。

成分，在語法上也能像同一詞彙語法範疇的別的词那样表現，但是不能就此把它当作詞的成分。

我們再举几个已經喪失或几乎已經喪失稱謂意义的漢語詞为例：

現代漢語中有“覺”这个词存在。在“睡|覺”和“吵|覺”這兩個詞組中都看得見它。只有从動詞“睡”和“吵”的意义中，从与“覺”字結合的動賓結構中，才能作出結論說，“覺”的意义接近于“睡眠”、“睡眠状态”，“睡覺”就是“睡”，“吵覺”也就是“把人吵醒”。由此可見，“覺”这个词現在已經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稱謂意义。就是比較好的現代漢語詳解辭典也確認这一点：它們沒有把“覺”这个词單列出来，而总是把它同“睡”这个词列在一起。

不过“覺”这个词虽然失去了稱謂意义，但也还完全保存了自己的詞彙独立性。它可在自己前面接受定語，可以执行句子主要成分的功能。正是由于这个词能在句中自由运用（如“覺|都|沒|睡好了”），还由于“睡”和“吵”这些動詞就在与“覺”字結合时也保存了所有的動詞形式，因此不能說“睡|覺”和“吵|覺”这类詞組已經變成單一的詞。

完全喪失稱謂意义的情况在現代漢語的“架”这个词上也可看到。这个词的来源已不可考，在現代漢語中見于“打|架”、“吵|架”和“劝|架”这三个最常用的詞組。就上列用法来判断，“架”这个词的原始意义的單一性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这个意义已經喪失殆尽了，以致現在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單詞意义。許多辭典都是把“架”这个词列在上述詞組的成分中。至于談到这个詞在句中的行为，那它是同上述“覺”字完全一样的（例如“吵了|半天的|架”）。

談談“仗”这个词也不是多余的。在古漢語中，这个词的意思是“兵器”。所有的大部頭辭典都是記載这个意义。^①因此“打|仗”这个词組过去就是表示“械斗”或“交兵”的意思。但是在現代漢語中，“仗”这个词已經完全失去了稱謂意义，而仅存于“打|仗”这个词組中，它現在只表示“厮杀”和“交战”的意思。同它共存的还有另一个詞組“作|战”，“仗”这个词根据类比便开始轉义为“战斗、战争”。因此在1952年出版的《学文化字典》，就把这个词解釋为“战争”的意义。^②这当然是不对的。“仗”这个词在意义上和“战役”、“战斗”都完全一样，不过同时和它們也有不同，因为“仗”字概括了它們的概念。“仗”字虽然失去了自己的稱謂意义——“兵器”，但是在同“打”字結合时却保存了一种特别的意味，它表示最一般的概念——一般所謂的“厮杀，交战”。“打了|兩-回|仗”譯成俄語最恰当的就是“сра-зались дважды”，而譯成“отвоевали две войны”或“провели два боя”則是根本錯誤的。

§ 18 在以上几节分析联义詞的問題时，我們主要是以動賓結構的詞組作为例子。但是这决不是說，只在那种类型的詞的关系中才能有詞义的联义性。实际上，联义詞虽然在動賓結構的詞組中最为常見，但是表示一对对立概念的詞也是常常互有关联的。^③

例如“歹”这个字在現代漢語中已經沒有自由意义了。它的意义显現在有反义詞“好”的时候：“好|話，歹|話，都|可以|說”（老舍：《龙鬚溝》69頁）。

“先后”这个口語中的活詞（如“先后|已經|抓去|三十|多个|了”——《龙鬚溝》31頁），是兩個詞“先”和“后”組成的詞組詞彙化所構成的。这里若說“先”字是作为具有自由意义的詞保存在現代漢語中（如“讓|我|先|解釋|一下”、“我|先|洗|手|去”），那末“后”字作为獨立詞就已被“后来”和“以后”这样的新結構挤出于現代漢語之外了。它現在只能同“先”字联在一起使用，或者同本身的殘存詞的“前”字联在一起使用。例如：“先|洗|手，后|吃|飯”或“旅客|一|前|一|后|下了|船”。

除了“兒子”、“女兒”等詞以外，我們在現代口語中还可碰到像“兒”或“子”这样的古詞。这些詞現在只能用在互有联系的情況下，亦即用在类似相对的意义中：“他|有|一|兒|一|女”、“一|子|三|女”。值得注意的是，名詞用了古詞还要求数詞也用古代形式：作为現代漢語限定詞的量詞用在这些結構中而不大大損害其風格，那是不可能的。

“女”这个词在与“男”对举时就显现自己另外一个意义——“女人”。例如說：“好|男|不|跟|女|斗”（老舍：《龙鬚溝》26頁）。

又如“敌”这个词，是与同它相对的“我”这个词联用的（如“敌|少|我|多”）。复数的后綴“們”在这里也是根据上述理由不能用。

§ 19 值得注意的还有一类联义詞。这就是只能同一定的后置詞联在一起使用的單音节名詞（这类詞都有多音节的同义詞）。

这种現象早就已經引起研究家的注意了。V. M. 宋采夫最先詳細地研究了这种現象。他把这种現象同以后綴“子”結尾的名詞联系起来，并由此作出假設，說后置詞获得了能够改变詞的形式的詞形变化后綴的性質。^④这个假設得到鄂山蔭教授的支持，他假定在后置

① 例如《國語辭典》就解釋为“兵器之总称”，見第2674条。

② 見《学文化字典》，1952年，32頁。

③ 关于这一点，还可參閱宋采夫所著《漢語中的詞和詞根問題》一書，34頁。

④ 宋采夫：《漢語中的詞和詞根問題》，105—116頁。

詞形态化(морфологизация)的基础上漢語中可能形成變格的範疇。^①

鑒於這個問題同詞的界限有直接關係,^②我們就來稍微詳細地研究一下。

問題的實質歸根結蒂就是:漢語中存在着許多以後綴“子”結尾的名詞。這些名詞的來源是不一律的:它們是從動詞詞干、性質詞干和實物詞干分別加上後綴“子”而構成的。根據漢語語法的一般規則,所有這些名詞在表示空間關係時都可接受後置詞。但是其中有一部分這樣的詞,亦即由實物詞干構成的詞,也還另有自己的特點:後置詞不能加在(獨立的)後綴形式(如“屋子”)上,只能加在(半獨立的)非後綴形式上,也就是說,加在原来的名詞“屋”上面,這個“屋”也就是構成“後綴形式”的基礎。由此便構成詞的兩個形式:後綴形式(“屋子”)和後置詞形式(“屋里”)。這裡第一個形式一般是用作主語和直接賓語,而第二個形式則用作間接賓語和狀語。

但是把“屋子”和“屋里”看作同一個詞的兩個形式是否正確呢?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必須考慮以下幾點:

第一,遠不是以後綴“子”結尾的一切名詞^③在用後置詞“構形”時都能得到“後置詞形式”。

我們來比較下列兩種詞:

後綴形式	後置詞形式	後綴形式	後置詞形式
車 子	車 上	鼻 子	鼻子上(?)
轎 子	轎 上	胰 子	胰子上(?)
桌 子	桌 上	餃 子	餃子上(?)
盤 子	盤 上	茄 子	茄子上(?)
村 子	村 上	袜 子	袜子上(?)

從上面的比較中可以看出,“後置詞(非後綴的)形式”只是那些由於自己的意義決定永遠能同後置詞在一起用作狀語的詞才有(而且也不是所有這樣的詞都有)。這裡應當着重指出,每種詞在表中雖然各舉了五個例子,但是第二類詞的數目是無限之多的。^④

第二,具體名詞的“非後綴形式”不能同所有的後置詞聯用,只能同其中一兩個由於習慣用法決定而與這個詞固定在一起的後置詞聯用。

例如說“屋子”、“屋里”,但是要說“屋子|上”、“屋子|底下”;“肚子”、“肚|里”,但是要說“肚子|上”;“桌子”、“桌|上”,但是要說“桌子|後邊”;“轎子”、“轎|上”,但是要說“轎子|旁邊”等等。

第三,那樣的“半獨立形式”我們不僅可在以後綴“子”結尾的名詞上找到,而且在複合構成的名詞上也可以找到。例如“肩膀”和“肩|上”,“工廠”和“廠|里”。

這裡很重要的,“後置詞形式”既能由複合詞詞干的第一部分構分,也能用它的第二部分構成。

由此可見,在現代漢語中只用後置詞連用的名詞:

1. 僅占漢語詞彙中名詞總數的很小一部分;
2. 它們的範圍僅限於由於自己的詞彙意義決定而與後置詞連用的時候最多、最合習慣用法的詞;
3. 每個具體的名詞只能同具體的後置詞連用。

因此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提出所謂詞形變化和構形的問題是沒有充分根據的。如果名詞擁有一定的構形類型,那它就應能把一切基本名詞包括進去。語法處理的不是具體的詞,而是詞的範疇。在我們前面分析過的情況下,提到的具體詞是受一定的意義範圍限制的,並且是同具體的後置詞連用的。顯然,這種現象的解釋不應當到語法學中找,而應到詞彙學中去找。

這裡的問題就在於,漢語中存在着一個富有能產性的構詞模式——在實物詞干、性質詞干和動詞詞干上加上構詞後綴“子”而形成名詞。許多單音節名詞(有時還不止單音節名詞)^⑤都處在這個積極構詞模式的作用範圍以內。因此在漢語中,同時有兩個詞表示同一個概念:單音節的原始詞和後綴“子”構成的新構詞。^⑥在一開始時是明顯地感覺到的新詞,例如現在“路子”這個詞(如“你|算是|走對了|路子”——《龍鬚溝》32頁)就是。然後原始詞受到新的同義詞排擠,它的聯繫範圍便開始縮小,它的意義變成了關聯意義,而且它也只是保存在有限幾個靠習慣用法固定下來的固定詞彙結構中。不過就在這時它也還保存着自己的詞彙獨立性,繼續保持其為單詞。

如果說“路”這個詞將來要被“路子”排擠出去,那末在這種情況下它還能長期保存於同後置詞“上”結成的詞組中,亦即保存在“路|上”這個用語中。^⑦

(下轉339頁)

① 郭山蔭:《漢語中的詞和詞類》,博士論文,359頁。

② 關於後置詞的獨立性還可參閱賈布基娜的副博士論文《現代漢語中的後置詞》,莫斯科,1954年。譯文見《中國語文》,1957年12月號。

③ 以下專談用實物詞干構成的名詞。

④ 在《拼音漢俄辭典試編》中,以“子”結尾和用實物詞干構成的詞收錄了119個,其中只有兩個這樣的詞是以所謂“後置詞形式”使用的。

⑤ 例如:“戲院”——“戲院子”、“樹林”——“樹林子”等等。

⑥ 試比較俄語的“остроум”——“остроумец”(聰明人)和“голова”——“голова” (薄冰)。

⑦ 再進一步詞彙化當然也能構成一個單詞的。不過在這種情況下詞的意義要完全改變而轉入副詞一類。例如:“馬上”、“目下”、“目前”、“背後”等。這裡的差異是非常明顯的:“馬上”和“一匹|馬|上”的意思已經完全脫節,“桌上”和“一張|桌|上”的意義則是相同的。俄語中由名詞和前置詞構成的副詞(наголову——徹頭徹尾地、вмиг——一眨眼間、вслед——跟隨着,等等)也是這樣。

少数民族文字中汉语借词问题

王輔世

第二次少数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上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春副主任的总结发言指出：有一些民族语文工作者主张少数民族文字不借或少借汉语词的“求纯”思想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傅懋勳副所长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字中新词术语问题”报告中强调了借用汉语词是解决少数民族语言新词术语的重要方法。这些意见我完全同意。

我国的少数民族从很古的时候起就和汉族在一起居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少数民族语言中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并且有的汉语借词已经成为基本词彙的一部分。解放以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交际更加频繁，少数民族语言中又渗入了前所未有的大量的汉语借词。这些汉语借词应当作为民族语言的词彙组成部分在少数民族文字中确定下来；但是有一些民族语文工作者不赞成在本民族文字中出现汉语借词或出现大量的汉语借词，尽管汉语借词在人民口语中存在，他们在文字中却加以排斥。

为什么要排斥汉语借词呢？有的民族语文工作者认为，汉语借词大量出现在民族文字中会导致民族语言的不“纯”。这种想法是很不正确的。世界上没有“纯”的语言，如果有，也是未曾和外界来往的原始人的语言。世界上文化发达的民族如英吉利、俄罗斯、日本等的语言都不“纯”，它们都各拥有很多的借词。打开牛津大学出版的《英语字源词典》(Walter W. Skeat 著，1956年版)第1至第10页，从A至Agile共有226个词(实有242个条目，内有词头及不注字源的词16个)，其中英语固有的词仅有39个，其余187个都是外来语(来源有希腊、拉丁、法语、意语、德语、高德语、荷语、斯堪的那维亚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叙利亚语等)。俄罗斯语本身的词彙是丰富的，但为了便于文化交流(在最初主要是为了便于学习西方文明)，俄罗斯人对于借词是不犹豫的。有的科学术语，自己语言中本来没有，就直接借用以希腊、拉丁为根源的国际通用术语，例如 психология (心理学)(希腊 psychē + logos)，нация (民族)(拉丁 natio)，конкретный (具体的)(拉丁 concretus)。有的可以用自己语言的词根构造，也借用一个国际通用术语作为本族词的同义词。例如：“语言学”用本族语说，是 языкознание 或 языковедение，但另外借了 лингвистика (法语 lin-

guistique < 拉丁 lingua)；“单元音”是 одногласный，但另外借了 монофтонг (希腊 mono + phthongos)；“弱化”是 ослабление，但另外借了 редукция (拉丁 reduce)。正因这样的借法，在俄语中，外来语的数目是不能计算的，现在一本普通的外来语词典就有二万个条目。日语的借词更多，每一个汉字都连形带声地借入日文中，同时利用汉字又组成数以万计的复音词如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这些复音词绝大多数是读汉音的。明治维新以后，又借用了大量的西洋词，例如，タクシー (出租汽车，英 taxi)，ハンケチ (手帕，英 handkerchief)，シガー (雪茄，英 cigar)，パン (面包，葡 pan，法 pain)，カフェー (咖啡馆，法 café)，シャン (美人，德 Schöne)，カピタン (船长，荷 kapitein，西 capitán)，カヴァティナ (咏叹曲，意 cavatina)。日语和俄语一样，自己语言本来有或可以用汉字组成的词也同样借了外来语作为同义词，例如“劳动”、“工作”、“事业”、“细工”、“制作”、“著述”都是早就通用的词，但另外又借了ワーク (英 work)，“中折” (宽边大帽，读作[nakawori])是旧有的词，可以表达有边呢帽的意思，但另外借了ハット (英 hat)，“专卖特许”“特许权”等用汉字组成的复音词可以表达专利权的意思，但另外又借了パテント (英 patent) 等。也正因这样的借法，在日本语中，借用西洋语的数目也是不能计算的，《世界新语词典》(英文大阪每日学习号编辑局编辑，昭和十二年出版)就有两万个以上的条目。除上面举的英、俄、日等民族以外，德、法、意、西、葡等民族也都大量借用希腊、拉丁词，朝鲜、越南也都大量借用汉语，汉语也大量借用了日本用汉字组成的复音词，这些民族的语言并未因借用别的民族的词彙而削弱或被同化，相反地，它们倒得到了发展、繁荣，民族文化也因借词多，便于吸收别的民族的成就，获得了飞跃的进步。所以，说少数民族文字借用了汉语词就不成其为独立的文字，就有削弱或被汉语同化的危险等等的話，是没有理论和事实根据的。

另外有一部分民族语文工作者在民族文字中排斥汉语借词，但同时却借用外国词。这就不是求“纯”而是一种崇拜外国的思想了。他们认为汉族的文化不如外国发达，借用外国词会对本民族的文化更有好处。这种想法也是脱离实际的。中国的少数民族毕竟居住在中国，和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来往的机会总比

和外国人来往的机会多。尽管外国的文化也很发达，但他们的話对我国的少数民族来说是陌生的。还不要說少数民族人民口語中已經使用了大量的漢語借詞，即使有的詞還沒有使用，將來也會比外國詞先被人們使用。在這種歷史和地理的條件下，不把漢語借詞在民族文字中肯定，而要借用外國詞，對民族文化的發展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有些民族語文工作者不願意在民族文字中借用漢語的新詞術語，而要用本民族的詞根創造。他們說用本民族詞根創造的詞，群眾容易理解。這個問題應當從兩方面看，固然用本族的詞根創造的詞比漢語借詞容易為群眾所理解，但若創造的不恰當，也容易為群眾所誤解。據說有的少數民族文字中曾把“經濟”一詞用本族的詞根創成“珍珠瑪瑙加羊毛”。是不是“經濟”的內容僅限於珍珠瑪瑙和羊毛呢？當然不是。經濟里面包括財政、貿易、工業、農業、交通、生產、消費、分配等與國計民生有關的一切項目。有的少數民族文字把“會計處”用本族的詞根創成“管理錢的地方”，是不是管理錢的地方都是“會計處”呢？也當然不是。管理錢的地方還有銀行、金庫、會計科、會計室、財政部、財政廳、財政局等。現在社會各行各業的分工、各種事務的分類日益精細，那麼詞彙的概念也就要求十分精確，如果用本族詞根創造新詞術語，產生含混不清模稜兩可的現象時，倒不如借用漢語的詞彙來得便利。雖然群眾學習漢語借詞時最初可能有些困難（和漢族在一起居住一起生產的，學習可能沒有困難），但學會以後，既能正確掌握詞的概念，又便於進一步學習漢文。事實上有一部漢語借詞如“農業合作社”、“土改”、“工業化”、“生產”等已經在某些少數民族人民口語中使用，不贊成借用漢詞的人一定要用本族的詞根創造新詞，其結果只會使民族文化脫離漢族文化，脫離祖國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而陷於孤立。這對於民族語言民族文化的發展是極不利的。

根據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肯定，在少數民族文字中借用漢詞，對於民族語的發展是有好處的，對民族文化的提高是會起促進作用的。

漢語借詞在拉丁化民族文字中的寫法問題，在第二次少數民族語文科學討論會中曾經展開熱烈辯論。傅副所長在他的報告中指出：“古漢語借詞已經成為少數民族日常應用的基本詞彙，由於借用日久，一般人很難把它們由本民族的詞彙中區分出來，所以它們應當用少數民族自己的音位系統拼寫。至於現代漢語借詞，如果民族語的音位系統和漢語拼音方案差別不太大，最好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這樣可以增加祖國各民族語的共同成分，有助於民族間的團結和文化交流。”我同意古漢語借詞用民族語的音位系統拼寫，但是新

借漢詞，我認為不論民族語音系和漢語拼音方案差別多大，都應當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

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並不意味著一定按北京音讀音。例如苗語黔東方言文字標準音點養蒿村沒有[tsʰ]和[an]音，把漢語的[tsʰ]音都讀作[tsʰ]，[an]音都讀作[ai]（ian和yan都讀作i），把“產”字照漢語拼音方案寫成chan但讀作[tsʰai]，這有什麼不可呢？不贊成按照漢語拼音方案拼寫的人說chan和cai都讀作[tsʰai]，負擔太重。我想這要看為了什麼目的，如果是為了祖國各民族的團結，為了苗漢兩族互相學習方便，這樣有兩種表示法的音多至十幾個，也不能認為是負擔。除了我們常用的漢字常有幾個或更多的同音不同形的字以外，其他國家拼音文字的例子也很多。例如英語中[i:]這個音位就有e, ee, ea, ie等幾種表示法。[z]這個音位就有z, s, ze, se等幾種表示法。[f]這個音位就有f, ph, gh等幾種表示法。不但如此，還有同一個形式讀作幾種不同的音的情形，如a可以讀作[a:] [æ] [ɛ] [ə] [ei] [ə]，[ə:]等幾種音。i可以讀作[ai]，也可以讀作[i]。y可以讀作[j]也可以讀作[ai]，也可以讀作[i]。類似的例子還很多。德語也有同一音位用不同形式表示的情形，例如ich（我）中的ch和fleissig（勤勉）中的g都讀作[ç]，sch讀作[ʃ]（如：schnell快），s也有時讀作[ʃ]（如：Sprach話）。俄語每個字母的發音是比較確定的，但也有同一音位用不同字母表示的情形。例如[s]音位通常用ш表示（如：шаг步），但也有時用ч表示（如：что什麼，конечно當然），[x]音位通常用х表示（如：хорошо好），但也有時用г表示（如：лёгкий容易）。[v]音位通常用в表示（如：Вы你們），但也有時用г表示（如：его他的，старого旧的，第二格，但много中的г雖然也處於兩個o的中間却讀作[g]）。日本語在字形和讀音上更不一致，例如一個“生”字，普通的讀法就有いかる（插花）、いく（活）、うまる（生下，自動）、うまれ（誕生）、うみ（親生的）、うむ（生下，他動）、おう（生長）、おほす（化育）、き（生的，接頭語）、しやう（生“涯”）、しやうず（發起）、なす（生產）、なま（生的）、なり（“結下來的”果子）、なる（“結”果子）はやす（使生長）、はゆ（“長”牙齒）等十幾種讀法，同時各種讀法的“生”字意義也不相同。[dʒi]這個音節可以用ぢ、じ兩個字母表示，[dzu]這個音節可以用づ、ず兩個字母表示，[i]可以用い、ゐ兩個字母表示，[e]可以用え、ゑ兩個字母表示，[o]可以用お、を兩個字母表示。同時因為はひ、ふ、へ、ほ等五個字母作首音節時讀作[ha] [hi] [fu] [he] [ho]，作中間音節或末音節時，又讀作

* 過去我曾主張用民族語的音系拼寫少數民族所在地的漢語地方話，見《中國語文》1957年5月號。

[wa] [i] [u] [e] [o],所以[i][e][u]三个音位实际各有三种表示方法。另外如けふ=きやう=きよう,せう=しやう=しょう,てふ=ちやう=ちよう,くわん=かん,くわい=かい,かう=こう,さう=そう,……等音变规律也都表现着不同形式讀作相同的音。至于法語由于口語的形态变化少于文字的形态变化,又因为每个字單讀时塞音尾大半不發音,所以形异而音同的字最多。例如:appelle(我說,他說)appelles(你說),appellent(他們說)三个字的音都讀作[apel];va(他去),vas(你去)两个字都讀作[va];aime(我爱,他爱),aimes(你爱)两个字都讀作[em]。es(你是),est(他是),aie(我有——接續法現在时),aies(你有——接續法現在时),aiet(他有——接續法現在时),aient(他們有——接續法現在时)等六个字都讀作[ε]。

根据上面举的几种語言的例子,足够說明苗語中chan和cai都讀作[ts'ai]并不是很突出的困难,当然我們可以說这些历史比較長的文字的語音混乱現象是它們的缺点,我們不必仿效,但不要忘記我們把“产”字拼成chan而不是拼成cai的重要意义。我們不是为了仿效这些老文字而制造不必要的混乱,而是为了使四种苗文的漢語借詞拼法一致,从而也和漢語的拼法一致,增加祖国各民族語的共同成分而这样拼。上面举例也只是說明个别的音有些乱并不造成学习上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这些老一点的拼音文字正有几万万人每天在学习它們,如果真是由于讀音的不干净俐落影响到学习效果太差或达到不能学的程度,这些文字早就改革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拼音文字并不是学了拼音規則或学会了字母就算学会了,它也是要通过苦学死記才能掌握的。在未創立文字的时候,少数民族学习文化是要用汉字的,那时候滿篇的汉字可以学得会,現在在一篇文章中差不多都是本族的詞,加上几个用汉字写的借詞(就像日語的假名加汉字那样)也应当学得会吧,何况現在要求加的还不是方块汉字而是多少有对应規律可寻的(如zh→z, ch→c, sh→s, an→ai等)拼音漢詞,难道說就学不会嗎?困难竟至于比学滿篇的汉字还大嗎?我觉得少数民族創立文字主要是为了解决学习上的困难的,但在解决学习上的困难的同时,还不要忘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国家,学会了本族的文字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到怎样便于进一步学习漢語漢文。学会了漢語漢文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有利的。

主張漢語借詞用民族文字标准音的音位拼写标准音点的漢語地方話的人恐怕只考虑到标准音点的少数人学习的方便,沒有考虑到土語区次方言区和方言区的广大人民的学习問題。事实上,土語区和方言区的人民学习用民族文字标准音拼写的漢語地方話的借詞并

不見得比学习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写的漢語借詞更容易。例如苗語黔东方言标准音点把“委員”讀作[vivi],而在土語区和次方言区多半讀作[veie]或[veian],这个詞在土語区和次方言区的讀法倒是和漢語拼音方案的[weian]更接近一些。土語区次方言区和方言区的人民学习漢語拼音方案拼写的漢語借詞要死記,学习用民族文字标准音拼写的漢語地方話借詞也要死記,那就不如死記前者。学会了前者,将来学习漢語漢文时就非常方便,因为不論是用拼音方案注音也好,将来改为拼音文字也好,总是要以漢語的标准音为标准,不会以地方話为标准。

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写漢語借詞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做可以減輕在学兒童的負担。現在漢語普通話的学习正在全国各地大力展开。从下学期起小学的課本就要用漢語拼音方案注音,少数民族文字的語文課进入学校以后,如果民族語文課本上的漢語借詞是拼的漢語地方話,則一个漢詞在漢語課本中是一个拼法,在民族語課本中是另一个拼法,漢語借詞不多,还不太严重,事实上今后少数民族文字中要成千地借用漢詞,这成千的漢詞每个都有兩種拼法叫兒童死記,負担可就太重了。我們又不能为了减少兒童的負担,把学校中的民族語課本的漢語借詞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写,而把农民課本中的漢語借詞用民族語的音位拼写漢語地方話,这样就要产生民族文字的混乱,使农民和学生、父亲和兒子沒有共同的文字,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情。

一个民族創立几种文字的,漢語借詞更要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写,否則各方言文字的漢語借詞就無法統一。例如苗族有四种方言文字,过去就是各用各的音位拼写本地的漢語,造成“共产党”有四个写法,“毛主席”也有四个写法。难道說这是統一團結的表现嗎?有人也曾想用地方話把漢語借詞統一起来。是以湘西方言区的漢語为四路共同遵守的标准呢?还是以黔东方言区的漢語为四路共同遵守的标准呢?还是以川黔滇和滇东北方言区的漢語为四路共同遵守的标准呢?这个问题不是沒有討論过,結果总是得不到圓滿的解决,最后还是决定統一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写,苗語如此,其他一个民族創立一种以上文字的也必然如此。

有人反对漢語借詞按照漢語拼音方案拼写的理由是漢語拼音方案沒有附在音节末尾的声調字母,而少数民族文字都有声調字母,兩者放在一起不調和,并且借詞和本族的詞有明显的区别,使讀者心中不舒服。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很充分的。有的民族文字,本族的音节也有不标声調字母的,怎么不說不調和呢?事实上既然都是拉丁字母,根本沒有不調和的問題。至于借詞和本族的詞有明显的区别又有什么不好呢?日文中假名

(下轉 346 頁)

說“加以”

陳迪明

初中課本《漢語》第三冊有这么个例句：

對於別人的意見，我們必須虛心地加以考慮。

課本說“加以”是一個動詞，許多教師看了想不通。說是動詞，看去的确很不順眼。從結構上看，它不象一個詞，倒象是兩個；從意義上看，“加”和“以”又難於理解為一個整體的意義，不知到底是表示的什麼樣的動作、行為或變化。因此，有人就猜它是個副詞，作動詞“考慮”的狀語；有人又認為還是兩個詞，一動一介。總之，覺得這個詞不好理解。

若說“加以”是個副詞，作狀語，碰到這樣的情況就說不過去：“每人再加以必要的修改”。這裡“必要”是定語，決不能改為“必要地”，同一個“修改”，不能同時受一個定語和另一個狀語的修飾。可見“加以”不是副詞，而“修改”也不是謂語中心詞。

若說“加以”是一動一介，那麼，上邊“對於……意見，我們……加以考慮”一句，它的整個結構就得理解為：“對於”把“加”的賓語“意見”提到句首，讓“以考慮”這個作補語的介詞結構緊隨着動詞“加”。可是，這也不行。“對於”沒有這樣的提賓法，只有“把”才有，但這句里又不宜用“把”代“對於”去管住“意見”，即使是从句首調到動前。

這麼看來，課本把“加以”認定是動詞是恰當的，這不僅符合今天“加以”這個詞的實際用法，也合乎“加以”這個詞的歷史發展。很古的時候“加以”就已經存在了，但那時的用法却與今不同：

1) 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詞。（左傳）

2) 爵用玉棧仍雕，加以璧散璧角。（禮記）

上邊例 1，“加”是一個動詞，“以”是一個介詞，“之”這個代詞做“加”的賓語。例 2，“加”“以”雖連在一塊，但依然是一動一介，各自獨立，不是今天已合為一體的“加以”。就整句看，上兩句都是雙賓句，正賓語由“以”管着，次賓語由“加”管着。例 2 的次賓因為省掉了，所以“加”“以”才連在一起。古漢語中省略次賓是合“法”的，也是常見的，如“諭〔 〕以所為起大事”、“具告〔 〕以事”。所以例 2) 的“加”“以”還是兩個詞。到了現代，“加以”可變了樣，“加”的原来的賓語往往由“對於”領着，挪到句首，從此永遠不復原位，句子的結構也不再是雙賓式。“加”的賓語的變動，整個句式的變化，也就同時影響到“以”的地位。“以”就從原來帶

領正賓的這個介詞結構中脫落下來，向“加”的方向靠攏，“加”也由於失去了次賓，也就有可能把“以”接受過來。在現代漢語沒有省略次賓句式的條件下，“加”“以”就得以結成“不解緣”，當中再也不能插入任何作次賓的語詞，終於復合成為一個現代漢語動詞。“加以”的無可置疑的動詞性更可在這樣的句子中看出來：

正是這種矛盾要求我們必須加以正視，必須謹慎地、妥善地加以處理。

這句里，提到句首的“加”的賓語（意念上的），前頭連“對於”也沒有，已是名符其實的主語。這樣，“加以”之間更不能說省略了或被提去了個什麼，“加以”肯定是一個完整的動詞了。

不過，“加以”今天所以能具有一個動詞的資格，是取決於句子的結構的，不象一般動詞的構成，因此這兩個詞素“加”和“以”在意義上還是有点各具本色，一動一介，一實一虛。這不同的本色的存在妨礙着它們進一步的結合，不能發育成為內外一致渾然一體的一個動詞。這就“先天”地注定了它雖是動詞，却不能取得普通動詞的一部分語法特點，但另一方面却也独具“與眾不同”的特點：

第一、“加以”沒有如一般漢語動詞所表示的“體”這個範疇的任何詞形變化形式，如重迭、嵌音、后附時態助詞等。

第二、它的句法功能很不完備，如不能以肯定否定相重迭的方式表疑問，不能單獨用來回答問題，雖帶賓語但沒有一般動賓句的變式。除了作謂語中心詞外，不能做句子中的任何成分。

第三、“加以”的賓語都是用動詞充當的。而普通動詞的賓語多是名詞或代詞，用動詞是特殊的；即使用動詞，也與“加以”不同。“加以”的動詞賓語必是名物化的（這跟“以”字原有的介詞本色很有關係），普通動詞的則不一定，試比較：

加以研究（名物化） 加以研究科學（×）

喜歡科學研究（名物化）喜歡研究科學（動詞做賓語）

就是在名物化這一點上，“加以”的動詞賓語也跟普通動詞的不同。“加以”的不一定要前加名詞定語，而普通動詞的則必須加，否則就不是名物化。

此外，“加以”前若用單個“不”字否定的時候，為了調整音節，好念些，可說成“不加”，去掉“以”字，如“不加追究”。

以上說的都是“加以”的語法特點與一般動詞不一樣。但由於“加以”能作（必作）謂語中心詞，能帶（必帶）賓語，能受副詞修飾（如立即加以處理），這些都是一般動詞的最基本的特點，所以“加以”基本上是一個動詞。

“目的”和“为了”

王 年 一

現在人們寫文章，常常喜歡把“目的”和“為了”用在同一個單句里。請看下面例子：

- 1) 許多資產階級政客大談“反危機”措施還有一個目的，就是為了爭取人心和反對自己的政敵。（《紅旗》第1期23頁）
- 2) 這次整風運動的目的是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人民日報》1957年6月27日4版）
- 3) 去年秋天，我參加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的唯一目的，就是為了追求真理。（《人民日報》1957年3月15日2版）
- 4) 我們編印這個小叢書的目的是為了第一、給各地組織戲曲演員提供一部分教材的參考材料；第二、…（《戲曲演員學習小叢書》出版說明）
- 5) 我們要鞏固地團結全黨，目的正是為了鞏固地團結整個工人階級和全國人民群眾。（《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2版）

修辭學家的筆下，也有這樣的句子。下面這一句是呂叔湘先生文章里頭的：

- 6) “漢語拼音方案”的目的是為了推廣普通話，給漢字注音注的是普通話的音。（《中國語文》1958年3月號101頁）

這麼用好不好呢？我看不好。

“目的”和“為了”重複，句子成分因重複而搭配不當。如例1，“許多資產階級政客大談‘反危機’措施的目的”，明明就是“爭取人心和反對自己的政敵”，“為了”是多余的。

當然，有的句子也可以去掉“目的”，保留“為了”，如2、4、5、6各例。

（上接334頁）

上面說的當然不限于用後綴“子”構成的名詞。就在其它各種能產的構詞模式上也能看到同樣的現象。

§20 本文的任務並不包括描述聯義詞的一切類型。對於我們來說，重要的是指出聯義詞的存在，指出它們的數量是相當多的，並且還各有獨特之處。

嚴格地說來，每個聯義詞都應在辭典里單列出來，並且要說明它的一切聯繫。只有這樣才能提供對這個詞的全面了解，才能說明這個詞可以用在什麼樣的聯繫和意義中。

另一方面，把那些只同一兩個詞常用的大量聯義詞統統列舉出來，互相援引，又會使得這部辭典的篇幅

上面談了一點簡單的道理，下面我們再舉一些事實。

在單句裡頭，單用“目的”或單用“為了”的，多得很。我們各舉幾個例子。

單用“目的”的：

- 7) 日本帝國主義還在繼續侵略，它的目的是要滅亡中國。（《毛澤東選集》809頁）
- 8)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提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同上791頁）
- 9) 一切對於共產黨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戰失敗，以利投降。（同上805—806頁）

單用“為了”的：

- 10) …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毛澤東選集》789頁）
- 11) “毛澤東哲學研究會”的成立，是為了系統地研究毛澤東同志的哲學思想…（《人民日報》1958年6月4日7版）
- 12) 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綱領援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一些詞句，僅僅是為了披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便於欺騙別人。（《人民日報》1958年5月23日1版）

“目的”和“為了”用在同一個單句里，道理上有欠缺，事實上“目的”和“為了”可以去掉一個，所以這麼用是不好的。

此外，前舉4、6兩例還有其他毛病，如例6，應該在“漢語拼音方案”的前面加“制訂”或者“公布”；因為同這兒談的問題無關，就不多說了。

過大，弄得它不便于實用。

因此在我們這部辭典里，沒有把聯義詞單列出來，而是把它們放在相當的詞組中，詞與詞之間的關係則用雙箭頭（←→）表示。這裡雙箭頭就是說明該詞組的一個或兩個詞具有關聯意義。如果其中某個詞還另有自由意義，那末就另立一條，按字母順序排列下來。誠然，我們的辭典所採用的描寫聯義詞的順序，是不合詞典學傳統的，不過它能反映出漢語的特點，使辭典便于實際使用。這裡也可以看出現代詞典學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用特殊的標記來表示聯義詞。

我們選擇的例證，大都是為了強調構成這種詞組的詞都是單詞。（本章未完，黃振華譯）

溫嶺話入声变調同語法的关系

曹 广 衢

溫嶺是浙江东部的一个县城。现代溫嶺話屬於吳方言。

本文所謂入声,是指有¹-ʔ 收尾的音节來說的;所謂陽声,是指有¹-ŋ 收尾的音节來說的;所謂陰声,是指沒有¹-ʔ 也沒有¹-ŋ 收尾的音节來說的;所謂入声变陰声或入声变陽声,是指一个入声音节同时有陰声或陽声的讀法。①

溫嶺話入声变陰声或入声变陽声的語音变化同語法有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按性質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 用于称谓的

paʔ ⁵⁴	du ³³ paŋ ⁵³ ②	se ³³ paŋ ⁵³
伯	大伯	三伯
ʒoʔ ⁵⁴	du ³³ ʒuŋ ⁵³	ʒo ³¹ ʒuŋ ⁵³
叔	大叔	小叔

兒女乳名也屬於这一类:

ŋoʔ ²¹ 玉	ʒo ³¹ ŋuŋ ⁵³ 小玉
loʔ ²¹ 六	lo ³¹ loŋ ⁵³ 老六
tʂiʔ ⁵⁴ 七	lo ³¹ tʂiŋ ⁵³ 老七
ŋoʔ ²¹ 岳	ʒo ³¹ ŋoŋ ⁵³ 小岳
tʂaʔ ⁵⁴ 脚	p'iʔ ²¹ tʂaŋ ⁵³ [蹠]③脚

二 用于細小的

woʔ ²¹	du ³³ woʔ ²¹	ʒo ³¹ woŋ ⁵³
鏊	大鏊	小鏊
ʔuoʔ ²¹	du ³³ ʔuoʔ ²¹	ʒo ³¹ ʔuŋ ⁵³
屋	大屋	小屋
tʂoʔ ⁵⁴	du ³³ tʂoʔ ⁵⁴	ʒo ³¹ tʂuŋ ⁵³
桌	大桌	小桌
	ko ³³ tʂoʔ ⁵⁴	ʔa ³¹ tʂuŋ ⁵³
	高桌	矮桌
tʂoʔ ⁵⁴	mo ³¹ tʂoʔ ⁵⁴	gaŋ ³³ tʂuŋ ⁵³
竹	毛竹(大竹)	梗竹(小竹)

三 用于“量+量”(或“名+名”)的后一个量詞(或名詞)的

北方話里量詞和部分名詞可以重迭,重迭后,表示“每”的意思,例如:

張張(每張)	个个(每个)
家家(每家)	人人(每人)

溫嶺話表示“每”的意思的可以有“量+量”(或“名+名”)的形式。这时候,后一个有¹-ʔ 的量詞(或名詞)要变讀为陽声或陰声。例如:

tʂiʔ ⁵⁴ 只	tʂiʔ ⁵⁴ ko ³³ tʂiŋ ⁵³ 只加只(每只)
p'iʔ ⁵⁴ 匹	p'iʔ ⁵⁴ ko ³³ p'iŋ ⁵³
foʔ ⁵⁴ 幅	foʔ ⁵⁴ ko ³³ foŋ ⁵³
jeʔ ²¹ 頁	jeʔ ²¹ ko ³³ je ⁵³
waʔ ²¹ 划	waʔ ²¹ ko ³³ waŋ ⁵³
koʔ ⁵⁴ 角	koʔ ⁵⁴ ko ³³ koŋ ⁵³
kaʔ ⁵⁴ 格	kaʔ ⁵⁴ ko ³³ kaŋ ⁵³
ŋiʔ ²¹ 日	ŋiʔ ²¹ ko ³³ ŋiŋ ⁵³
ʔuoʔ ²¹ 屋	ʔuoʔ ²¹ ko ³³ ʔuŋ ⁵³

四 用于“数+数”的后一个数詞的

溫嶺話里的数詞也可以有“数+数”的形式,表示“每”的意思。这时候,后一个有¹-ʔ 的数詞也要变讀为陽声或陰声。例如:

paʔ ⁵⁴ 百	paʔ ⁵⁴ ko ³³ paŋ ⁵³ 百加百(每百)
ziʔ ²¹ 十	ziʔ ²¹ ko ³³ ziŋ ⁵³
pɛʔ ⁵⁴ 八	pɛʔ ⁵⁴ ko ³³ pɛ ⁵³
tʂiʔ ⁵⁴ 七	tʂiʔ ⁵⁴ ko ³³ tʂiŋ ⁵³
loʔ ²¹ 六	loʔ ²¹ ko ³³ loŋ ⁵³
ʔiʔ ²¹ 一	ʔiʔ ²¹ ko ³³ ʔiŋ ⁵³

五 用于由動詞变成的名詞的

zoʔ ²¹ 鑿	zəŋ ⁵³ 鑿子
ɕyeʔ ⁵⁴ 刷	ɕye ⁵³ 刷子
kɛʔ ⁵⁴ 夾	kɛ ⁵³ 夾子
p'aʔ ²¹ 拍	p'aŋ ⁵³ 拍子(如蒼蠅拍子)
bɛʔ ²¹ 拔	bɛ ⁵³ 拔子(如鞋拔子)
zeʔ ²¹ 閘	ze ⁵³ 閘(如長沙閘)
t'oʔ ⁵⁴ 托	t'oŋ ⁵³ 托子
loʔ ²¹ 絡	loŋ ⁵³ 絡子(如藍絡,酒絡)

① 本文只討論白話音,不涉及白話音和讀書音的差別,如“碟”白話音是 die⁵³,讀書音是 dia²¹。又溫嶺話內部的差異均以溫嶺城內話為準。

② a 音位有兩個變體,在¹-ʔ 前是 ɤ,在¹-ŋ 前是 a。本文統一寫作 a。

③ 有 [] 記號的是意譯,下同。

六 用于描写性的形容词的

ba ⁷²¹ 白	ɣe ⁷²¹ ba ⁵³ 雪白
lo ⁷²¹ 綠	pi ⁵⁴ lo ⁵³ 碧綠 ʔa ⁵³ lo ⁵³ [碧]綠
dzi ⁷²¹ 直	pi ⁵⁴ dzi ⁵³ 笔直
fiu ⁷²¹ 黑	ma ⁷²¹ fiu ⁵³ 墨黑
bo ⁷²¹ 薄	ɕa ⁵³ bo ⁵³ [斜]薄

七 用于季节的

ʔo ⁷²¹ 熟	də ²¹ zu ⁵³ 稻熟(稻熟的时候) fe ⁵³ zu ⁵³ zu ⁵³ 蕃薯熟(紅薯熟的时候)
ŋo ⁷²¹ 月	mə ⁵³ ŋo ⁵³ 忙月(农忙的时候) fiə ⁵³ ŋo ⁵³ 閑月(农閑的时候)
lo ⁷²¹ 六	lo ⁷²¹ ko ⁵³ lo ⁵³ 六月六(节气)

前面所列举的七类語法环境,都能使入声詞發生变化。現在再討論入声变陰声,入声变陽声的語音条件,以及入声变陰声或陽声时的主要元音和声調的变化。

- 1) i⁷ → i⁵³, 例如:
笔 pi⁵⁴ → pi⁵³; 疊 di⁷²¹ → di⁵³
- 2) uo⁷ → u⁵³, 例如:
窟 k'uo⁵⁴ → k'u⁵³; 国 kuo⁵⁴ → ku⁵³
- 3) a⁷ → a⁵³, 例如:

册 ts'a⁵⁴ → ts'a⁵³; 脚 tɕa⁵⁴ → tɕa⁵³

4) o⁷ → ə⁵³, 例如:

壳 k'o⁵⁴ → k'ə⁵³; 撮 ts'o⁵⁴ → ts'ə⁵³

但在舌面前音 tɕ, dɕ, ɲ, ʃ, ʒ 等后面, o⁷ → u⁵³, 例如:

粥 tɕo⁵⁴ → tɕu⁵³; 軸 dɕo⁷²¹ → dɕu⁵³

肉 ŋo⁷²¹ → ŋu⁵³; 束 ʃo⁵⁴ → ʃu⁵³

熟 ʒo⁷²¹ → ʒu⁵³

5) u⁷ → u⁵³, 例如:

粒 nu⁷²¹ → nu⁵³

6) e⁷ → e, 例如:

頁 je⁷²¹ → je⁵³

7) ɛ⁷ → ɛ, 例如:

[处] tɛ⁵⁴ → tɛ⁵³; [次] vɛ⁷²¹ → vɛ⁵³

8) ə⁷ → ə, 例如:

[罈] tə⁵⁴ → tə⁵³; 月 ŋə⁷²¹ → ŋə⁵³

由此可見,入声变陰声和陽声的語音条件是由于主要元音的不同:入声的主要元音是 i, o, a, u, uo 的变陽声,主要元音是 e, ɛ, ə 的变陰声。

此外,声調的变化規律是:

1) 54 → 53, 例如:

正 p'i⁵⁴ → p'i⁵³; [次] pɛ⁷²¹ → pɛ⁵³

2) 21 → 53, 例如:

[抱] ge⁷²¹ → ge⁵³; [陌] ma⁷²¹ → ma⁵³

(上接 321 頁)

另一方面,必須密切結合跟語言課相輔为用的“文选及習作”課,这样可以把所存在的問題納入練習实践課,使學生易于感受,帮助較大。按中文系原有“文选及習作”,自 1956 年起停开以后,學生即缺乏語言实践的有力条件,教师也無从具体了解學生运用語言的情况,这次整改期間,師生一致認為必須恢复这一課程。

(四)关于联系中学实际方面,即將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以附屬中学为实验基地,同时跟其他中学訂立协作联系合同;加强对畢業生的联系,以了解學生的語文教学質量,借以改进教学。

2) 根据上述联系,有計劃地开好定期座談会,及时总结或交流經驗。交換語文教学工作情报。

3) 在以科学研究結合教学的原則下,每学期写出

有关中学語文教学研究的論文,用以丰富語言教学。

4) 开展对工农業余中学的調查研究工作,以扩大語文普及工作的視野,开辟与工农群众相結合的途徑。

最后,除在“現代漢語”里加强文字改革三大任务的講授外,并积极爭取課內外結合,師生一致广泛开展实践推广工作。

此外,沈陽師院中文系語言教研室对有关方面有如下呼吁:一是希望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注意高等院校的語言教育研究工作;一是希望教育部考虑召集修訂全国師院适用的“現代漢語教学大綱”;一是希望負責編写高等院校适用的“現代漢語教科書”的部門和語文工作者,能在整改和語言科学大躍進的基础上尽快完成編写工作。(关兴三)

洛陽方言中的一些語法現象

趙月朋

一 詞語的重疊

在漢語里，詞語的重疊有一定的規律，並且一個詞能否重疊和按照什麼形式重疊，成為鑒別詞性的標準之一。

洛陽方言的詞語重疊，有其特殊形式和功能。在普通話里，有一部分動詞和形容詞可以重疊：雙音動詞的重疊，如“計劃”的重疊式是“計劃計劃”；雙音形容詞的重疊，如“樸實”的重疊式是“樸樸實實”。洛陽話也是這樣。但是，洛陽話另有一些重迭詞，在普通話里是很少這種格式的：

(一)多音詞部分音節重疊，加強詞義或表示“非常”“十分”“極”的意思。例如：

他這些時吃過來了，臉都是疙疙瘩瘩的。
我準備好了，什麼都現現成的。
圓圓圓兒一個饅頭，他一下子吞進去了。
這個人四方方臉，大鼻子。
張三很講衛生，屋子裡不管哪兒都是干淨淨兒哩！
這雙鞋牢實實的，很經穿。
你籃子裡放的什麼？骨堆堆的！

“現成”還可以重迭為“現成成”。

普通話里也有“暖呼呼”“慢吞吞”等相當的形式，然而只是有限的幾個詞，沒有洛陽話裡那麼多。

上面談的是動詞或形容詞。下邊是一些副詞性的詞的重疊：

你這麼麼大了，還管不住自己？
我看見一個皮球，多麼麼大！

“這麼”讀做 zhenmen，重疊後是 zhenmenmen；
“多麼”讀做 duomen，重疊後是 duomenmen。這是一種特殊情況，“這樣”“如此”等，不能照樣重疊為“這樣樣”“如此此”。

(二)有一些多音節的合成詞，第一個詞素是用來描寫第二個詞素的性質和狀態的（如“雪白”等），這一類詞的重疊式，洛陽話和普通話不完全相同。例如：

雪白	{ 1) 雪白雪白 2) 雪白白	絢紅	{ 1) 絢紅絢紅 2) 絢紅紅
嶄新	{ 1) 嶄新嶄新 2) 嶄新新	噴香	{ 1) 噴香噴香 2) 噴香香
翻熱	{ 1) 翻熱翻熱 2) 翻熱熱	漆黑	{ 1) 漆黑漆黑 2) 漆黑黑

上例中，1)式是整個詞的重疊，即 ABAB，這是洛陽話

和普通話所共有的；2)式是個別音節的重疊，即 ABB，這是洛陽話常有的形式，在普通話里，只有個別的詞如“漆黑黑”是這樣重疊的。

在洛陽話里，常見的還有“百苦”“百辣”“ba 涼”“pia 白”“gang 甜”“gang 碱”“kang 稠”（指液體）“si 爛”“zing 近”等，這些詞的第一個詞素“百”“ba”“gang”“kang”“xi”“zing”都是表示“極”“非常”的意思；並且，也都有 ABAB 和 ABB 兩種重疊形式。特別是“zing x”的形式，在洛陽話里使用的非常廣泛，如“細”“低”“松”“濕”“窄”“短”“淺”“稀”等，前邊都可加上表示程度的 zing，並按照上述兩種方式重疊。這類詞的第二種重疊方式，和“綠油油”“笑嘻嘻”在實質上並不相同。比如“雪白白”可以還原成“雪白”，但“綠油油”却不能說成“綠油”，“笑嘻嘻”不能說成“笑嘻嘻”。這就是說，“雪白白”是“雪白”這個合成詞的重疊式，“綠油油”“笑嘻嘻”是由音節“綠”“笑”和“油油”“嘻嘻”構成的單純詞。後者，在普通話里並不少見。

(三)單音詞的重疊，洛陽話和普通話規律相同，但在洛陽話里，有比較特殊的情況，舉例如下：

1)這孩子，嬌慣的不像像樣兒。

這是極個別的現象，並且只是在否定式中才有，在肯定的句式中，如“這孩子真像樣兒”不能說成“這孩子真像像樣兒”。至於“不像話”“像話”中的“像”，都不能重疊。

2)昨天還有一包花生，今天可沒一siasia了。

“sia”是“點兒”的意思，平常只說“沒一sia”，要強調語氣，就說成“沒一siasia”。

3)這本書，叫他給弄丟丟了。

4)饅頭讓他給吃了吃。

5)衣服叫他給弄髒髒了。

“吃了吃”“丟了丟”“髒了髒”用在被動詞“叫”“讓”之後，表示遺憾、不滿的情緒，和一般動詞、形容詞重疊的性質、作用不同。而這種形式的重疊，在洛陽話里是極為普遍的。

6)他母親的眼睛，瞎瞎兒瞎瞎啦！

7)他病了幾天，吃了一付藥可好好兒好了。

8)我怎麼做，他也怎麼做，真是學學兒學學着我。

9)你坐坐兒坐着，連一點兒忙也不幫。

10)這條狗躺在雪地里，死死兒死死了。

上例是動詞重疊、兒化後，做同一動詞的狀態（“好”在例7中不是形容詞），表示程度。“瞎瞎兒瞎”

了”是說明眼睛已經瞎得達到完全看不見的程度；“好好兒好了”是說明病已完全好了；“學學兒學着”是說學得認真，一絲不苟；“坐坐兒坐着”是形容坐得那麼悠閑自得，不管身外事；“死死兒死了”是表明連一點兒氣兒都沒有了，想挽救也沒辦法。這種用法在洛陽話中使用得非常普遍。下邊再舉出一些較常見的例詞：

千千兒干了	叮叮兒叮着
活活兒活着	坏坏兒坏了
挤挤兒挤住	挨挨兒挨住
躺躺兒躺着	压压兒压着
守守兒守着	跟跟兒跟着
对对兒对着	錯錯兒錯了
比比兒比着	挡挡兒挡住
滿滿兒滿了	保保兒保住

二 “冒”和“咋”

“冒”和“咋”是洛陽話中常用的兩個虛詞，前者用在句中動詞之前，後者用法較多。

“冒”可能是“沒有”的合音，但在意義和作用上，兩者毫不相同。比如：

- 1)你冒去看看，到底情況怎樣？
- 2)你冒吃吃，看以後聽話不聽！
- 3)你冒去試試！

例1)有商榷和希望的意思，“冒”有“是不是”的意思，“冒”省略之後，商榷的意思就沒有了，剩下的只是希望、命令的語氣。例2)的意思是：“勸你你不聽，非要那樣做不可，現在事情做壞了，可叫你嚐嚐(吃吃)這苦頭吧！看以後聽話不聽了！”如果要省略“冒”字，一定要添字，如“叫你吃吃！”例3)是一個單句，可以有兩種語氣、兩種意思；重讀是警告，意思是：“我不准你去，如果你要去的話，就要叫你看看我的厲害！”輕讀是商榷、希望的語氣，意思是：“你可以去試一試！”因此，如果是警告、申斥的語氣，無論是單句或是複句，“冒”字都不能省略。如果是希望、命令的語氣，無論是單句或是複句，“冒”字都可以省略；但在洛陽話中，由於習慣的關係，一般的都不省略。

在我們說話時，商榷、命令、希望、警告和申斥的語氣是很多的，並且，幾乎所有的動詞前邊都可以用上“冒”字，所以，這個詞在洛陽方言中显得很突出。

“咋”可能是“怎麼”的合音，讀za。但是，洛陽話現在並不完全做實詞用，當它做實詞用時，還是“怎麼”的意思，如“你咋啦？”。比較特殊的是它還可以做句末的語氣詞用，我想，“咋”的這種用法，大概是經過語音變化(合音)、語義引申到詞性轉變的一段過程的。例如：

- 1)你去天津哩咋？

在這一句話里，“咋”可以用普通話的“么(嗎)”來代替，根據洛陽人說這句話的含義，應該是：“你是去天津呢，還是怎麼的？”從這裡可以看到“怎麼”很可能由疑問的意思和合音的變化，以及句式的凝縮而變為純粹的語

氣詞“咋”。不過，“咋”表疑問時不能單用，前邊一定得有“哩”“啦”“啊”等音節輔助。

“咋”可以和“啊”結合成為表示問答的多音象聲詞。例如：

- 2)你快走吧！啊咋？

這句話的意思是：“你快走吧，啊？沒有聽見還是怎麼的？”因此，“啊咋”可以用“啊么”來代替，這裡的“么”常常讀做man。但是，“啊咋”和“啊么”並不完全相同，如果“啊咋”前邊的句子是命令式(如例2)，兩者可以互相替代；如果“啊咋”前邊的句子是疑問式，就不能用“啊么”來代替“啊咋”了。例如：

- 3)你明天不能來？啊咋？

“咋”用在句末，也可以表示命令語氣，這樣用的時候，它不能用“么”來代替，但如“咋”前邊的音節聲母是雙唇音b、p、m的時候，可以用“哇”“嘛”來代替。例如：

- 4)你快一些走咋！

洛陽話在表示疑問時，語氣詞用“咋”；大部分命令式的句子，語氣詞也用“咋”。

第三批推行簡化字表(70字)

(1958年5月10日)

盘	〔盤〕	卤	〔鹵〕	烛	〔燭〕
梦	〔夢〕	滤	〔濾〕	壮	〔壯〕
坟	〔墳〕	沟	〔溝〕	装	〔裝〕
麸	〔麸〕	构	〔構〕	妆	〔妝〕
带	〔帶〕	壶	〔壺〕	状	〔狀〕
摊	〔攤〕	沪	〔滬〕	疮	〔瘡〕
滩	〔灘〕	秽	〔穢〕	渗	〔滲〕
瘫	〔癱〕	夹	〔夾〕	枣	〔棗〕
誊	〔謄〕	胶	〔膠〕	丛	〔叢〕
恼	〔惱〕	将	〔將〕	畜	〔畜〕
脑	〔腦〕	奖	〔獎〕	伞	〔傘〕
腊	〔臘〕	浆	〔漿〕	恶	〔惡〕
兰	〔蘭〕	浆	〔漿〕	袄	〔襖〕
拦	〔攔〕	酱	〔醬〕	盐	〔鹽〕
栏	〔欄〕	牵	〔牽〕	洼	〔窪〕
烂	〔爛〕	寝	〔寢〕	屿	〔嶼〕
猎	〔獵〕	蓄	〔蓄〕	凿	〔鑿〕
浏	〔瀏〕	墙	〔牆〕	业	〔業〕
怜	〔憐〕	虾	〔蝦〕	阴	〔陰〕
邻	〔鄰〕	泻	〔瀉〕	阳	〔陽〕
两	〔兩〕	逊	〔遜〕	无	〔無〕
俩	〔倆〕	滞	〔滯〕	跃	〔躍〕
岭	〔嶺〕	斋	〔齋〕		
虏	〔虜〕	毡	〔氈〕		

语文短评

476 过去年代里,洪水把千万亩良田变成了一毛不拔的沙灘…老紅軍首当其冲的帶头向全班全隊挑起竞赛。(解放軍文艺 1958年3月号30頁)

“一毛不拔”这个成語是比喻吝嗇的,这里用錯了,可以改成“不毛”。“首当其冲”这个成語多用在被动的意义方面,这里不宜用,可改成“一馬当先”。(付嘉)

477 “电灯不要油怎么能亮呢?”老人家坚持着故意問道。(新观察 1958年6期17頁)

“故意坚持着問”,意思不难懂;“坚持着故意問”,不大近情理。(牛文炳)

478 这就是要求每一个下放干部通过劳动鍛煉能增强劳动观点,提高和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場。(展望 1958年9期16頁)

“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場”不能“提高”,只能“改造”,而“改造…阶级立場”的說法也不妥;所以这句的改法是删去“提高和”三字,把“改造”改为“改变”。(傅冉桥)

479 人們都知道,牢固的記憶是建立在透徹的理解上的,要記得牢,首先就要理解得透,这就是背誦能起帮助学生深入領会課文的作用的道理。(語文教学 1958年1月号25頁)

“要記得牢,首先就要理解得透”怎么会是“背誦能起帮助学生深入領会課文的作用”的“道理”呢?这句话的因果关系照字面看来就成了“因为要先理解得透才能記得牢,所以背誦就能帮助深入理解”,結論跟前提恰好完全相反。讀者要問:究竟應該先理解呢,还是先背誦?照下文看来,作者是主張“理解”和“背誦”互为因果的,但是这个句子不但沒有說明这一層意思,反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范繼淹)

480 他原是个神經衰弱者,已經足有一年以上离开安眠藥就不能入睡了,我也曾劝他去从事一时期的体力劳动,可惜沒有条件。(人民日报 1958年1月29日8版)

帶上“足”字的数字应是一个实在的数目,这里“一年以上”是个概数,“足”字不能用。“一年以上”不如改成“一年多”。“可惜沒有条件”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說得很含混。(邢谷桐)

481 这些影片的題材范围扩大了,有描写工人生活的“幸福”,农民生活的“洞簫横吹”,部队生活的“牧童投軍”、“海魂”,知識分子的“情長誼深”,兒童生活的“阿福寻宝記”,妇女生活的“鳳凰之歌”,体育片“女篮五号”,反特片“羊城暗哨”,革命历史的“椰林曲”……(文匯报 1958年2月4日2版)

“描写”这个动詞一直管到最后的“革命历史的‘椰林曲’”,但中間插进了“体育片”和“反特片”,“描写××片”是說不通的。改法是:把“体育片‘女篮五号’,反特片‘羊城暗哨’”抽出,放在文末,“体育片”前边冠以“还有”。(柯英)

482 徐匯区滬光中学事务員崔茂德为了节约大扫除用水,和一位工友用一天功夫挖了一口井,同时写了80張大字报。(文匯报 1958年2月27日2版)。

按作者的意圖,應該說成:“…为了大扫除时节约自来水的~~使用~~,和一位工友用一天功夫挖了一口井,还写了80張大字报。”(高貴明)

483 近几世紀以来,經過不断的考古發掘和偶然發現,古代人类的文字材料已有大量出土。(中国語文 1958年3月号96頁)

“偶然發現”不一定是“出土”来的,把它和“考古發掘”并提,后边接上“已有大量出土”,不妥当。“已有大量出土”可改为“已越来越丰富”。(刘凱鳴)

484 从“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泪滿衣裳”看来,我們便可以理解到“劍外”是当时杜甫流亡所在地,“薊北”是当时敌人占領的淪陷区。(中学教育 1958年2月号21頁)

文中两个“当时”應該都是指杜甫在劍外听到收复了薊北消息的时候說的。前面一个“当时”用得对;后边一个“当时”就不恰当。因为薊北既然已經收复,就不能說薊北还是“当时敌人占領的淪陷区”。可把这个“当时”改为“曾經”。(楊直夫)

485 揪出了右派和右派集团,对他們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行了坚决回击,并在运动中查出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中学教育 1958年3月号3頁)

这里“进行…回击”的对象当然是“他們”,而不是“党”和“社会主义”;可是在“党”和“社会主义”前面也用上“对”,这就使

“党”“社会主义”和“他们”平列，字面上很不妥。可把后面两个“对”字改为“向”。（白群）

486 另外，还可以看出，通过大字报不仅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式，而且也是打击“地、富、反、坏”分子的有效武器。（时事手册 1958年第9期20页）

1) “通过大字报”是一种“好方式”，还说过去，“通过大字报”是一种“有力武器”就不好说了。其实“通过”在这句话里是多余的。2) “地、富、反、坏”分子，这样的简称也不合乎约定俗成的原则。（而中）

487 而且必然会对科学文教事业的提高和繁荣，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壮大，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将起到极为深远的影响。（光明日报 1958年4月1日社论）

作为个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早就存在，说不上“形成”不形成，更无所谓“壮大”。看来这里是指“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和壮大”说的。（刘凯鸣）

488 发球权三度易手。每一次易手使得每一个观众暂时甩掉了“喜、怒、哀、乐”，只愿激动地巴掌与喊好迸发。（北京晚报 1958年4月8日第4版）

1) “迸发”是形容某种客观现象的突然来临，“巴掌”和“喊好”不能“迸发”，除非改成“巴掌声与喊好声迸发”；但是，前面用了“只愿激动地”，显然是指观众主观的动作，因此“迸发”二字不能用。2) 既然每一个观众都“甩掉了喜、怒、哀、乐”，怎么还会“只愿激动地巴掌与喊好迸发”呢？全句试改为：“发球权三度易手。每一次易手都使得观众们的心情紧张得忘了周围的一切，只愿激动地鼓掌和喊好。”（范继淹）

489 据了解，南京图书馆被读者损坏和偷窃走了的图书、杂志很严重，…还有一种品质更恶劣的人，把三本“国际展望”偷偷割去三十六面。（新华日报 1958年4月11日第3版）

以“严重”来形容图书杂志是讲不通的；也不会有许多人都来把“三本‘国际展望’”“偷偷割去三十六面”，所以这里不宜用“一种人”。而且“偷偷割去”的行为即可包含在前面所说的“损坏和偷窃”之中。试改为：“据了解，南京图书馆的图书、杂志被损坏和偷窃的情况很严重，…还有人把三本‘国际展望’偷偷割去三十六面。”（朱泳燊）

490 在这全面躍进的形势下，有许多事情是史无前例的，不仅对于广大群众而且对于领导干部也是经验不足的，因此必须紧紧地依靠群众…（人民日报 1958年4月27日第1版）

“对于”没有着落。不是“许多事情”对于广大群众和干部而是广大群众和干部对于许多事情经验不足。可以改为：“…不仅广大群众而且领导干部对于这些事情都是经验不足的…”（胡新）

491 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法律工作者代表团、中国歌舞团和中国五金进出口公司和中国矿产公司代表团，今天乘船启程回国。（新华日报 1958年5月20日第1版）

这条新闻的标题是：我访日三个代表团/乘船回国。第二个“和”字是连接两个并列成分作定语的，而第一个“和”字是连接三个并列成分作主语的。用在一起，结构上容易混淆。根据汉语的习惯，象这样的多种并列结构，它们之间，一般是不用连词而是用语音停顿。因此，在这个句子里，不妨把第一个“和”字改为顿号，这样，两种并列结构就明显了。（杨静仁）

492 由于这个社依靠集体力量，增加了收入，扩大了积累，就有了解决生产需要和社员生活困难的力量。（红旗 1958年6月1日第一期7页）

“由于”放在句首，使得这句话没有句主了。应该把“由于”放在“这个社”的后边。（葛信益）

493 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观看三种新产品。（光明日报 1958年6月21日第1版标题）

“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容易使人误解为毛主席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最好改为：“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如果要保留原来的文字，则把“国家”挪到“其他”前面来。（张翊娟）

494 没有这种声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凭借，语言就不可能“赤裸裸的”存在。（史存直《语音》，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7年，4页）

这句话中“赤裸裸的”一词虽然有引号，但是用得很不妥当。如把这句话反过来说，那就是：有这种声音作为语言的物质凭借，语言就可能“赤裸裸的”存在。这当然不符合语言的理论，也不是作者原意。语言是不可能“赤裸裸的”存在的。删去“赤裸裸的”一词，句子的意思就清楚了。（蒋景）

495 在他家里，前来娱乐他那贵族的悠闲时光和分享他那喧闹的、有时是狂暴的作乐的宾客们，总是济济一堂。（《杜布罗夫斯基》，刘辽逸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页）

这句话有几个毛病：1) “娱乐”是个自动词，不能带宾语“时光”；2) “分享作乐”，谓语和宾语搭配不上；3) “宾客们”的定语太长，读起来很吃力。试改如下：“在他家里，宾客们总是济济一堂，前来消磨他那贵族的悠闲时光，分享他那喧闹的、有时是狂暴的作乐的愉快。”（王年一）

漫談“語文短評”中的幾個問題

凱 鳴

全國幾個語文刊物先後开辟了“語文短評”性質的專欄以來，對於語法修辭上的混亂現象進行了有力而及時的批評，推動了現代漢語規範化。這一工作的積極作用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在評論中也存在一些問題，我以為有必要提出來說說，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從而更好地進行這一工作。

首先是对某些語言現象以正為誤。如《中國語文》“語文短評”第421條中說：“‘輿論’不能‘歡呼’”。其實翻開報紙，常見到“××輿論要求……”、“××輿論譴責……”之類。再如《語文知識》1958年3月號“不規範的詞和句子”第13條的“改正”說：“‘對付’是動詞，沒有‘對對付付’這個重迭格式”。這個重迭格式其實是有的，而且不是新興的，《漢語詞典》的前身《國語詞典》在1937年就收了它，並註明是“差可或將就之意”。我們口語中不是也常說“對對付付”嗎？怎麼說“沒有”呢？

第二是肯定一般，排斥特殊。如“興頭”作動詞用，確是特殊現象，但是在《紅樓夢》中的用例並不算少。且舉幾個例子：“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671頁）“你少興頭些！外頭有人，比不得往常。”（584頁）但是《語文知識》（56年6月號）“不規範化的詞和句子”欄卻批評了“張三毛王明還有別的工人一聽，都興頭起來”這個句子。《語文學習》1957年9月號《講名詞、動詞、形容詞的語法特點有什麼用處》一文，又一次批評“興頭”是名詞誤用做動詞。這有點兒冤枉。早在1948年呂叔湘先生就在《把字用法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興頭”是動詞了。呂先生說：“第一類句子的動詞本來是不及物的（大多數是表示心理活動

的），在這裡給他一種‘致動’（causative）的意義，就變成及物了。”（《漢語語法論文集》，科學出版社，1955，139頁。）“當（着）”單用，對於“當（着）……的時候”來說是特殊的，不過用例也不少，如：“當着黨內發生機會主義思想，存在原則上的分歧，那我們必須進行反對各種錯誤原則與機會主義的鬥爭，來加以克服；……”（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當你在積雪初融的高原上走過，看見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這麼一株或一排楊樹，難道你就只覺得它只是樹？”（茅盾：《白楊禮贊》）但是《語文知識》1957年12月號“不規範的詞和句子”第17條卻批評“當黨委書記有力的回答了右派分子提出的問題，……”的“問題”後邊沒有添上“的時候”來和“當”呼應。在這類問題上肯定一般排斥特殊是不妥當的，正確的做法，應該象《漢語》課本說的“掌握一般，留心特殊”。

第三，由於讀書不多，見聞不廣，誤以有所本的用法為不規範。1956年2月我在《語文知識》（2月號）“不規範化的詞和句子”欄批評了《光明日報》“文學遺產”中“毛髮悚然”的說法：“我們只說‘毛骨悚然’，不說‘毛髮悚然’。”（署名K. M.）後來重讀《紅樓夢》，才發現曹雪芹曾不止一次的使用“毛髮悚然”（也有的地方用“毛骨悚然”）。可見我的“改正”只是坐井觀天、吹毛求疵而已。我想類似的事恐怕不會只此一端吧？

以上問題的產生，不但是作者自己的問題，而且也是語文刊物編輯同志的問題。因此，加強學習不只是從事語文短評的人的事，也是編輯同志的事。我提出這些問題來，就是為了同大家共勉，繼續作好語文短評工作。

（上接 337 頁）

和漢字排在一起，我們乍一看也是不調和的，可是看慣了並沒有不舒服的感覺，日文近代借用的外來語還故意寫得和本族的文字有區別：如果本族語用草書印，外來語反倒要印成楷書，本族語用楷書印，外來語反倒要印成草書。這樣做就是要告訴讀者哪個詞是外來語，日本人並沒有因為外來語多而心裡不舒服，也沒有自卑感。我覺得少數民族讀到借詞而心裡不舒服的不是農民而是一部分比較狹隘的知識分子。

另外，有人說漢語借詞按漢語拼音方案拼寫，不標聲調，怎麼讀得正確呢？少數民族語言借用近代漢詞差不多都是復音詞，復音詞不標聲調發生誤解的情形不多，如果有發生誤解的情形，將來在漢語拼音文字中也要加以區別，反正少數民族文字中的漢語借詞跟着漢

語拼音方案走，它標聲調，我們也標，總之是為了字形一致。若說不標聲調就讀不正確，我想讀不正確的首先是漢族，而不是少數民族。文字是要通過學習才能掌握的，教書的人在上課以前要先知道怎樣讀，學的人按着先生所教的讀，不是就正確了嗎？漢字上都沒有調號，怎麼也能讀得正確呢？原因是按照先生教的聲調讀的，記漢字的聲調和記不標調號的漢語借詞的聲調來比，只有更難一些。總而言之，文字不通過學習是不能憑空就會的，強調漢語借詞不標聲調就不能正確讀音的人，實在就是沒有正確認識拼音文字也必須通過學習才能掌握的道理。

綜上所述，我認為少數民族文字中漢語借詞應當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反對用漢語拼音方案拼寫借詞的理由是不充分的。

书刊评论

評《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

(高名凱、劉正琰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2月)

邵榮芬

本書共分六章，大体上，二、三、四章以提供材料為主，一、五、六章以闡述理論為主。

就材料而言，全書共收集了1500余个外來詞。這些詞的絕大部分都分別確定了是從某種外國語來的，并和原文一一對照列出。這是一個新的大膽的嘗試。過去一些詞書中，碰到對注外來詞時多半都只是拿英文來塞責，結果使人造成了一些不正確的印象，倒不如不注的好。本書這樣做，從積極方面說，它肯定了一些詞源；從消極方面說，它提供了討論的基礎。這不能不承認是本書的一個優點。

在理論方面，本書首先闡明了對外來詞的正確理解：它的範圍和性質。其次闡述了外來詞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的重大意義。更其次討論了漢語吸收外來詞的各種方式。最後歸結到外來詞的規範化問題。闡述中一般地表現了實事求是的精神。雖然沒有多少獨創的見解，但能就前人陳說，加以發揮，使問題更清楚，更透澈，這也是本書的一個優點。

但是漢語外來詞的研究很薄弱，零零星星的探討都不多，更不用說大規模的研究了。本書在這樣一個基礎上進行工作，缺點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大体說來，有下列幾點：

第一，語原考証上有欠妥當的地方。例如“木乃伊”一詞，認為是來自英語的mummy(60頁)，就很不可靠。“木乃伊”一詞元朝時就已見於載籍，陶宗儀《輟耕錄》卷三：“回回田地有年七十八歲老人，自願舍身濟眾者，絕不飲食，惟澡身啖蜜。經月，便溺皆蜜。既死，國人殮以石棺，仍滿用蜜浸，鑄志歲月於棺蓋。瘞之。俟百年後啟封，則蜜劑也。凡人損折肢體，食少許立愈。雖彼中亦不多得。俗曰蜜人，番言木乃伊。”當時還未和英國人往來，當然不會從英語借入此詞，而且字音也和英語不相當。又如“婆羅門”一詞認為是來自英語的Brahman(68頁)，也不恰當。佛經里早就有“婆羅門”這一譯名，近代人縱然在譯英語Brahman時也用“婆羅門”，這只是沿用舊譯，並不足以證明漢語“婆羅門”是從英語Brahman來的。又如“咖啡”認為來自法語café(73頁)，也很可疑。這個譯名最早的形式

是“加非”，見於英人馬禮遜所著《外國史略》(小方壺齋輿地叢抄再補編本，6頁)，其後流行甚廣，例如見於張德明《航海述奇》(第一冊，10頁，1867)，黎庶昌《拙尊園叢稿》(5卷，10頁，1876)等書。“咖啡”最早見於1879年點石齋印《五車韻府》，以後流行漸廣，例如見於1903—5年的《文明小史》(綉像新小說本，91頁)，1919年的《新青年》(3卷5期，537頁)等書刊。“咖啡”大概是由“加非”在流行中加上口旁而成。但不論“加非”或“咖啡”都是由英語借進來的，找不出由法語借入的跡象。

詞源考証上錯誤最多的要算是日語外來詞了。本書第三章第五節第一項(82頁)所謂由現代漢語吸收過來的純粹日語詞，也就是說日語土生土長的詞中，事實上有很多都是漢語本來就有的，例如：

“服從”——《漢書·韋玄成傳》：百蠻服從。

“希望”——《韓愈復上宰相書》：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于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

“記錄”——《後漢書·班彪傳》：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命令”——王周詩：有如宣命令。

這些詞的意義都和現代漢語中它們的意義相同。當然不能說它們是外來詞，相反地，倒可以說它們是日語從漢語中借去的外來詞。

第五節第三項(83頁)所謂“先由日本人以漢字的配合去意譯歐美語言的詞，再由漢族人民搬進現代漢語里面來，加以改造而成的現代漢語外來詞”，其中也和上面一樣，有很多都是漢語本來就有的，並且意義至今基本上沒有什麼改變。例如：

“破產”——《新唐書·盧坦傳》：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之。(與今法律上的“破產”義稍不同，與一般的所謂“破產”義同。)

“解放”——《朱子語類》：馬亦解放。

“假設”——《漢書·賈誼傳》：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交易”——《易·系辭》：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

“民主”——王芝《海客日譚》，4卷，2頁(1872年版)：民主之國(按指法國)。

“作用”——《天工開物》，中冊，25頁：京爐用牛蹄甲，未詳何作用。又《三俠五義》，19回：只見紅焰焰的一盆炭火，內里燒着一物，却不知是何作用。

“算術”——《漢書·律曆志》上：其法在算術。

“絕對”——《金剛經》：金剛信心絕對不二之機也。

“試驗”——刘迎詩：中云萊菔根，試驗頗为大。

“宿舍”——《史記，張儀傳》：使人微隨張儀，与同宿舍。

“新聞”——《安得長者言》：吳俗坐定，輒問新聞。

“材料”——《宋史，職官志》三：曰營造，曰材料。

其中“民主”、“絕對”是漢語對譯外語詞或描寫新鮮事物所創造出來的詞，但時間都很早，當然不會受到日語的影響。

另外，這一項下還有很多也是漢語本來就有的詞，只是意義有所改變，應該屬於本節第二項“日本人用古代漢語原有的詞去‘意譯’歐美語言的詞，再由漢族人民根據這些日語的外來詞改造而成的現代漢語的外來詞”(83頁)之下。例如：

“軍事”——《史記，律書》：會高祖厭苦軍事。

“法則”——《史記，三王世家》：皇子或在襁褓，而立為諸侯王，奉承天子，為萬世法則不可易。

“關係”——《李文忠公全書》，20卷，復丁稚璜宮保：此身關係至重，衰年病後，以培補元氣為要。

“刑法”——《左傳，昭二十六年》：冒瀆鬼神，慢弄刑法。

“交流”——《新唐書，天文志》：星隕如雨，或如杯棬者，交流如織。

“供給”——《左傳，僖公四年》：貢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給。

“鐵道”——張德明《航海述奇》，1867，申報館本，3卷，21頁：其水法亦從鐵道通來者。

“消化”——《周書，蘇綽傳》：邪偽之性，嗜慾之心，潛以消化。

“相對”——《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凡言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

很清楚，這些詞當然不是出於日本人的首先配合，他們只是拿現成的漢語的略變其意義去翻譯外語詞罷了。

第二，沒能充分參考別人的研究成果。這表現得最顯著的也是在詞源的確定上。例如，烈維(Sylvain Lévi)在他的《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國語考》(馮承鈞譯，女師大學季刊第1卷第4期)一文里認為“沙門”是龜茲語 samane 的譯音，“沙彌”是龜茲語 sanmir 的譯音。季羨林先生在他的《孚屠與佛》(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一文里認為“佛”是龜茲語 pūd, pud 或 pāt 的譯音。羅常培先生在他的《語言與文化》(28頁)一書里認為“淡巴菰”是波斯語 tobacco 的譯音。這些人的論證雖然不能說都絕對可靠，但起碼從對音上看，是相當近情理的。本書認為“沙門”是來自梵文的 sramana，“沙彌”是來自梵文的 śrāmanera (26頁)，“佛”是來自梵文的 Buddha (12頁)，“淡巴菰”是來自英語的 tobacco (64頁)，只是因仍一般辭書的陳說，沒有吸收以上諸家的考證，這是一種不應有的疏忽。

第三，在說明漢語外來詞和英語原文對音情況的

時候，未能貫徹排斥方言的原則。本書從標準音的角度，分析英漢對音，這本來是無可非議的。可惜未能貫徹這個原則，有時卻拿方言里的外來詞當作了分析的對象，這樣所得對音的條例就不盡符合實際了。例如拿“先令”(英語 shilling)為例，說明英語的元音 i，漢語可以拿復元音 ie 去對譯。事實上，從很多方言(例如江浙一帶)把“先”讀成 si 或 pi 的情況看，“先令”多半是通過這些方言進入普通話的。普通話只是吸收了方言的“先令”，却並無拿“先”去對“shil-”音的事實。因此所得的漢語 ie 可以對譯英語 i 的條例就不大能夠成立了。另外像以“鴉片”(英語 opium)，“杯葛”(英語 boycott)等詞為分析對象，都有同樣的毛病。

第四，在說明規範化問題時，忽略了歷史的因素。這主要表現在：提出一些在歷史的進程中語言本身已經確定了自己的規範的例子，來當作現代漢語仍然存在正待解決的規範問題，進行討論。例如，172頁至174頁中所列舉的有如下的例子：

mètre	米；迈当 米突 密达(以上三个不流行)
telephone	德律風；独律風(以上不流行，为“电话”所代替)
brandy	白蘭地；勃蘭地(不流行)
chocolate	巧克力 巧格力；巧古力 朱古力 查古律 查古列 諸古力(以上五个不流行或只在方言里流行)

這樣不免夸大語言中的混亂，使人有無的放矢之感。

至於一些個別的細微錯誤，如把“般若波羅蜜多”解釋為“到彼岸”(25頁)，認為“自西漢以來，漢族人民就和西北各少數民族，西藏、蒙古、滿州以及印度、波斯、馬來亞、阿拉伯、暹羅、緬甸、越南、朝鮮、日本等亞洲民族、歐美各民族發生過接觸”(19頁)，等等，這里就不一一列舉了。

本書雖然有上面所說的一些缺點，可是仍然不能否認它為漢語外來詞的研究做了一個有用的開端。加之本書提供的材料和討論的問題都比較廣泛，一般讀者通過本書的閱讀，也能對漢語外來詞的整個情況得到一個比較全面的了解。因此不論對專家或一般讀者，本書都有參考的價值。

對《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的 幾點補充意見

胡 双 宝

我對於高名凱、劉正琰合著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一書，想提出下面幾點補充的意見：

1) 当“称呼”講的“抬头”，作者認為是从英語的 title 来的(55 頁)。其实，漢語中早就有“抬头、落款”的說法。不見得是从英語来的。

2) “爱斯不难讀”(Esperanto)一詞，書中說是英語从俄語吸收的，因为“爱斯不难讀为俄国 L. Zamenhof 博士所創制”(67 頁)是錯誤的。且不說 Zamenhof 是波蘭人，不是俄国人。从“俄国人”“波蘭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断定 Esperanto 就来自俄語或波蘭語。大家知道 Zamenhof 以 Esperanto 博士(在世界語中有“希望者”的意思)的笔名發表世界語方案。Esperanto 是由 Zamenhof 自創的世界語的詞根 esper-(希望)構成，而 esper-取自罗曼語言，但我們不能肯定是哪一種，因为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都有 esper-(希望)這個詞根。也許這三種都是它的来源，因为人造語的来源就以共同性最大為原則。

3) 俄語来源的漢語外来詞中的一部分詞在“俄語詞的来源”一欄下注着“詞源未詳”。我想做以下补充：

a) 当“好人兒”講的伊凡諾維基(Иванович)(99 頁)是从 Иван 来的。Иван 一詞相当英語的 John，原来是洗禮者約翰的名字。俄語構詞中，人名后加詞尾

-ич 就成了父称，平常說 Иванович 就是“Иван 的兒子”。“聖約翰的兒子——好人”，这就有点像中国的歇后語。

b) 当“火箭炮”講的“喀秋沙”(катюша)(99 頁)就是俄罗斯女人名字 Катя 的爱称。苏联衛國戰爭期間，当火箭炮在戰場上初次發揮巨大的威力时，战士們就親切地用姑娘的爱称叫它 катюша。这种称呼流傳开来，很快就為群众所接受，它的正式名称 реактивный миномёт(火箭炮，按詞义譯是反坐力迫击炮)反而不常用。

c) 当“同志”講的“杜瓦里希”(товарищ)(101 頁)是由 товар(商品)来的。товарищ 一詞原来有旧中国商店里“伙計”的意思。

d) 当“罗沙”講的“哈喇呢”(халат)(101 頁)是从阿拉伯語 halât 来的。

其实这里有很多詞源(比方 квас, паёк, печь, платье, рубль, совет, союз, хлеба 等等)如能多查查現成的許多詞源詞典(不止是俄語的)就可以更好地解決，可是作者沒有尽量利用，以致造成許多錯誤或留下許多空白点。

《語言研究》第三期出版

《語言研究》第三期已經出版，共有四篇論文。1)黃景欣的《秦汉以前古漢語中的否定詞“弗”“不”研究》。本文排比甲骨文、金文和漢以前古籍中“弗”、“不”兩字的用法，指出“弗”與“不”的區別。“弗”字是一個依賴性很強，不能脫離謂語中心詞(或介詞)而獨立運用的單純的否定副詞，它只和動詞、助動詞、形容詞、介詞等發生直接的关系。“不”字是一個活動性較強，可以獨立運用的否定詞，除了具有否定副詞的性質之外，它還可以作為否定語氣詞，也可以脫離動詞、介詞等而和其他詞類結合成各式各樣的詞組：在作為否定副詞時，它可以和整個謂語詞組發生直接的关系，即否定整個謂語。2)吳宗濟的《武鳴僮語中漢語借字的音韻系統》。本文指出武鳴僮語中漢語借字可以分成官話系和粵系兩個来源，並提出分別兩系借字入聲的原則：官話系借字入聲字無輔音韻尾，無陽上、陽去，只能跟同系字結合成複詞，字序用漢語語法。粵系借字入聲字有輔音韻尾，有陽上、陽去，除同系字外，也可以跟僮語結合成複詞，字序可以用僮語語法。然後就聲母、韻母、聲調三項分別討論借字的音韻系統。3)金鵬等《嘉戎語梭磨話的語音和形態(下)》，是討論嘉戎語梭磨話形態變化的方式的。4)周達甫的《梵贊还原三種》，把公元十世紀時用漢字對音的三種梵贊还原成梵文。(沁)

四川省全面推广汉语拼音字母和普通話

随着文化革命高潮的到来，四川省积极地展开了推广普通話和推行汉语拼音字母工作。5月下旬，四川省人民委员会行政会议批准和公布了该省推广普通話工作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做到以下两点：1)各公立大中小学、职工业余学校、机关干部业余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及幼儿园中的青壮年语文教师和教养员等，在1958年内必须学会拼音字母和普通話，并能运用普通話进行教学。中学和各級师范学校的其他各科教师，在1960年大多数能运用普通話进行教学。1958年师范学校各科系的应届毕业生均应学会拼音字母和普通話。一般大专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青壮年教师，在1959年，1960年逐步学会拼音字母和普通話。各校学生(包括公立、民办、各級各类学校)根据条件和性质分别在1958—1959年全部学会普通話。农村业余学校也須逐步推广拼音字母和普通話。2)各部門人員学会拼音字母和普通話的期限作了如下规定：各級教育部門、文化館、站的工作人員和报社通訊社的記者等，在1958年内完成；交通運輸、郵电事業、商業、醫藥衛生、工礦企業和区以上机关团体的工作人員，在兩年內完成；成都、重慶、自貢市的上述工作人員和人民警察并爭取提前学会。中国人民解放軍集中訓練的部队，应在一年完成；駐少数民族地区的部队除学习当地民族語言外，应在兩年內完成；广播电台(站)、电影院广播員、話剧、音乐演員等，应会說比較准确的普通話。

计划中还提出，由四川省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员会繼續举办普通話語音研究班，在暑期前訓練師資一千人，为各地区培养師資骨干。为了做好文字改革和普通話的宣傳工作，在广大群众中大力宣傳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并举办拼音字母教学講座。同时，还拟跟人民出版社編写和出版有关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話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学习文件、宣傳資料和教材。并推动所有机关团体、厂矿、企業、商店、公共場所，在报刊書籍名称旁边和广告商标及日常用品的标签上，都加注汉语拼音字母，借以扩大宣傳。

目前，四川省推广普通話工作委员会和省教育厅联合举办了普通話語音訓練班。第一期学习的小学教师170余人，已于5月中旬回到各專区、县积极展开工作。5月中旬又在成都、重慶兩地分別举办了第二期，这次参加学习的有各地中小学教师，机关、团体、厂矿的文化教員和推广普通話的積極分子等600余人。(劳 衛)

每册定价人民幣0.24元(訂閱刊費預付,按季整訂)

本刊上期6月22日出版

中國語文

月刊

1958年7月号

总第73期

1958年7月22日出版

編輯者 中国語文編輯委员会
北京海澱中关村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景山东街45号

印刷者 北京京华印書局
北京虎坊桥

總發行处 郵电部北京郵局

訂購处 全国各地郵电局、所

代訂 全国各地新华書店
代銷处

定价：三个月0.72元，半年1.44元，全年2.88元；寄費1.平郵寄費不計，2.挂號郵費由訂戶負擔。

1-15, 155册

代号2-44